

第一章 上古文化

大约在 1 万年前，距我们最近的一次冰期结束，大地转暖，人类在经历漫长的野蛮时代后开始进入文明社会。

人类文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农业和城市先后出现在西亚、北非、南亚、东亚、地中海、拉美和南部非洲等地。各地的上古文化各具特色，在产生时间上前后不一，发展也不平衡，但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古代埃及、古代西亚 和古代印度文化

一、古代埃及文化

古代埃及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它的产生深受尼罗河的影响。每年雨季，泛滥的洪水下落后，就会给纵贯埃及全境的尼罗河两岸留下一层肥沃的淤泥。尼罗河水和河岸两边的沃

土，留住了古代埃及居民，孕育了古代埃及文明。公元前 6 世纪，古希腊作家赫卡泰奥斯就曾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古代埃及的历史约从公元前 3100 年埃及建国到公元前 332 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中间包括 31 个王朝。在这漫长的历史中，除了中间几段时期出现过动荡和紧张之外，古代埃及人在很长时间里享有和平和安宁。从现存埃及雕刻和绘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人物安详的神态和怡然的微笑。在近 3000 年的时间里，埃及人习惯于回顾往事，相信宇宙不变，谋求与创世以来就存在的自然秩序保持一致。因此，追求永恒，尊重永恒的化身——制度、传统和权威成了埃及文化的基本特征。

1. 文字与文学

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 4000 年就发明了象形文字，它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一直沿用到公元 4 世纪，其间又产生了两种简化的字体——祭司体和世俗体。这些象形文字或刻在石头、金属、陶片上，或写在麻布、纸草上。纸草是埃及特产，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经过加工后的纸草具有平、轻、软，易于书写等优点。与两河流域的泥板文书相比，纸草纸卷的使用显然更为方便了，因此，埃及人不仅自己使用纸草，而且还把纸草大量出口到希腊世界和后来的罗马帝国。

公元前 525 年，波斯帝国侵占并统治埃及，后来埃及又先后为希腊、罗马所征服，公元 7 世纪后它经历了伊斯兰教化。随着独立的丧失，古埃及文字被淘汰、遗忘，逐渐成为一种无人知晓的死文字，古埃及文明也随之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人们只能通过古希腊、古罗马历史学家的记述，了解一些有关古埃及的情况。到了 1798 年，远征埃及的拿破仑部队在尼罗河口一个名叫罗塞达的地方偶然发现一块刻着古希腊文和两种古埃及文的石

碑,法国语言学家商伯良经过 20 余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解读了古代埃及象形文字。这标志着埃及学的诞生,古埃及文明因此渐渐得以再现。

古埃及人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其中不乏神话、戏剧、箴言、故事和诗歌等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神话大都反映当时人们对人类与宇宙的起源、生与死、善与恶等问题的探索。箴言又叫智慧文学,其主要内容是用于教导王子和贵族子弟的格言和训导。在一篇名为《普塔霍泰普训示》的箴言中,法老教导儿子说:“不要因为你有学识而骄傲,也不要因为你知道得更多而过于自信。既要求教于聪颖之人,也要求教于无知之人。”诗歌分成抒情诗和赞美诗。前者主要描写日常生活和爱情,后者主要为神明和国王而作,如《太阳神颂歌》、《尼罗河颂歌》等。故事往往起源于民间的口头创作。此外,著名的《亡灵书》也是古埃及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亡灵书》讲的是死者在下界的旅程,通过“真理殿堂”的审判获得再生的经过。其中既有对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特别是一些宗教礼仪的描述,又有对下界生活的种种想象。其形式多样,有诗歌、祷文、神话等等,而且图文并茂。因此,它实际上是古埃及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的汇编,为我们了解古埃及人民的习俗、思想意识、宗教信仰、艺术源流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2. 宗教

像其他古代民族一样,宗教在古代埃及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无论政治、文学、建筑、艺术,还是日常事务的处理都留下了它的印记。

埃及的宗教起源于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每一个部落都崇拜自己生活地区的某种特殊的动物和植物。进入文明社会后,国家出现了,原先所崇拜的图腾便有了国家象征的意义。在古

埃及，重要的神祇不下二十个，其中有底比斯的阿蒙神、奥西里斯神、拉神、荷鲁斯神、伊西丝神、塞特神等。

关于这些神的传说，反映了古埃及人的宗教思想。仁慈的奥西里斯受上苍派遣，到人间实施公正统治，教人们农耕及其他技术。后来，他被他恶毒的兄弟塞特杀害，他的遗体被砍成碎块，抛之各地。伊西丝出去寻找他的碎尸，将它们拼结在一起，结果奇迹般地使他恢复了生命。后来，奥西里斯到了冥府，成为统治阴界的冥王，并被尊为尼罗河、土地和丰收之神。他的儿子荷鲁斯最终杀了塞特，为父报仇。奥西里斯的死亡与复活在古埃及宗教中有深刻的含义，体现了人永存不灭，来世继续尘世生活的观念；荷鲁斯对塞特的胜利则预示着善终将战胜恶。

由于古埃及人信仰灵魂不灭和强烈的来世观念，认为现世是短暂的，来世才是永恒的，所以他们重视作为灵魂依存的尸体，并由此摸索出了一套尸体防腐和保存的方法，这就是大量制作木乃伊。

3. 金字塔与神庙

古埃及人遗留下来的建筑遗迹多姿多彩，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和技巧，金字塔和神庙集中体现了古埃及人的建筑才华。金字塔是埃及国王——法老的陵墓建筑，底座呈四方形，越往上越窄，四面观之，均似汉字的“金”字形状，因此我们称之为“金字塔”。在金字塔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石棺式、弯弓式、阶梯式和角锥式四种不同的建筑形式，其中最成熟、最有名的是角锥式。

金字塔分布在距开罗不远的尼罗河西岸。据最新统计，它们共有 159 座。^①此外，在漫漫黄沙下，还不时有新的金字塔

^①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第 252 页。

被发现。在已知的金字塔中最著名的有两座。一座是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大金字塔。它高 146.5 米，在 1889 年巴黎埃菲尔铁塔建成之前的 4500 年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胡夫金字塔的塔身用 230 万块石块砌成，平均每块重 2.5 吨。石块之间没有石灰之类的粘着物，完全靠石块自身的重量紧紧压在一起。金字塔的坚固使它成为埃及文明的“永恒”的历史见证。正如阿拉伯谚语所说：“一切都怕时间，而时间本身却怕金字塔。”据说，这座建于一块巨大的凸形岩石上的大金字塔，东南角和西北角的高度误差只有 1.27 厘米，可见建筑之精确。另一座著名的金字塔是胡夫之子哈佛拉的金字塔。它虽不及胡夫金字塔高大，但工程设计之精确，艺术风格之庄严则完全可与之相媲美。特别是金字塔旁用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的狮身人面像（又叫斯芬克斯像，象征着人的智慧和狮子的勇猛的结合）更是为之增添了几分威严。

金字塔是古代埃及宗教观的物化表现，它与墓葬仪式以及许多墓葬品一样，反映了对“来世”“灵魂不灭”“永恒”的追求；同时，它的高大雄伟也体现了法老的权威。

金字塔的建造在古王国时期（约前 2686—前 2181 年，第三到第六王朝）最为风行，此后，神庙取代金字塔成为主要的建筑形式。神庙被看作是神的“地面”上的宗教建筑物，或称“神之家”。它和陵墓一样，同是“永恒之家”。埃及神庙也以规模庞大著称，最著名的是卡尔纳克神庙。它长约 1300 英尺，占地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宗教建筑。至今，许多巨大的、雕饰众多的圆柱仍默默地矗立在那里。其中最大的一根圆柱高达 70 英尺，直径超过 20 英尺，据估计，顶端可站立 100 余人。神庙的天花板呈天蓝色，上面点缀着黄色的星星，好似万里长空。卡尔纳克神庙

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

4. 科学

埃及人最感兴趣的科学门类是那些与实用密切相关的领域——天文学、医学和数学。这些知识关系到尼罗河水泛滥的时间、金字塔和神庙的设计与建造、木乃伊的制作、土地的丈量等复杂问题。

在天文学领域，埃及人根据尼罗河水上涨和天狼星出现之间的关系，制订了较为准确的太阳历。他们把一年定为 365 天，把“元旦”定在天狼星与太阳成一直线之日，而尼罗河也是在这一天前后开始泛滥的。这一历法在罗马的儒略历问世之前是古代世界最好的历法，而儒略历本身就是采用古埃及的太阳历加闰年而成的。中世纪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对儒略历加以改革，成为今日公认的世界性公历。古埃及人还绘制了天体图，认出了主要的恒星，能准确地判定星球的位置。

在数学方面，古埃及人为算术和几何这两门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尼罗河水每年泛滥，经常将田界冲毁，需要重新丈量、划界。在长期观察和实践的基础上，古埃及人发明了几何学。他们能够算出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六边形、梯形和圆的面积，以及计算圆柱体、半球和金字塔的体积，并求得圆周率为 3.1416。他们制定了加、减、除法的算式，计算采用十进制，但还没有“零”的概念。

古代埃及人在医学方面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认为疾病是自然原因而不是超自然原因造成的，因而医师总是试图对疾病作出准确的诊断，并对症下药。古埃及的医学比较发达，已出现比较细致的专业分工。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这样写道：“在他们那里，医术的分工是很细的，每一个医生只治一种病，不治更多的病。国内的医生是非常多的，有治眼的，有治头的，有治牙

的,有治肚子的,还有治各种隐疾的。”^① 在现存的埃及医学纸草文献中,记载着一千余种医疗处方和各种药物。因制作木乃伊之需,古埃及人常常进行尸体解剖,这使得他们较早知道用心脏与血液循环的关系来诊断病情。

二、古代西亚文化

古代西亚文明最早是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这片土地在希腊语中叫作“美索不达米亚”(意为“河流之间的土地”)。它和尼罗河流域一样是人类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曾先后出现过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波斯等文明古国。像世界上大多数早期文明一样,这一地区得天独厚的农耕条件和地理环境使文明很早就开始孕育。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交汇处,交通便利,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其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王朝和国家。早在公元前 5000 至 4000 年间,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的南部撒下了第一批文明的种子,其久远和古老甚至超过古埃及文明。

1. 文字与文学

两河流域最大的文化成就之一是发明楔形文字。苏美尔人最初是在石头上刻字,后来用削尖的芦苇棒在湿润的泥板上刻出所需要的符号,然后用火或太阳烘干,成为泥板文书。泥板上的文字笔划像楔子,故称为“楔形文字”。泥板文书虽然笨重而且容易破碎,但它不怕虫蛀,不腐烂,经得起火烧。目前发掘到的几十万块泥板文书,为后人保留下数千年来古代两河流域有关科学知识、宗教典籍、神话传说、历史文献、法典词典等方面的珍贵记载。比如,类似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的故事,在这些泥板上已有记述。楔形文字在西亚应用了 3500 余年,而且还成为当

^① 希罗多德《历史》,II.84第2卷第84节。

时国际通用文字。但到公元 1 世纪，楔形文字完全消亡。直到 19 世纪，英国学者罗林生等人经过长期努力才解读了楔形文字，从而为后人研究两河流域的历史和文化打开了方便之门。

两河流域的居民创造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包括神话、寓言、诗歌、训论、祈祷词等，题材多为颂扬神、国王和英雄。19 世纪 70 年代发现的史诗《吉尔伽美什》代表了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它也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部史诗。

《吉尔伽美什》大体上是古代两河流域关于吉尔伽美什的神话传说精华的汇集。吉尔伽美什是一个英俊勇武的人类英雄，在经历了艰苦的战斗和爱情遭遇后，他向一对在方舟里躲过上帝毁灭人类的洪水的老夫妇寻求永生的秘密。老夫妇告诉他，永生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某种仙草可以使人复生。吉尔伽美什历尽千辛万苦寻得仙草，但因一时大意为蛇吞吃，终究徒劳无益。史诗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表达了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渴求永生的吉尔伽美什最后感叹要享受现实生活，及时行乐：“吉尔伽美什，你将漂向何方？/ 你所追求的永生，永远无法得到，/ 因为上帝造人之际，就让死亡与人相伴。/……吉尔伽美什，穿上新衣，沐浴净身去吧。/ 凝望挽着你手的儿女，/ 愉悦怀中娇妻。/ 人应关心的，惟有这些事。”

2. 宗教与法律

两河流域从原始社会起就流行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进入文明时代后，代表自然力的神，如月神、太阳神等演变为各个城市国家的保护神。大城邦的主神往往超越本地区，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力。两河流域的宗教是多神教。

仿照人类社会，这些神组成了一个社会体系，且有等级之分。其中位于最高等级的有三大神：安努、恩利勒和恩基。安努是众神之首，是天上的超权力中心，裁判一切。恩利勒被认为是

“分开天地创造世界,使世界秩序井然”的人间主宰。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民族神。恩基主宰地府,是水之神、智慧之神,他首创并保护了艺术、科学、文学、艺术和巫术。这三大神以权威、力量和智慧统治宇宙。等级之末是一群小神和代表邪恶、灾病的鬼。他们各有自己的权力范围和管辖地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两河流域的居民不像古埃及人那样相信灵魂不朽,即使是他们所崇拜的神也像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会受到伤害和惩罚,甚至死去,下到地府。

公元前 6 世纪以后,波斯人、希腊—马其顿人先后征服和统治两河流域,这一地区的古代宗教逐渐走向消亡。但是,后来世界上的一些重要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从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中吸收、继承了一些因素。如上帝创世、上帝造人、洪水毁灭世界、诺亚方舟等故事及天堂、地狱的观念都可以从两河流域的神话中找到其渊源。

两河流域的民族还有立法的传统,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这一地区的奴隶制国家即开始用楔形文字编制法律,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成文法,其中的《汉谟拉比法典》保存比较完整,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早的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位国王汉谟拉比(前 1792—前 1750 年)颁布的。法典原文用楔形文字刻在一根黑色玄武岩石柱上,1901 年为法国考古队在伊朗古城苏萨的遗址发现。在法典的序言和结语中,汉谟拉比自诩为“公正之王”,要“发扬正义”“使强不凌弱”“为人民造福”。但是,从法典的内容不难看出这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另外,法典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痕迹,强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习俗,如法典第 196 条规定:“倘自由民损毁自由民之眼,则应毁其眼。”

3. 建筑

在建筑艺术方面，古巴比伦人所取得的成就同样引人注目。这里有与金字塔相媲美的空中花园、通天塔等建筑杰作。不过两河流域缺少石料，大多数建筑以砖、土为主要材料，因此不像埃及金字塔和神庙那样耐久。

空中花园又名“悬苑”，是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约前 604—前 562 年）为其爱妻所建。相传，王后原为米底国公主，因怀恋故乡的绿水青山和繁盛草木而终日郁郁寡欢。为博美人一笑，尼布甲尼撒不惜重金，兴建空中花园，让王后登高远眺，以解思乡之愁。空中花园采用立体叠园的建筑手法，在高高的穹形台基上，分层叠造，层层种植奇花异草，并设有供灌溉之用的水源和水管。空中花园虽然没有金字塔那样气势雄伟，但它构思精巧，富于想象力，再加上独特的防漏水和灌溉技术，使之跻身于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可惜的是，这座凝结着古巴比伦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伟大建筑在公元前 3 世纪遭到毁灭，迄今荡然无存。

通天塔原名“巴别塔”。“巴别”在巴比伦语中的原意是神。这座塔也是在尼布甲尼撒二世时完成的。塔位于巴比伦古城内，共七级，高 90 余米。通天塔气势雄伟，与天齐肩，工程浩大。据说，仅用砖就将近 6000 万块。

4. 科学与技术

两河流域文明位于商业交通要冲，很早就注意到了固定度量衡的重要性，并在数学上多有建树。人们在运用十进位制的同时，兼用罕见的六十进位制。把圆周分为 360 度，把一年分为 360 天是古巴比伦人的发明。他们还创制了时间量度，即一天分为两个 12 小时，每一小时分为 60 分钟，每一分钟分为 60 秒。这种十二进位和六十进位的计时方法为此后西方文明所继承。

以占星术为基础的天文学在古代两河流域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苏美尔人根据月亮盈亏的规律编制成太阴历,一年为 12 个月,每月 29 或 30 天,每年 354 天,比太阳年少 11 天多,但以闰月补足。古巴比伦时期,人们已能够将恒星和五颗行星区分开来,并发现了金星的出没规律。新巴比伦时期,确立了星期的概念,七天为一星期,每天由一星神掌管,即日、月、火、水、木、金、土。星期的划分至今几乎为全世界所采用,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时间计量方法。

在其他科学技术,如医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冶金等方面,两河流域的人们也有不同程度的知识积累。他们的杰出成就对后来的希腊罗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古代印度文化

就地理范围而言,古代印度大体上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三国领土在内的整个南亚次大陆。这一地区在地理上同欧亚大陆基本隔绝,但其历史上不时面临来自西北山口的外族入侵。这从该地区居民包括世界三大人种——黑人、黄种人和白人中就可看出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使得古代印度文化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独特风貌。而且,古代印度文化不像古代埃及和西亚的文化那样中断和消亡,而是延续了下来。

1. 哈拉帕文化

印度河流域是古代印度文化的摇篮。分布在这一流域的古代文化称哈拉帕文化,以其主要城市文化遗址哈拉帕而得名;又因它散布在印度河流域,亦称为印度河流域文明。哈拉帕文化分布范围甚广,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尤以青铜时代高度发展的城市文化而闻名。但这一光辉灿烂文明的真正创造者是谁,以及它是如何衰落、消亡的,至今还不甚清楚。

1921—1931年,英国考古学家约·休·马歇尔等先后发掘了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遗址,从而揭开了这一文明的面纱。目前已发现的属于哈拉帕文化的城市和村庄遗址已达 250 余处。一般认为,这一文化存在的年代为公元前 2500—前 1750 年。哈拉帕文化虽然以农业为基础,但其本质上属于城市文明。摩亨佐·达罗的城区有两条南北向,三条东西向的大路,其中有许多直角交错的小路和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大路已有了相当近代的特征:宽 10 米的道路两旁有完整的下水道设备。居民住宅也铺有排水道,并与道路旁的下水道相连。城市中心还有一个长 19 米,宽 7.5 米,高 2.5 米的公共浴池。浴池配有美丽的装饰,并有人梯子可供上下。据估计,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两座城市各有 35000 以上的居民。

哈拉帕文化处于青铜时代。有各种赏心悦目的带有金银饰物的铜和青铜器皿。哈拉帕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印章文字是印度最早的文字,刻在皂石、赤陶、象牙和铜制成的印章与护符上,故名。已出土的印章有 2000 多件,文字符号 500 多个,但至今仍未被解读。

哈拉帕文化在公元前 2500 年后处于鼎盛时期,但到了公元前 1800—前 1600 年突然衰落。其原因仍在争论中。有的认为是一系列的洪水和地震使得印度河水改道并淹没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或者是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气候干燥,农业凋敝导致城市经济衰落。有的认为是来自西北部的半开化部落的入侵和破坏,致使哈拉帕文化毁灭。

大约在公元前 1500 年,属于印欧语系的肤色白皙,个高鼻挺的雅利安人的一支从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西北部,使南亚文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并使文明中心从印度河流域转移到了恒河流域。

2 宗教:婆罗门教

在雅利安人统治时期,印度形成了特殊的等级制度——瓦尔那制度(种姓制度),整个社会被划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为了维护祭司婆罗门和军事贵族刹帝利的利益,婆罗门教形成了。雅利安人的早期文献——歌颂诸神的《吠陀》是婆罗门教的主要经典,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义。

婆罗门教主要教义是:(1)梵我合一。梵是梵天,是创造宇宙的神或宇宙精神,世界上只有梵的存在才是真实的,自我(个人灵魂)来自于梵,作为宇宙最高精神的梵和自我的结合,就是梵我合一。(2)“轮回业报”的思想,认为人生是一种轮回转世的循环。前世行善,后世可以升迁;前世作恶,后世就要降级,甚至可能成为动物或昆虫。各个种姓只有遵守婆罗门教制定的规范和教义,才能摆脱人生的苦恼,最终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这些思想为后来的佛教所继承。

3. 吠陀与史诗

吠陀经典与两大史诗是印度民族文化的渊源和底基,对印度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吠陀(VEDA)一词意为“知识”“学问”,以诗歌为主要形式,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口述耳传而流传下来的,后来转化为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经典。它共有四部,即《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闳婆吠陀》。它们包含各种赞美诗、祈祷文和咒语等经文和古代印度文学作品。《阿闳婆吠陀》是一部巫术诗歌集,是治疗疾病、唤起渴望或摧毁敌人的咒语。最古老的是《梨俱吠陀》,成书于公元前 1500—前 1000 年。它由献给雅利安诸神的一千多首诗歌组成,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人们借此可以了解和研究古代印度的社会经济文化和风俗

习惯。

著名的两大史诗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被誉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两颗明珠，其文学价值可以与荷马史诗相媲美。前者大约成书于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4 世纪，后者为公元前 4—3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

《摩诃婆罗多》的书名意为“伟大的摩诃婆罗多族的故事”，它是古代文明世界最长的一部史诗，主要描写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居楼族和般度族之间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战争。般度族虽然获得了胜利，取得了王位，但也损失惨重。最后，两族兄弟在天国相遇。史诗还涉及多方面的描写，有古典印度文化百科全书之雅称。

《罗摩衍那》意为罗摩传。这部史诗以罗摩和妻子悉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描写了古印度宫廷内部和诸国间的斗争。罗摩在流放过程中，妻子被魔王抢走，在神猴王哈努曼的帮助下，罗摩救回悉多，归国为王。

4. 科学

古代印度在与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科学领域，亦很有建树。数学上，印度人的重大贡献是“零”的发现。最初它用一圆点表示，后改为圆圈。“零”的发现导致了计算技术的革命。8 世纪开始，印度的这一数字知识传到了阿拉伯，再由阿拉伯传到欧洲。我们今天所说的阿拉伯数字其实是由印度人创造的。

印度的医学源远流长。从摩亨佐·达罗的遗址中就可以看出当地居民已有了很好的卫生保健意识。《阿达婆吠陀》中记载有 77 种常见疾病，以及治疗方法和药物知识。稍晚出现的《阿瑜吠陀》（即“生命科学”）把疾病的起因归结为四种因素，即空气、水、粘泡和血之一的失调，并列出了上千种草药，同时认为水疗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在《吠陀本集》和《百道梵书》中，可以发

现解剖学、胚胎学、卫生学和麻醉学的萌芽。

第二节 古代希腊、古代罗马文化

一、古代希腊文化

古代希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古代希腊人甚至没有统一国家的观念。古代希腊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如同今天的阿拉伯一样。其早期文化称爱琴文明，亦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公元前 2000 年，克里特岛进入了青铜时代，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公元前 12 世纪初发生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迈锡尼联合希腊各地的军队渡过爱琴海，远征特洛伊。特洛伊是小亚细亚一个富庶的城市，据说战争打了十年，联军仍无法攻下特洛伊城。后来，希腊人使用了“木马计”，才最终征服这座城市。但迈锡尼人也在这次征战中伤亡惨重，不久就被从北部来的另一支希腊人消灭了。希腊从此进入了荷马时代。

希腊人虽未建立统一的国家，而是发展起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但希腊人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文化。正如希罗多德笔下的雅典人所说：我们是一个民族，有着同样的语言，信奉共同的神明，并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① 希腊人强烈地专注于自由，坚定地信仰人类成就的崇高，其基本精神是世俗的和理性主义的。

1. 城邦政治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 8 世纪，希腊人进入了文明社会，他们的国家叫城邦国家，即以一个设防的或有城墙的城市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国家，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小国寡民是城邦最引人注

^①希罗多德《历史》，Ⅷ.144。

目的特征。一般的城邦面积往往不足一百平方公里，人口达数万的并不多。斯巴达和雅典是最大的两个城邦。

城邦的统治者是全体城邦公民，但并不是城邦内所有的居民都享有公民权，奴隶被排除在公民之外，外邦人一般也不享有公民权。由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在各个城邦都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它决定城邦的一切重大问题。由于绝大多数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所以公民团体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城邦对外独立，对内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城邦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尽管在历史上不断出现由若干城邦组成的联盟，但各邦的独立与平等仍是联盟的基础。在古希腊各城邦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等，但未有像东方国家那样的专制君主制。雅典是民主制的典型，斯巴达则是贵族制的典型。雅典的民主制度是当时最进步的政治形式，在这种制度的鼎盛时期，每个公民都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发言权。它共有 10 个选区，各选出 50 个代表组成 500 人会议。500 人会议把成员分成 10 个 50 人团，50 人团行使行政职权，其执政时间各为一年的 1/10。50 人团每天通过抓阄决定其中一人任主席，每人只当一天主席，这是为防止个人专权。为了保证生活无保障的公民能够参政，城邦还实行有报酬的公职制度。为了让全体城邦居民都有机会受教育，政府还发放观戏津贴（政府组织大规模的悲喜剧演出，作为教育城邦公民的重要形式）。公元前 5 世纪后期，雅典的将军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曾这样说道：“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承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

无闻。”^① 民主制度对于雅典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2. 宗教

有人说，早期希腊宗教的神不过是人写的人。^② 他们不像东方的神祇那样无所不能、遥不可及、令人恐惧。在希腊人看来，众神有与人一样的形象和性格，他们同样有七情六欲，有种种反道德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神人同形同性”。人与神的主要区别在于神更有智慧、更为健美，并能长生不老。对于他们，古希腊人是敬而不畏。

古希腊人信奉多神教，诸神中没有一神享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与地上没有一个统辖一切的君主相一致的。主要的神有众神之王宙斯、神后赫拉、海神波赛东、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女神阿芙罗狄忒、太阳神阿波罗、战神阿瑞斯。每一个行业又有自己的保护神，如商业神赫尔墨斯、酒神狄奥尼修斯、农业神迪米特尔等等。十二个最主要的神住在希腊北部最高的山——奥林匹斯山上。全希腊每四年在奥林匹亚平原举行一次祭神大会，各城邦派代表参加开幕典礼，体育竞赛是大会的主要活动（这也就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由来）。盛会期间，各城邦停止一切纠纷和战争。在古希腊人的宗教体系中，没有神创造世界的理论。大地生于混沌，天空生于大地，两者的结合生成万事万物。这样的宗教思想并不构成对科学的障碍，希腊的科学和哲学因此一开始就带有人胆想象和独立思想的精神。

古希腊宗教在历史长河中是不断演变的。在自由民主的文化氛围里，希腊宗教逐渐发展成为重视伦理道德，讲求理智，较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第 130 页。

^② 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第 215 页。

少神秘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点。古代希腊人同神之间没有严格的宗教性的束缚存在，在社会生活中也不存在具有很大政治权力和干预世俗生活的宗教力量。当然，宗教仍然是城邦国家维系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

3. 哲学和史学

在哲学领域里，古希腊人试图寻求有关宇宙的性质、真理以及人生意义和目的等各种问题的答案。古希腊哲学内容极其丰富，以后各种哲学观点几乎都可能在这里找到其胚胎和萌芽。

早期的希腊哲学特别关心世界的本源问题，讨论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什么。生活于公元前 7 世纪末至 6 世纪初的泰勒斯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水是宇宙的基本元素，它永远运动但始终不变。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按规律燃烧，按规律熄灭的永恒的活火，同时认为世界存在永恒的运动，并以“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这一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从自然哲学家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学派认为万物的本原不是物质的实体而是抽象的“数”。

公元前 5 世纪，沸腾的城邦民主生活促使哲学家把目光从宇宙和自然转向人类及社会本身。智者学派（后来发展成为诡辩家）应运而生。智者学派和诡辩家谴责奴隶制和希腊人的排外性，提倡自由、民权、实用、进步的观点，其领袖苏格拉底因所谓的不敬神和腐蚀青年之罪而被判处死刑。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这一学派的杰出代表。

西方的史学和哲学一样，源头在古希腊。西方语文中，“历史”一词最初就起源于希腊，原意是“探讨”或“研究”。希腊人的历史著作具有求真的态度、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理性的分析，在西方率先确立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

古希腊最有名的历史学家有两位。一位是被誉为“史学之父”的是希罗多德(前 485—前 425),他的九卷巨著《历史》主要叙述希波战争,并旁及地中海、黑海、东欧、西亚、北非等地区的历史,内容丰富。他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和辨伪,是最先使用历史批判方法的西方学者。

另一位史学大师是修昔底德(前 455—前 400),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在史料运用上继承和发展了历史批判方法,并且重视治史的客观性,认为治史的目的在于汲取前人经验,避免重犯前人的错误。修昔底德专注于军事、政治,这一做法成为西方史学经久不变的模式,一直到 20 世纪初。

4. 文学和艺术

史诗是古希腊最早的文学作品,它保存了许多优美的神话传说,为以后希腊乃至欧洲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荷马史诗是最早的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叙事体长诗。据传,它是由盲诗人荷马加工整理而成的。荷马史诗描写的主题是希腊人对小亚细亚的特洛伊王国的远征。其中,《伊利亚特》叙述了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中的几个月里发生的事件。《奥德赛》则描写了奥德修斯和他的同伴在归途中的冒险故事。对希腊人来说,荷马史诗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希腊民族的象征;不仅是他们早期历史的最权威记载,而且是他们的宗教经典。

戏剧是希腊古典文学的重要内容,它包括悲剧和喜剧。悲剧是由祭祀酒神狄奥尼修斯时的唱歌、舞蹈发展而来的。祭者身披羊皮,扮演酒神的随从——萨提尔(半人半羊的神),狂舞欢歌。所以悲剧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山羊之歌”。古希腊悲剧与现代悲剧相比,艺术形式上还比较简单,不太注重人物性格的冲突,关注个人与宇宙的矛盾,认为人的悲剧命运是外在于个人

的力量造成的。这些悲剧也是城邦政府用来教育公民的一种方式,通过罪与惩罚来描述正义的胜利,纯洁观众的情感,激发公民对城邦的忠诚。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普斯王》、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等作品都反映了这样的主题。

喜剧也起源于宗教庆典,最初与生育典礼有关。它和悲剧一样,在公元前5世纪得到充分发展,这与当时雅典社会的繁荣有着密切的联系。阿里斯托芬是杰出的喜剧作家,他取材于现实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采用讽刺夸张的艺术手法,因而深为普通群众所喜欢。

与东方其他地区的古代艺术不同,古希腊在艺术创作中,遵循人本主义思想,努力追求美,积极探索美的本质。质朴、端庄、合理、协调是其造型艺术形式的法则。古希腊人在建筑和雕刻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对后世影响很大。

在建筑方面,希腊人善用回廊,创造了多利亚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三种石柱的形式,并为日后西方建筑所沿袭。多利亚式厚重朴实,无柱础,柱头无装饰。爱奥尼亚式典雅秀丽,柱头刻有涡卷形装饰。科林斯式的柱头有精美的叶状装饰,风格趋于华丽。古希腊建筑多为前两种形式,古罗马时则大量采用科林斯式。雅典卫城的建筑完美地体现了多利亚式和爱奥尼亚式建筑风格,其中的帕特嫩神庙庄重、和谐、精致、明朗,堪称典范之作。

在雕刻方面,古希腊人主要取材于神像和运动员。希腊人把神看作是理想、完美的人,因此神像也力求表现为最健美的人。运动员像的创作体现出同样的目的。这样,古希腊的雕刻逐渐走上了完美表现人体的现实主义道路。米隆的《掷铁饼者》、波利克里托斯的《持矛者》和帕特嫩神庙中的雅典娜女神像

是杰出的代表作。

5. 希腊化时代的文化

公元前 334 年，统治了希腊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由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组成的军队东征，征服了地中海东部各地及中亚、北印度的不少地方，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希腊文化伴随着亚历山大东征的步伐，流播于埃及和西亚各地，与当地的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希腊化文化，其特点是帝国取代了城邦，铺张、奢侈取代了朴素、中庸，成为艺术的主要风格，自然科学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希腊化时代是一个伟大的科学时代：“希腊化时代的科学发展已步入现代世界之开端，现代科学从 16 世纪开始发展，是以那时的基础为起点的”。^① 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库斯推论地球及其他行星都是围绕太阳运行的。希帕库斯大致正确地算出了月球的直径及月球至地球的距离。数学家欧几里德所著《几何学原理》在 19 世纪中叶之前一直是研究几何学公认的基础。在医学方面，由于解剖学的发展，对人的生理机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发现了浮体定律（或比重），并以科学的精确性确定了杠杆、滑轮和螺旋的原理。

希腊化时代的雕塑非常合乎现代人口味，它强调不加拘束的奢华和极端的自然主义。在具体作品中，雕刻家极尽所能地再现人物面部的皱纹、肌肉的发达以及复杂的衣纹褶皱。例如，作品《垂死的高卢人》显示了娴熟的刻画人体的技巧；《萨摩色雷斯带翼的胜利女神》刻绘飘逸的衣纹细致入微，逼真动人。《拉奥孔群像》是最真挚地表现人类情感、构图最复杂的雕刻作品之

^①法灵顿《希腊科学》（B. Farrington, Greek Science），巴尔的摩 1961 年，第 301 页。

一。希腊化时代雕刻作品的怪异和夸张的姿态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基罗及其追随者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古代罗马文化

古代罗马文化同是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罗马文化是希腊文化的继承者,但不是简单的模仿者,因此史家常说:“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罗马文化在希腊文化和中世纪及近代西方文化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而在西方文化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1. 政治文化与法律

古代罗马人的天才首先表现在政治制度的创建上。罗马人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小小的城邦发展成为一个版图广袤的大帝国。从古至今,许多历史学家把罗马文明的勃兴归之于它的政治制度。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的政治制度使它得以“超越了城邦制狭隘的政治框架,创立了一个将地中海世界的不同国家合为一体的世界国家”。^①正是在大一统的“世界国家”里,衍生出了罗马文化的许多独特的创造,如罗马法、行省和自治城市制度等。但政治制度还是外显的、实体性的东西,内在的、隐形的民族精神在独特的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质朴务实、忠勇爱国、遵纪守法构成了罗马民族精神的核心,同时也是其政治文化的灵魂。

罗马人以崇尚法制而著称,罗马法及其法学思想是他们留给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现代西方的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打上了罗马法的烙印。

罗马法肇始于约公元前 450 年的《十二铜表法》,此后由于新判例和新原则的出现而不断有所变化和发展。西罗马帝国灭

^① 马·里·佩尔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第 149 页。

亡后,雄心勃勃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对罗马法进行了全面整理和系统的编撰,最后形成《民法大全》(或叫《国法大全》)。罗马法包括三大部分,即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民法适用于罗马公民,内容基本上是有关国家的行政管理、国家机关及司法诉讼程序等,司法方面的规范不完善。万民法是罗马统治下的各民族共有的法律,主要内容为调整财产所有权关系和契约关系规范等条款,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国际法。自然法则是罗马法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西塞罗(前 106—前 43)是这种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他认为,法律的本源是自然的法则。“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协调一致的健全的理性,它扩及所有人之中,始终如一,永恒不变”。^①从自然法的永恒、普遍,西塞罗推导出人类自然平等的法律观。这种思想对后来欧洲政治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自然法理论,提出了“天赋人权”“权利平等”等口号作为反封建的武器。

2. 哲学、文学和史学

古代罗马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深受古代希腊哲学的影响。西塞罗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宣扬灵魂不死的观点,主张社会的“等级和睦”,认为人的美德在于发扬理性,控制欲望,而幸福就在于顺应自然,追求美德。卢克莱修(约前 99—前 55)是古罗马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所著的《物性论》根据古希腊的原子学说,驳斥关于神创造世界的说法,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即使精神和灵魂也不例外;原子不能创造,也不能毁灭。

古罗马的文学也是在模仿和继承古希腊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公元前 1 世纪后半叶,古罗马文化达到最高峰,以维吉尔(前 70—前 19)、贺拉斯(前 65—前 8)和奥维德(前 43—公

^① 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上卷,第 351—352 页。

元 17)三位诗人为代表,构成了罗马文学的“黄金时期”。维吉尔的主要作品有《牧歌》、《农事诗》、《伊尼阿特》。《伊尼阿特》是一部罗马家喻户晓的民族史诗,歌颂罗马人的祖先特洛伊英雄伊尼阿斯。篇中有这样的诗句:“但你们,罗马人呵,/却要牢记以威力统辖天下万民。/这正是你的天才所在——/在世界推行和平之道,/对顺从者宽宏大量,对桀骜者严惩不贷。”^①《伊尼阿特》影响了后来欧洲史诗的发展和定型,文艺复兴后,许多史诗体裁的作品都以此为范本。贺拉斯是一位讽刺诗人、抒情诗人和文艺理论家,《颂歌集》是其代表作,这些诗歌主要歌颂农村的优美恬逸,宣扬爱国精神,歌颂英雄业绩。奥维德擅长爱情诗,其创作成熟期的作品是长诗《变形记》,一部关于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总汇,对后世欧洲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罗马的史学兴起较晚,但曾产生过不少有影响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如波里比阿 40 卷本的《通史》、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李维的《自罗马建城以来》、塔西陀的《编年史》、《历史》和《日尔曼尼亚志》、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等。

3. 建筑艺术

古代罗马人的建筑艺术随着罗马帝国的发展而不断趋于繁盛,它的历史可以说是罗马国家发展、壮大的写照。雄伟壮观的建筑是罗马民族精神的艺术表现。

古罗马的建筑种类繁多,有五种基本类型:城防建筑(城堡、城墙)、宗教建筑(神庙、神殿)、娱乐场所(圆形剧场、角斗场)、公共设施(道路、公共浴池、地下水道、高架引水渠、城市广场)、纪念性建筑(凯旋门、记功柱)。万神殿的正殿是带有罗马式穹顶的圆形大厅,其直径和高度均为 43.2 米,穹顶正中是一个直径 8

^①转引自朱龙华《罗马文化和古典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米多的圆洞,仰视可见苍穹。在建筑史上,万神殿首次采用如此大跨度的穹顶,其技术上的创新,结构上的完美和谐使之成为古代穹顶建筑的典范。巍峨高大的哥罗赛姆竞技场是娱乐场所的杰出代表。这一建于 1 世纪的椭圆形建筑物长 188 米,宽 155 米,外墙高 48.5 米,可容纳 5 万多观众,主要用于角斗和斗兽,甚至可以灌水成湖进行海战。凯旋门和记功柱是罗马帝国时期颇有特色的纪念物,它们是为纪念皇帝对外战争的胜利而修建的。

公共设施是非常重要的建筑类型,体现了罗马建筑重功利主义的特点。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罗马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道路,修建了以罗马为中心的道路网,故有“条条道路通罗马”之谚语。据记载,每一个罗马城市内部都修建了公共浴池。浴池往往是一座庞大的复合建筑群,其结构有供浴前运动或游戏的回廊,有温度不同的暖气房,供洗澡用的浴池和日光浴室,此外还设有图书馆、酒店和茶馆。因此,公共浴池是许多罗马人的社交场所,他们可以整天在里面活动。

4. 科学技术

古代罗马人讲求实际,不喜玄想的性格,使他们在理论科学上缺乏创见,但在农艺、建筑、军事、医学等实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同时,在总结和综合包括古希腊、埃及等古代文明中心地区的先进科学文化成果方面,也是成果卓著。

以农为本的罗马人十分重视农业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不少农学著作。老伽图的《农业志》、瓦罗的《农业论》和科路美拉的《农业论》是罗马三本著名的农书。三位农学家将农庄的管理、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同追求财富相结合,体现了务实精神。

从老普林尼、托勒密和盖伦等科学家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

出古罗马人的综合能力。普林尼的著作《自然史》共 37 卷,书中述及天文、地理、动物学、植物学、农业、医学、冶金等多方面的内容,作者在写作时参考了近 500 名学者的 2000 多本著作。托勒密著有《天文学大成》13 卷,尽管提出了错误的地心说,但系统总结了古典天文学的优秀成果。盖伦著有各种医学著作 131 部,不仅系统总结了希腊医学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的成就,而且还提出了血液循环学说。这一理论在 16 世纪以前一直被奉为经典,直到 17 世纪被英国医学家哈维所纠正。

罗马科学家在天文学、地理学和医学等方面总结性的著作,架起了连接西方古代和近代科学的桥梁。

第三节 古代美洲文化

一般认为,创造美洲古代文明的印第安人是从其他大陆迁徙而来的,因为,美洲至今未曾发现猿人的化石,也没有发现任何属于人类近亲的猿类。那么,印第安人究竟从何而来?学者众说纷纭,在各种观点中,“亚洲移民说”较为可信。根据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美洲印第安人与亚洲蒙古利亚种人在外形特征和血型特征方面相似。大约在距今 4 万年至 1 万年间,亚洲移民通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然后由北向南扩散,散布到美洲各地。他们的后裔成为美洲的土著居民,被后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称为印第安人。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到达美洲之前,印第安人已创造出相当繁荣的独特文明,出现了玛雅文化、印加文化、阿兹特克文化等几大文明中心。特别是他们在农业方面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玛雅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玛雅人就生活在今天的墨西哥东南

部、危地马拉等地。玛雅人是创造美洲文明的先驱,被誉为“新世界的希腊人”。公元 250—900 年间,玛雅文化达到高度繁荣。15 世纪里,玛雅文明因内部动荡而全面衰落,随后遭到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彻底破坏。

在玛雅人的文化成就中,对人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农作物的培育。他们培育出来的玉米、西红柿、南瓜、甘薯、豆子、辣椒、可可、烟草等作物,后来经过欧洲殖民者传播到全世界。16 世纪以来,这些农作物不知拯救了多少欧亚大陆饥民的生命。

玛雅人没有国家组织,只有城市自治结构。这种社会造就了辉煌的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据估计,兴盛时期的玛雅人大概先后建立过一百多座城市,其中蒂卡尔是最大的城市。金字塔是玛雅人的建筑成就之一。蒂卡尔的金字塔基周长达 140 米,高 40 米。塔面有石阶,塔顶有庙宇。玛雅人的金字塔的功能和埃及人的金字塔不一样,不是作为陵墓,而更像古代西亚苏美尔人的金字塔,兼作祭神和观测天体之用。实际上,古代玛雅人把金字塔看作天与地的连接点,通过高高的阶梯式的金字塔,祭司可以接近“众神”,“众神”可以下访人类。因此,金字塔成为玛雅人宗教节日聚集的中心。从天文学角度看,金字塔突兀于浓密的热带丛林而伸向天空,这大大有助于祭司观察天体,“预言未来”。金字塔建筑在不同的古代文化中出现,是人类古代文明多元化和同一性的一个体现。

玛雅人创造了象形文字,据统计,词汇有 3 万多个。这些文字主要刻在建筑物、石柱和陶器上,也有的写在用树皮、兽皮制成的纸上。玛雅人有立柱记事的习惯,大概每 20 年立一根石柱,将重要事件用象形文字记在上面。由于西班牙殖民主义对玛雅文化的大肆破坏,玛雅文字变成了死文字,至今大部分文字仍无法解读。

玛雅人在天文历法与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他们共有四种历法,其中的太阳历,以 365 天为一年。在数学方面,他们采用二十进位制,并且使用了零的概念。

二、印加文化

印加文化以今天的秘鲁为中心,包括从哥伦比亚南部到智利北部的南美广大安第斯地区。印加帝国的建立者叫克丘亚人,“印加”一词的本意是“首领”或“大王”,由于西班牙殖民者误认为该词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称呼,由此误传下来。印加帝国疆域辽阔,印加人因此被称为“新世界的罗马人”,它经历了三个世纪的发展历程,1533 年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印加文化遭到破坏。

农业是印加的经济基础,玉米是最重要的农作物,有 20 多个品种。此外,还种植甘薯、菜豆、马铃薯、菠萝等。为发展农业,他们利用原始的工具修筑了许多梯田和灌溉水渠。

印加人的建筑成就突出。叠石法是他们常用的建筑方法,就是用修凿过的直角石块砌垒,建筑物结构紧密,且不用任何粘合物。库斯科的太阳庙(也叫“金宫”)全部用巨石砌成,庙内有黄金花园,用金银仿制各种动植物,陈列在花园内,整个建筑宏伟辉煌。此外,出于统治的需要,印加帝国修筑了以库斯科为中心的驿道网,其中两条主干道纵贯南北,长达 1500—2000 里,宽 4—5 米。

在医学方面,印加人会使用麻醉剂,能进行人体解剖,制作木乃伊,尤其是开颅手术,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印加人在文字发展上不如玛雅人,他们尚处于结绳记事阶段,其方法是在一条主绳上结许多小绳,小绳的颜色和长度表示不同事情的类别,如人口、税收、军事、行政等,用结节数表示数量。他们制定的太阳历和太阴历分别为 365 天和 354 天。

印加人崇拜太阳神,自称是太阳神的子孙,因为在他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太阳神在的喀喀湖(今玻利维亚境内)创造了一男一女,这对夫妻就是印加人的祖先。太阳神然后又把他们送到库斯科谷地,分别封他们为“王”和“王后”,建立起了以库斯科为中心的国家。此外,月亮神也是印加人崇拜的重要神祇,她被认为是太阳的妻子。

美洲古代还有另一个文明中心,是阿兹特克人以今墨西哥城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14世纪初,阿兹特克人在今墨西哥城所在地帖什科科湖中两个小岛上建立了帖诺第兰城,有三条堤道与湖外陆地相联,堤道上留有多处缺口,设有吊桥,以防止外敌入侵。两岸与岛上之间修建了两条巨大的水道,向城中供应淡水。城东有长达14公里的防波堤,城中有40座坛庙及5000多个祭司。城内还建有多座金字塔,最大的一座有35公尺高。城北有石柱围绕的市场,陈列有布匹、黄金饰物及奴隶等众多的商品。16世纪初被西班牙人毁灭前,该城有约30万人口。

处于封闭发展状态的美洲印第安文明缺乏与其他大陆的横向联系,不可能接触和吸收外部世界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因此即使是最发达的美洲印第安文明也大大落后于欧亚文明的发展进程。当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美洲时,美洲印第安人还不懂得冶铁、制造和使用铁器,不知道制造和使用车轮,没有大型驮畜和挽畜,生产力低下。故而,在殖民者的入侵面前,他们根本无法反抗。

第二章 佛教文化

本章讲授佛教文化和印度文化，有两点需要交待一下：(1)佛教产生于印度，但自中古后期以来它在印度就不再流传，所以当今的印度文化是多种宗教影响下的产物；(2)本章讲的印度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大印度”，即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在内的整个南亚次大陆，这两个国家的建立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第一节 佛教的产生和传播

一、佛教产生的背景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产生于公元前 6 至 5 世纪的古印度，由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产生前后，印度正处于奴隶制经济迅速发展、大批城邦国家兴起的时代。种姓制度集中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一制度把社会成员分为四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被称为“人间之神”，是当时垄断祭祀、文化大权的僧侣阶级。刹帝利是古印度社会的

世俗统治者,担任国王和文武官员,掌握政治和军事实权。这两个种姓构成古印度社会的统治阶级。吠舍包括农民、牧人、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但是负有缴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义务,属于平民或自由民阶层。首陀罗包括杂工、仆役和奴隶,处于社会最下层。这四个种姓之间的界限十分森严,不同种姓之间严禁通婚、共食等,而且世代相承,不能改变。

大批城邦国家的兴起导致了列国纷争,社会动荡,与之相应的是思想界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各种各样反对婆罗门正统思想的思潮,即沙门思潮,这就是佛教产生的思想背景。在佛教产生之前,婆罗门教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尊奉“梵天”(宇宙的创造者)“毗湿奴”(宇宙的保护神)“湿婆”(宇宙的毁灭神)为三大主神,提出“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婆罗门教宣称,人的灵魂不死,它是生死轮回的主体,至于如何轮回,这取决于是否信奉婆罗门教,是否严格遵守婆罗门教的教义。所谓“沙门思潮”,是对释迦牟尼时代古印度新兴思想派别的总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六个派别,称为“六师”。“六师”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对传统的婆罗门教思想进行批判。佛教就是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它要求摆脱婆罗门的统治地位,反对种姓制度。总之,佛教是公元前 6 世纪出现的反婆罗门思潮中的重要派别之一。

二、释迦牟尼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前 565—前 486),原名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约与中国的孔子同时代。他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的王太子,属于刹帝利种姓,从小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兼习武术。16 岁时,娶邻国天臂城的耶输陀罗为妻。青年时代的悉达多太子也同一般的王族子弟一样,过着奢

侈的生活。他的父亲净饭王为他建造了冬、夏、雨三座宫殿,供他轮流居住,并挑选出很多美女服侍他。传说他从一个沙门(即修道者)那里听到出家修道可以摆脱生老病死等人生痛苦的道理,便萌发了出家修道的念头。29岁(一说19岁)时,释迦牟尼毅然抛弃富贵的生活,出家成为沙门。

释迦牟尼出家之后,四处周游,寻访名师,以求正果。据说,在六年的苦行期间,释迦牟尼日食一麦一粟或七天一食,结果形体枯槁,身心衰竭,仍然一无所获。于是,他放弃苦行,到尼连禅河洗净了浑身的污垢,并接受了牧女奉献的乳糜(奶粥),逐渐恢复了体力。他终于在一天夜里,于伽耶城的毕钵罗树下大彻大悟而成为“佛陀”,意为大彻大悟之人,或“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也被佛教徒尊称为“世尊”,意为“世界上最尊贵者”。毕钵罗树也被佛教徒尊称为“菩提树”。

释迦牟尼自35岁悟道成佛后,就开始向大家宣扬自己的学说,吸收信徒,组织僧团,形成了新的宗教派别——佛教。据佛教经典的记载,释迦牟尼成佛后,一直到临终时为止,45年中没有停止过他的弘法活动。佛逝世后,遗体被火化,所有舍利(灵骨)为摩揭陀国和释迦族等八国所分,分别在本国建塔供奉。

三、佛教的基本思想

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时,最关心的是人生价值和人的精神解脱的问题。他的所谓“悟道”也主要是对人生之道的觉悟。因此,佛教的基本教义就是围绕着人生哲学问题而展开的。它主要包括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三法印等学说。

“四谛”是释迦牟尼所觉悟和宣扬的四种“真理”,是佛教最基本的教义。“谛”是实在和真理的意思。四谛即苦、集、灭、道。“苦谛”是佛陀对世俗人生价值的基本判断。佛教认为,人生在本质上是苦的,在分析人生痛苦现象时,“八苦”的说法最具代表

性,即生、老、病、死之苦,加上“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和“五取蕴苦”(指执取五蕴而产生的痛苦,色、受、想、行、识合称五蕴)。“集谛”是对人生痛苦根源的分析。“集”就是“集合”“集成”的意思。佛教认为,人的痛苦归根到底是自己造因,自己受果,人生由于迷妄无知和贪爱执著所造成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就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灭谛”是断灭世俗诸苦得以产生的原因,达到佛教最后理想的无苦境界。“道谛”是灭除人生痛苦、达到佛教最高理想境界所应遵循的方法和途径。

“十二因缘”(也称十二缘起)是佛教分析人生痛苦及其产生原因的一种理论。佛教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的产生,都存在着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因果关系。释迦牟尼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老死,而老死则以生为本,人若无生,则无老死。那么,人何以会有生呢?释迦牟尼认为,这是由前世所造的业引起的。而人之所以会造业,其根源是人对外界事物的贪欲和追求。人对外在事物的接触,须依赖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器官,亦称“六处”(又名“六根”、“六入”)。“六处”的产生又依赖于人的身心,即所谓的“名色”。释迦牟尼进而认为,人的身心源于托胎时的心识,这种心识是由意志的活动即“行”引起的,而“行”即迷妄的意志活动又根源于“无明”,也就是对人生真理的盲目无知。总之,释迦牟尼把人生及其苦难看作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在这条因果链条中,共有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十二个环节,称为“十二支”或“十二有支”。因为它们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所以叫作“十二因缘”。

“八正道”就是八种消除痛苦、实现佛教最高理想境界的正确方法或途径,即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正确思维)、正语(正确的语言)、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符合佛教戒律的正当的生活)、正勤(正确地努力修行)、正念(正确的思想)、正定(正确的

修习禅定)。佛教认为,人们按照这八种方法来观察、思考、说话、行为和生活,就可以由凡入圣,实现涅槃解脱。

“三法印”是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印”就是“印玺”,它是证明文件真实性的一种标记,这里用来比喻佛教的基本教义,要用这三种标记来衡量它是否为真正的佛教。“诸行无常”是说世界万物都是变化无常的;“诸法无我”是指一切现象皆因缘和合,没有独立的实体;“涅槃寂静”就是超脱生死轮回。后来加上“一切皆苦”,成为“四法印”。

从上述的基本教义中可以看出,早期佛教着重探讨的是如何摆脱人生苦难,它不仅涉及到对宇宙世界的看法,也关联到人生观问题,与哲学家们探讨的课题颇有相似之处。这是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一大特点。佛教促进了文化和智慧的发展,它不仅激发了哲学思考,而且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四、佛教在印度的发展

原始佛教之后,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

1. 部派佛教时期,一般指公元前 4 世纪中叶至公元 2 世纪中叶间的 500 年左右的时间。在释迦牟尼逝世约百年之后,佛教僧团即开始分裂,最初分出上座部和大众部。后来由于佛教流传地区日益广泛,各地传承关系不同,风土人情迥异,分派也越来越多。到释迦牟尼逝世后约 400 年间,先后分裂成十八部或二十部。部派佛教时期尽管派系繁多,但可以归纳为四大系统,即上座系、说一切有部系、犍子系和大众系,每个系统都有各自信奉的经典和不同的学说。

2. 大乘佛教时期,形成于公元 1 世纪,7 世纪逐渐衰落。它处于三大时期的中期,是印度佛教的黄金时期。“大乘”佛教产生后把其以前的佛教称为“小乘”。“乘”的梵文本意是“道路”

或“事业”，又有“车辆”“运载”的意思。大乘佛教徒认为部派佛教只讲个人的解脱，是“小道”“小业”，因此贬称其为“小乘”；而他们主张普渡众生，因而自称“大乘”。不过，今天人们讲的大乘、小乘这对概念时已经没有褒贬之义。今天人们所说的印度小乘佛教，是对大乘佛教产生以前的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的统称，所谓大乘佛教则是指公元 1 世纪至公元 7 世纪之间产生并兴盛于印度的佛教流派。与部派佛教相比，大乘佛教有六个特点：(1)在宗教理论上，否认一切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小乘佛教主张“我空法有”，即否认自我的实在性，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大乘佛教则主张“法我皆空”，主张一切皆空。(2)在宗教信仰上，神化教主。(3)在宗教目的上，主张成佛。(4)在宗教实践上，主张在利他中成就自己，一人不成佛，我誓不成佛。(5)在教团生活上，重视居士(在家修行)的作用。(6)在生活习惯上，提出素食。部派佛教不戒肉食，大乘佛教的许多经典则反对肉食。^①大乘佛教主要包括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两大流派。中观学派擅长发挥“空”的道理，又叫“大乘空宗”；瑜伽行派重视说明“有”的真谛，亦称“大乘有宗”。

3. 密教时期。密教是印度佛教的最后形态，它形成于公元 7 世纪中叶，8 至 9 世纪成为印度佛教的主流，终结于 13 世纪初。“密教”一词来自梵文，有秘密、神秘之义。密教以此为名，包含以下几层含义：其一，修行的方法是秘密的；其二，遵循佛的秘密教义；其三，宗教仪式是秘密的，道场多在隐秘之处；其四，师徒秘密传承；其五，传授秘密经典。密教的核心特征是三密相印，即身成佛。“三密”是口诵真言(“语密”)、手结印契(手势或身体姿势，“身密”)、心观佛尊(“意密”)，密教认为只要众生的身

^①李富华等《佛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0 年，第 62—63 页。

口意三业能与佛的三业相应，就能成佛。从公元 10 世纪末起，由于伊斯兰教国家的不断侵入印度，一些佛教圣地先后遭到严重破坏，这给佛教以致命的打击。到公元 1203 年，印度仅存的密教中心超戒寺被烧毁，这是密教，也是佛教在印度本土消亡的标志。

五、佛教的传播

佛教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宗教，是因为它不断向外传播。这种传播大约开始于公元前 3 世纪孔雀王朝时期。佛教传播从大的方向上看有两条路径：从印度向南越海传到斯里兰卡，又传到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以至传入我国云南与泰、緬交界的地区，形成南传佛教；向北经过中亚诸国，越过葱岭传到中国，再从中国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形成北传佛教。

无论是南传佛教还是北传佛教，都形成很多佛教宗派。北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体。在北传佛教内部，又分为以中国汉语佛典为依据的汉传佛教与以中国藏语佛典为主要依据的藏传佛教。在汉传佛教中又分为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宗派。汉传佛教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又形成了与这些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相适应的佛教宗派，如在朝鲜形成曹溪宗，在日本形成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即使一些佛教宗派与中国的宗派名称相同，也有自己不同的内容与特色。南传佛教，也即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因其经典主要属巴利语系统，所以也叫巴利语系佛教。

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虽然受到各地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制约、影响，但它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各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并逐渐渗透到广大人民的生活习俗之中。南亚、东南亚佛教流行的国家如此，北传佛教国家的中国、朝鲜、日本等国也是如此。

六、佛教的节日与习俗

宗教节日和习俗是宗教文化的重要内容，佛教也是如此。在广大僧俗佛教徒的宗教生活中，佛教节日庆祝活动占有重要地位。这种节日庆典既是宗教生活本身不可缺乏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某一民族、某一地区风俗习惯的反映。因此，通过宗教节日这个窗口可以对宗教文化、民族文化、人类文化进行多视角的探索与研究。

1. 佛诞节。又称浴佛节、泼水节、花节，是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这一天，佛教寺院举行诵经法会，取法龙降香雨浴佛的传说，用各种名香浸水灌洗佛降生像，并供养各种香花异卉、灯烛、茶果珍品等，僧尼云集寺院参拜，世俗信徒扶老携幼到寺庙烧香敬佛，所以这个节日也称“浴佛节”。我国、日本、朝鲜等大乘佛教流行的国家皆以阴历四月初八为佛诞节。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后改为阳历4月8日，此时正值樱花盛开，在浴佛节仪式中供奉鲜花，因此日本人称它为“花节”。在南亚、东南亚的南传佛教流行地区，佛诞节的庆祝活动也是丰富多彩。柬埔寨的佛诞节在公历4月14—16日，并以此为新年纪元，作为年节。节日期间，诸寺院都挂起佛教的六色旗帜，人们穿上节日盛装，成群结队到寺院朝拜。在释迦牟尼的故乡尼泊尔，每年5月15日，都要举行宗教集会，抬佛像游行，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1950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首届大会决定每年5月的月圆日为佛诞节。

2. 佛成道节。它又称“腊八节”“成道会”“佛成道日”，是纪念释迦牟尼成佛的佛教节日，主要流行于大乘佛教地区。据佛教经典记载，释迦牟尼经过六年苦行修炼后，仍然没有结果，后来他放弃苦行，在身体羸弱之际吃下一位牧女奉献的乳糜后顿觉全身舒爽，气力充沛，然后在一棵菩提树下沉思七日，终于

觉悟成道。后来的佛教徒把这一天称为佛“成道日”。印度佛教经典记载的这一天是 2 月 8 日,而中国汉族地区作阴历 12 月 8 日。古代称 12 月为腊月,故 12 月 8 日亦称“腊八”。为纪念佛成道,寺院僧人在这一天要举行诵经法会。大约到宋代,又根据牧女向佛献乳糜的故事,兴起煮“腊八粥”,因此,腊八粥也称“佛粥”。

3. 佛涅槃节。这是纪念佛祖释迦牟尼圆寂(逝世)的节日。佛祖释迦牟尼成道后,传教四十余年,在 80 岁时自知已得了重病,便与弟子从舍离城向西北走。从行走方向上看,似乎是朝家乡走。走到离现在印度与尼泊尔不远的拘尸那伽,病情加剧 2 月 15 日中夜之时,他枕着右手侧身卧着,头朝北,脚朝南,背向东,而向西,涅槃而去(如常见卧佛像)。中国、朝鲜、日本等国将佛涅槃节定为每年夏历 2 月 15 日(日本近代后改用公历)。这一天诸佛寺要举行法会,挂释迦牟尼涅槃图像,诵《遗教经》等。

4. 盂兰盆节。又称“盂兰盆会”“盂兰盆供”“中元节”,后称“鬼节”,是中国、朝鲜、日本等国佛教徒为纪念祖先而举行的佛教节日,时间为阴历 7 月 15 日。这个节日早在南北朝时代就很流行。节日期间,除施斋供僧外,寺院还要举行诵经法会及举办超度水陆亡灵的法会、放焰口(饿鬼名“焰口”,放焰口是向饿鬼施食的仪式)、放灯等活动。后来,盂兰盆节逐渐演变为民间祭祀祖先、超度亡灵的宗教节日,在这一天,人们如清明节一样要上坟祭祖。

第二节 当代佛教

一、概述

今天,佛教仍然流传于世界上许多地区,亚洲有众多的佛教

徒,欧美一些国家也有不少佛教徒。

东南亚是当代佛教最主要的流行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先后取得民族独立。它们在独立后,把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加以弘扬,一度出现了“佛教复兴”的机遇。在一些国家,特别是缅甸、柬埔寨和泰国等国,佛教曾与政治密切结合,甚至出现了“佛教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佛教思想基础上的,他们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把佛教的教义和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等同,认为佛陀的教义里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意识。

中国是北传佛教的中心,朝鲜和日本的佛教由中国传去。佛教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已经与中国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代中国佛教虽然不及东南亚显赫,但是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佛教不仅影响到中国的文学创作、音乐欣赏,而且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用语。比如世界、实际、平等、现行、刹那、相对、绝对、清规戒律、借花献佛、五体投地等等都是来自佛教的词汇。佛教还丰富了中国的人文景观,如闻名于世的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是我国雕刻艺术的宝库,山西五台山、杭州灵隐寺、河南少林寺等佛教胜地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

中国的蒙藏地区,尤其是西藏盛行喇嘛教(又称藏传佛教),喇嘛教属于北传佛教。它的宗教首领有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传承有一套完备的制度,这就是活佛转世制度。这套制度包括秘密寻访、仔细认定和金瓶掣签几个步骤。其中金瓶掣签是清朝乾隆帝时代最后确立下来的。18世纪末,清朝中央政府帮助西藏地方打败廓尔喀(今尼泊尔)的入侵后,为整顿藏务,中央和西藏地方的代表共同拟定了二十九条《钦定章程》。其中第一条就是关于金瓶掣签,这是

为了保证活佛转世制度的公正性。它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在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的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有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经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像师徒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虚作假。这个金瓶平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①清代,驻藏大臣主持掣签仪式,并报清帝批准后,转世灵童方获得合法身份。此后,这一制度遂成历史定制,沿用至今。

日本也是佛教主要流行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佛教徒逐年增加。据日本文化厅编的《宗教年鉴》统计,1947年日本有佛教徒3674万,1961年达6696万,1980年增至8786万。截止1987年,佛教徒已有9294万,佛寺84380座,遍布全国。现在日本有十三个佛教宗派,既有从中国直接传入的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又有日本上生上长的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等。佛教在日本经过1000多年的传播,已经日益民族化,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渗透到日本文学、教育、医学、艺术、社会福利乃至家庭生活的各个领域。

战后,随着佛教在一些国家的复兴,各国佛教组织之间的联

^①《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转引自蔡志纯等编《活佛转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26页。

系开始加强,佛教的国际组织应运而生。1950年5月在新里兰卡成立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简称世佛联),决定以六色旗作为世界佛教教旗,法轮为教徽,5月月圆日为世界佛诞节。到1990年在韩国汉城召开的第17届世佛联大会时,已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98个组织成为它的成员。佛教的影响经世佛联的活动(公益活动、慈善活动)而扩大,过去佛教影响甚微的非洲地区,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也相继建立了佛教中心,有的已成为世佛联的成员。

欧美国家以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随着这些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一部分人转而信仰佛教以求自己的解脱。据《大英百科年鉴》1990年版的资料,欧洲已有22.2万佛教徒,美国约有40多万佛教徒,其中日莲宗教徒有25万人,其余为大乘北传、藏传、南传上座部佛教。美国的佛教势力主要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区,其次是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州,再次是芝加哥等大城市。美国拥有数以千计的佛教寺院和习禅中心。佛教在欧美国家虽然没有成为主流宗教,但它逐渐被人们所认同,其影响与日俱增,1988年世界佛教联合会还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第16届大会。这是世佛联成立38年以来第一次在西方国家召开的会议,说明佛教在欧美地位上升的事实。

二、泰国佛教

泰国是当今南传佛教三大中心之一(另两个是斯里兰卡和缅甸)。在今天的世界上,佛教地位最高的国家非泰国莫属。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佛教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泰国宪法规定:“国王须为佛教徒,且为佛教之最高赞助人。”^①泰国的国旗以

^① 汤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

白、红、蓝三色组成,白色代表宗教,即佛教,红色代表国内各个民族,蓝色则代表国王。佛教国家在国旗上表示宗教象征的,只有泰国一个国家。泰国宪法的前言也是用佛教界使用的语言——巴利文撰写的,国家采用的纪年是以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一年开始的。泰国人民一直流行着男人一生至少到寺庙出家一次的传统习俗,并以此取得社会的承认,才能完成找工作和婚嫁等终身大事。泰国的僧人都穿黄色袈裟,在国内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国王和百姓向出家人致礼,僧人不必回礼。僧人不必劳作,每日衣食都有人布施供养,他们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导师。现在泰国佛教徒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5%,僧团约有 28 万,寺院 2.5 万座,佛塔 10 万座。总之,泰国境内寺庙林立,僧人遍地,有“黄袍佛国”之称。

佛教传入泰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印度阿育王时期(约前 273—232),佛教就开始传入泰国。在泰国南部发掘出属于公元 2 世纪的铜佛像。公元 6 世纪末建立的以古城佛统为都城的堕罗钵底国,统治泰国南部长达 400 年之久。这时,泰国南部的上座部佛教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里出土的青石佛像、石刻法轮、古塔等文物都证明了这一点。

自 13 世纪起泰国佛教开始了国教化的历程。1222 年建立的素可泰王朝,逐渐统一了泰国的南方。拉玛甘亨(1275—1317 年在位)国王重视佛教,修建了阿兰若寺,派僧人到斯里兰卡学习,他还整顿僧制,建立了僧王、僧伽尊长、大长老、上座四级僧官制。拉玛甘亨的儿子卢泰(约 1317—1347 年在位)继续支持佛教,被佛徒尊为“达磨罗都”(法王)。拉玛甘亨的孙子吕泰,是虔诚的佛教徒,曾在宫内白讲佛经,1361 年放弃王位出家,是泰国第一个以君主身份为僧的人。这一时期是泰国上座部佛教最兴盛的时期。曼谷王朝是泰国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时代,佛教

也因此走向繁荣，泰国佛教的国教化进程最终完成。拉玛一世（1782—1809）在王宫建立玉佛寺，供奉从万象取得的玉佛。他组织了泰国佛教史上第二次佛教经典的整理和编辑。

今天，佛教在泰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佛教成为泰国国家政治的工具。冷战期间，泰国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传法活动，其目的是阻止共产主义思想在泰国的“扩张”，以佛教思想对付共产主义思想。在日常生活中，泰国王室对佛教非常虔诚，拥有属于自己的皇家佛寺，每逢佛教节日，国王全家必到佛寺拜佛，斋僧布施，发愿祈福。国王崇佛，民间也竞相仿效。泰国的佛教徒一生有十个与佛教有关的追求：成为一名僧人；出钱建造佛寺；家里要有一名男性出家为僧；朝拜佛陀圣地；服役修寺；布施斋僧；做一名居士；斋日去寺供佛，遵守八戒；日常遵守五戒；在“功德”日为僧人施衣。佛教徒每天早晚两次供佛，每次约半小时，每月四次斋日，届时进寺烧香献花，严格斋戒。每逢佛教节日全国同庆。

三、缅甸佛教

缅甸与泰国一样，是佛教兴盛的国家，也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另一个传播中心。1947年通过的《缅甸联邦宪法》规定：“国家承认佛教为联邦大多数公民信仰之宗教的特殊地位。”^①也就是说佛教在缅甸具有国教地位。

佛教传入缅甸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世纪，佛教就已经传缅甸。在缅甸中部，在公元3—4世纪时建立的“骠国”，即为上座部佛教盛行的国家。蒲甘王朝的阿奴律陀国王（1044—？）定佛教为国教，他派人从斯里兰卡取回一套完整的巴利文佛经，并修建了许多佛塔。他还创制了缅文，对缅甸佛教文

^① 转引自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04页。

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后，佛教在缅甸经久不衰。1886年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信奉佛教的缅甸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掀起了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1906年成立的“缅甸佛教青年会”成为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坚。缅甸人民包括爱国僧人经过前赴后继的斗争，终于在1948年实现了独立，建立了缅甸联邦。

独立后的缅甸，佛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第一任总理吴努是缅甸著名的佛教徒，他全力支持佛教。他认为国家的混乱和社会的停滞是由于缺乏宗教热情和宗教信仰不深造成的，所以主张在佛教思想的基础上重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他的支持下，由政府出资，于1954—1956年举行了佛教经典的“第六次结集”。为此，在仰光的吉祥山修建了一座塔基直径300米，高118米的“世界和平塔”和一次可容纳1万人的“大圣窟”。他邀请2500名高僧，经过两年努力，将各种版本的巴利文三藏详加校对，然后印刷发行。当此次结集完成之时，正值佛陀涅槃2500周年，缅甸进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政府宣布全国放假六天，实行大赦，假期内全国禁止杀生。1961年修订宪法时，正式将佛教定为“国教”。虽然后来的奈温政府取消了国教化的条款，但仍对佛教实行保护政策。

今天的缅甸仍然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佛教徒占缅甸总人口的90%，僧尼有13万，寺院达2万余所。男子从小都要在寺院中短期为僧，然后还俗。每家每户都供有佛龛，奉佛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印度的佛教复兴运动

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佛教在印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由于印度教的扩张、伊斯兰教的侵入和印度佛教自身的一些原因，印度佛教终于在13世纪衰亡了。但从19世纪开始，

些亚洲佛教国家的僧侣陆续到印度朝拜佛教古迹，促使在印度已经消失六七百年的佛教再度出现。到 20 世纪初，一些佛教组织和佛寺已在印度重新建立，少量的印度教徒改宗佛教，一些重要的佛教遗迹也得到了发掘和初步整理，这为现代印度佛教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1947 年印度独立以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新政府支持佛教复兴运动。尼赫鲁曾说：“印度是佛教的祖国，佛教教义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扬佛陀的和平主义，是我们每个佛子都应有的责任。”^① 印度新政府要利用佛教在亚洲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印度佛教在整个佛教史上的重要性，为印度的现实外交服务。新成立的共和国所采用的国徽图案，是古印度佛教徒“伟大的护教者”阿育王敕柱的四面狮子柱头像。1956 年印度政府举行了庆祝佛陀涅槃 2500 年的大典。11 月 24 日，在新德里拉姆利拉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来自中国、缅甸、斯里兰卡、越南、朝鲜、瑞士、英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僧俗代表与当地群众数万人出席了会议。大会由总统普拉沙德主持，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和总理尼赫鲁先后讲了话。这次纪念活动还就佛教有关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会后，代表们分别朝拜了那烂陀、菩提伽耶、灵鹫山、鹿野苑、拘尸那伽等佛教圣地遗址。

1956 年印度发生了 50 万贱民集体改信佛教的事件，将印度的佛教复兴运动推向高潮。这年 10 月 14 日，印度首任司法部长安培克和高级法院院长尼奥基等人一起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格浦尔广场组织了 50 万（有说 100 万）贱民集体改宗佛教的活动。安培克于 1891 年出生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个贱民种姓家庭，曾经留学英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印度独立后，他

^① 释星云《海天游踪》，佛光出版社（台湾）1979 年，第 166 页。

被尼赫鲁任命为首届司法部长。后来他离开政界，致力于提高贱民地位的运动，经过慎重的考虑，他选择信仰佛教作为提高贱民地位的有效途径。他认为，“贱民除了佛教的教诲，别无解放之路”。^①

安培克为什么选择佛教作为提高贱民地位的工具？其原因是：(1)佛教是同婆罗门教、印度教作斗争的宗教，它反对印度教种姓制度，主张“四姓平等”；(2)佛教不像印度教那样迷信，是一种理性的宗教；(3)佛教不美化贫困；(4)佛教是印度土生宗教，皈依佛教无需放弃印度文化；(5)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皈依佛教有利于其他国家佛教徒的援助。^② 由于安培克对印度佛教复兴运动的贡献，他因此获得了现代印度佛教史上的圣人的美名，印度佛教徒将他和释迦牟尼并列，尊称他为“巴巴·萨希布”，意思是“我们的慈父和主人”。每逢安培克的诞生之日，印度各地的佛寺和信徒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伴随着印度佛教复兴运动的开展，许多佛教圣地和遗迹重新被开发出来，供各地的佛教徒前来朝拜。自 13 世纪佛教在印度衰亡以后，佛教古迹长期被人们所遗忘，在经历时代风雨沧桑后，有的已经湮灭无闻，有的尚存断垣残壁，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印度独立以后，在佛教复兴运动的推动下，政府对佛教古迹进行了整理和大力抢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主要的佛教遗迹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缮。

菩提伽耶是佛陀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位于巴特纳南 150 公里处，是佛教徒朝圣的第一圣地。这里有 50 米高的菩提伽耶大塔、著名的大菩提树(传说佛陀就是在这棵树下成佛的)，周围

^①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 55 页。

^②尚会鹏《略论印度的“新佛教运动”》，《世界宗教资料》，1990 年第 4 期。

还有牧女供奉乳粥和释迦牟尼影窟等遗址。

拘尸那伽是佛陀的涅槃地，位于瓦纳拉斯北约 220 公里。这里有雕刻的卧佛像，还有涅槃堂、荼毗窟等。

那烂陀是古印度佛教的教育和学术中心，距离巴特纳 90 多公里。古代的那烂陀寺有宏大的庙宇，居住有僧侣和学僧 1 万多名，著名的唐玄奘曾经留学于此。13 世纪初该寺毁于战火。1956 年新建的那烂陀寺落成，重新恢复古那烂陀寺的传统和光彩。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位于南印度德干高原文达雅山的悬崖上。开凿时间约在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8 世纪。公元 9 世纪后逐渐荒芜。19 世纪初被在此附近演习的英国军队偶然发现。石窟共有 29 座，环布于高 100 米、长 550 米的山腰间。石窟分为两类：一类是僧人居住的佛寺和僧房；另一类是供僧人进行佛事活动的佛殿。整个石窟群艺术价值最高的是壁画。这些壁画题材广泛、风格各异、逼真生动。

王舍城也是著名的佛教胜地，佛陀曾在这里的竹林精舍向世人说法，为最早的佛教寺院。附近的灵鹫山有重要的弘法道场，受到广大佛教徒的崇拜。民间传说杭州的飞来峰就是从灵鹫山飞来的，因而它与印度的灵鹫山为姐妹峰。

第三节 多种宗教影响下的印度文化

从中世纪中期以来，佛教在印度逐渐消亡，印度渐渐处于多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曾在不同的时期及在印度不同的地区占支配地位。现代印度信仰佛教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有不少人信仰锡克教、基督教、耆那教、拜火教等等。今天印度信仰印度教的占总人口的 82%

以上，伊斯兰教居第二位，穆斯林在印度全国人口中占 11%。当然，说佛教在 13 世纪以后消亡了，不是说佛教文化在印度消失了，它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比如它的一些教义为印度教所吸收。总的说来，从中世纪中期以来，印度文化先后受到多种宗教影响，到了近代，印度又长期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西方文化也在印度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一定程度上，当代的印度文化是多种宗教影响的混合物。

一、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

印度教是综合了多种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内容庞杂的一种宗教。它是公元 8 世纪时由婆罗门僧侣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某些教义，通过改造印度古代的婆罗门教而形成的。所以，印度教的渊源是婆罗门教，但它受佛教的某些影响。印度教的主要教义有：严格维护种姓制度，宣称每个人的种姓是神决定的；坚持善恶有因果、灵魂有轮回的因果业报说和人生轮回说；非暴力说，认为精神与道德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它将战胜一切邪恶与暴力；仁爱说，即修善果可以积阴功；禁欲与苦行说；形形色色的教律，如童婚、反对寡妇再嫁等。其中，印度教主张因果报应和轮回思想，以及主张非暴力，不杀生等等，都是佛教影响的痕迹。

印度教规定每个信徒一生中必须偿还五大债务：(1)祖宗债。就是每个人必须结婚生子、繁衍子孙，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印度教把结婚看作是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2)神债。神给人类带来许多自然物质，如水、空气、水果、吃的和用的等等，为了报答神的恩惠，偿还神的债务，就必须敬神，进行祭祀。(3)仙债。仙人、学者、老师的服务，丰富了人类文化知识，为偿还他们的恩惠，必须学习和授业。(4)人债，即招待客人。他们认为，客人来到谁家，就会给谁家增加光彩，会提高他家的社会地位。

(5)鬼债。人类靠动、植物而生活,为感谢它们,饲养禽兽,不毁坏植物,当作人类的职责。

印度教认为,人生有四大目的,即“法”“利”“欲”和“解脱”。其中“法”是指遵守印度教所规定的各种职责。“利”是指通过正当手段对物质生活条件的获得,这既是还“债”(举行祭祀活动)所必需的,又是自己幸福生活的基础。“欲”是指对物质生活的享受,特别是感官享受的追求。因此,要结婚,这是社会存在和文化延续所必需的。“解脱”是指从物质生活中超脱出来,脱离生死轮回的束缚,达到人生最后的目的。因此,印度教把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前 25 年必须独居和读书,称为独居期;25 岁到 50 岁是成家立业期,叫家居期;50 岁以后必须离家入山,修身养性,直到 75 岁,叫林居期;满 75 岁以后,舍俗出家,以求解脱,这是一生最后的阶段,叫出家期。^①

今天在印度处于第二位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印度文化中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伊斯兰教传入印度的时间很早。公元 711 年,倭马亚王朝将领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从巴士拉出发,沿着海路攻入印度河下游,占领信德地区,信德和旁遮普北部地区被置为行省,并入伊拉克总督区。这样,西北部的信德和旁遮普地区成为印度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地区。公元 1190 年,阿富汗穆斯林廓尔王朝(1151—1206)攻占德里,推翻了当地的印度教王国,将北印度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1206—1526 年间以德里为中心而占有广大地区的德里苏丹国是伊斯兰教的国家。到 14 世纪初,除少数地区外,穆斯林几乎统治了整个印度。莫卧尔帝国统治时期(1526—1858),伊斯兰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印度的国教,

^①王树英主编《宗教与印度社会》,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年,第 60—63 页。

统治印度长达三个多世纪。

从中世纪起，伊斯兰教就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之一，对印度的文化和人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非常曲折复杂的。比如，在伊斯兰教一神论、宗教平等思想的冲击下，大批低级种姓的人如首陀罗和吠舍改信了伊斯兰教。在此情况下，印度教内部便出现了一些改革者，他们强调宗教平等和神的统一性，谴责种姓歧视和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但印度教中的主流派为了保护自己的宗教，避免伊斯兰教的影响，对种姓制度作了更加严格的规定。结果是，印度教徒努力限制自己与穆斯林发生联系。其办法主要有四种：(1)实行童婚，避免印度教女孩被穆斯林娶走；(2)在高级和中级种姓中戴面罩，避免同穆斯林发生联系；(3)对寡妇再嫁作出严格的规定；(4)大力宣传寡妇为亡夫殉葬。

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广泛传播，为印度的建筑艺术增添了新的风格。此外，伊斯兰教对印度的音乐和绘画等都有影响。

二、印度的建筑和音乐舞蹈

印度是多种建筑风格的聚集地，既有上古时代的建筑遗迹，又有近代西洋建筑，既有佛教建筑，又有伊斯兰教建筑。有时，在某一地方的建筑群中叠加上许多不同风格的建筑物，这与印度悠久的历史 and 不断遭到外族的入侵有关。

印度的建筑可以追溯到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前的时代，从当时留下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遗址来看，已经有相当高的建筑水平。他们用烧过的砖作为建筑材料，城市已有排水设施。

从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开始，佛教的传播促进了建筑艺术的发展，使许多用作佛教膜拜的建筑物，如石柱、塔和石窟等应运而生。阿育王所立石柱现存尚有十处之多，北方邦鹿野苑狮子头石柱最有名。这一石柱的顶端有狮子、

象、牛、马等雕像，柱高 50 英尺，重 50 吨。塔是佛教的典型建筑，佛陀死后，他的骨灰被弟子们瓜分，分别存入小容器里埋入地下，上面建塔。阿育王建了许多佛塔，其中在桑奇城修建的桑奇大塔最有名，该塔直径 120 英尺，高 54 英尺，周围建有围墙，围墙有四道门，门上雕有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画面和与阿育王生平有关事迹的画面。佛塔里放有佛牙和佛骨。石窟也是佛教著名的建筑。石窟里设有佛殿僧房，石窟内部的造型、石柱和壁画都很精细。阿旃陀石窟是其杰出代表。公元 3 世纪建立的笈多王朝曾经将佛教艺术传到中国，当时有印度僧人来到中国，参加云岗石窟的雕刻。

随着德里苏丹国的建立，印度建筑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为它增加了伊斯兰教的成分。穹隆室、圆屋顶、拱门、几何图案等都为印度建筑广泛采用。于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形式，如带有高塔的清真寺、圆形屋顶的陵墓等。这些新型的建筑物与印度原有雕塑华丽的建筑完全不同，它的优点在于外形有精确的几何图案，内部开阔明亮，完美的对称形式和各种颜色的巧妙配合。在莫卧儿帝国时代，伊斯兰教的建筑风格达到了顶峰。著名的建筑有沙杰汗统治时期（1627—1658）的泰姬陵。和谐匀称和庄严肃穆的泰姬陵耸立在四角各有一座高塔的台基上，陵墓连同台基和尖顶的高度共有 75 米。陵墓的两侧是两座用红沙石修成的建筑物，正面是花园。这样构成了一个协调的建筑整体。

在印度艺术中，音乐、舞蹈非常发达。凡是到过印度或者看过印度电影的人，都会对印度的歌舞留下深刻的印象。印度人认为，音乐和舞蹈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否则生活就会枯燥乏味。

印度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出现与宗教有关。起初，音

乐是为宗教活动服务的,祈祷、祭祀等离不开奏乐和唱歌之类的活动。早在上古文献的《吠陀》中,便有了对音乐的记载。《梨俱吠陀》赞歌的吟诵需要有音乐知识,而《娑摩吠陀》更是用于歌唱的诗集。在两大史诗时期,音乐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史诗中提到的乐器就有 20 多种。史诗时期,印度已有了七声音阶,即有了七个基本调式,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转调体系。成书于公元初的《舞论》是印度古代音乐理论名著。

印度对音乐进行系统研究从中世纪就已开始。如夏冷格戴沃的《桑吉德勒纳格尔》(音乐宝库)写于 13 世纪,是古代印度研究音乐最详细的专著,书中谈到印度南北音乐的特点,并对音乐、舞蹈和乐器三个方面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成书于 17、18 世纪的《桑吉德巴里贾德》和《纳格摩艾阿斯菲》都是著名的印度音乐论著。

舞蹈也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在印度舞蹈被认为是神的创造物,舞蹈者的惟一目的是为了取悦于神。它的原始形式起源于古代祭祀时人们的手舞足蹈,一方面向神表示虔诚,另一方面向神表示祈求。

舞蹈在印度既是娱乐又是劝善的形式。每当演出舞蹈时,台前往往都要放一尊“舞蹈之神”湿婆的神像。他的右手拿着一面达莫和鼓,象征着创造;他的左手托起燃烧的火焰,象征着他可以毁灭他所创造的一切;右脚踩住一个魔鬼,象征着征服恶;左脚上抬,象征着超脱尘世。这尊舞王的形象全面体现了印度舞蹈的宗旨。

印度舞蹈善于用各种手势、眼神、颈部动作和面部表情把丰富的舞蹈语言和感情传达给观众。就手势而言,演员单手可以做出 18 个姿势,双手可以做出 24 个姿势。一个好的演员要熟练掌握表演 9 种表情的技巧。

三、西方文化的冲击

印度一次次被征服的历史决定了它是多种文化的共同舞台。在近代,随着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相继侵入,西方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印度。最先来到印度的西方传教士,规劝土著接受洗礼,改宗基督教,力图使西方文化取代东方文化。18世纪中叶,普拉西战役(1757)之后,印度开始沦为英国殖民地。此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侵略扩张,英国完全征服印度。为了巩固殖民统治,英国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科技文化和推广英国式教育,培养殖民统治人才,由此引发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碰撞。

西班牙人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是将基督教文化传入印度的重要人物。1540年他受葡萄牙国王的派遣,并以教皇使者的名义东来印度传教。他在果阿和柯钦等地从事传教布道活动,还创办西方教会学校,引进西方文化教育。此后,英、荷、法等西欧国家也向印度派出传教士。169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规定,每艘500吨以上的货船,需配备一名随行教士,各驻军要塞和人的商馆均需有一名教士,而且要求这些教士在抵达印度后学习当地语言和习俗,以便克服公司与印度商业交往中的障碍。普拉西战役以后,欧洲一些传教组织,如浸礼会、伦敦会、促进基督教知识会和皇家丹麦教会等纷纷派遣神职人员前往印度传教。西方传教士在印度的主要活动有:建立教堂,宣扬基督教教义,鼓励印度人改信基督教;翻译和出版圣经与基督教小册子;创办报刊杂志,重视舆论宣传;开办学校,推广英语教育,输入西方文化。

在西方文化不断渗入的情况下,印度传统文化曾进行了强烈的抵制和排斥,如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导火线就是因为英国人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包装纸包子弹,使用时得用牙咬开。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士兵认为这是对他们宗教信仰的侮辱,因

为印度教视母牛为神圣,穆斯林禁忌猪肉。于是,印度教士兵手捧恒河水,伊斯兰教士兵面对《古兰经》,发誓要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起义因此而爆发。

有意思的是,这种文化碰撞甚至在英属印度政府内部也很激烈,他们就是否在印度引进和推广西方教育制度问题产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史称“英语派与东方派之争”。^①

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教育总监麦考莱为首的一部分人从殖民利益出发,否认印度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主张推行以英语教育为媒介的西方教育制度,与宗主国的教育体系接轨,促使印度知识阶层西方化。这一派被称为“英语派”。以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为代表的一部分英国东方学家则被印度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反对全面推行英语教育。他们认为,推行西方教育最终将导致印度人民懂得和掌握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观念,一旦他们觉醒,英国将难以保持在印度的既得利益。因此,继续保持印度传统的教育制度,对英国殖民统治并不会构成威胁。这一派被称为“东方派”。两派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保存和发扬印度民族文化,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外来文化的渗透和挑战。这场争论不仅在英印当局上层中出现意见分歧,而且波及到印度知识界。

在这场争论之初,东方派占优势。东方派将一批印度古典文学作品和经典文献翻译成英语,向西方介绍印度文化。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出台了一些对传统文化有利的措施。1813年规定,政府每年应拨出不少于10万卢比的款项,用于印度文学的复兴和提高,奖励印度本国的知识分子。1815年成立孟买教

^①刘文龙、袁传伟主编《世界文化史》(近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1-232页。

育协会。1817年又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印度学院。后来，随着英国在印度殖民入侵的扩大，对殖民统治的人才需求更为迫切，英语派遂占了上风。1833年教育总监麦考莱不顾东方派的反对，决定在印度强行推广英语教育制度。1844年，哈丁总督宣布，今后印度政府中的文官职务将优先给予懂英语者。1854年出台的《急件》（印度教育新方案），奠定了英属印度英语教育的基础。至此，两派之争，以英语派获胜和英语教育体制在印度的确立而告终。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在印度学者中间的反映是，起初，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人由于过分崇尚欧洲文化而蔑视本民族的遗产，而另有一些印度学者完全排斥西方文明。后来，山拉贾·拉姆·摩汉·罗易等人发起的改革运动，比较正确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他们一方面强调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经典的深刻真理，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进步思想。

四、传统文化与印度现代化

今天的印度，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最典型的例子是已经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和种姓观念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印度社会之中，这是导致印度现代化进程滞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独特现象，它是世界上等级结构最为森严的制度。等级制度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有过，但是没有个国家像印度这样严格、强烈和延续得如此长久（大约有3千多年的历史）。每一个印度教徒一出生就隶属于其家庭的种姓，社会地位终身难以改变，这是一种典型的高度制度化的不平等。种姓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各种姓的职业世袭不变；不同种姓的通婚受到严格限制；对不同种姓之间的交往也有严格的限制。除了四个基本种姓，还有一个叫作“不可接触者”的阶层，

这是一个处境最悲惨的群体。印度宪法将“不可接触者”列入宪法附表，称之为表列种姓。宪法对表列种姓实行某些特殊的照顾政策，但是，种姓歧视依然存在。印度独立之初的经济条件比中国解放时要好，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领导人也曾经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的事业，然而，半个世纪以后，印度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落在了后面。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以种姓制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方面。

印度独立后，尽管种姓制度名义上已通过法律废除，但实际上仍在印度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起不良作用。

首先，它在政治上不利于印度的统一和团结。种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一直是印度社会的痼疾。从古到今，种姓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大多数贱民和低种姓仍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收入菲薄；而大多数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企业家出身于高种姓。

其次，种姓制度影响经济的发展。种姓制度把社会分成不同的社会集团，许多人想问题、办事情从本种姓的利益出发，这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在种姓制度下，每个人的职业是固定的，代代相传，不易更改，这自然影响到一些人才能的发挥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第三，种姓制度是印度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在种姓制度下，由于实行内婚制，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童婚盛行，嫁妆泛滥，禁止寡妇再嫁，妇女地位低下等等。在印度，女儿出嫁，父亲必须准备好像样的嫁妆，许多家庭为此四处借债。沉重的嫁妆常常使得女方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结婚时嫁妆不足的妇女，不仅会遭人耻笑，婚后还会受公婆和丈夫的折磨，甚至被逼自焚或被婆家活活烧死。这种不幸的事情在今天仍然时有发生。此外，种姓制度对人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展也产生某些

不利的影响。因为,种姓制度规定,高级种姓不能吃肉、鱼和蛋等等富有营养的食物。总之,种姓制度对印度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早在 19 世纪中,马克思就曾说过,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73 页。

第三章 伊斯兰文化

第一节 伊斯兰教的产生

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在这三大宗教中,伊斯兰教是最年轻的宗教。它产生于公元 7 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后逐渐发展成遍及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的宗教。

一、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570—632)是伊斯兰教的创立者,出生在麦加一个贵族家庭,属古莱氏部落哈希姆家族。从他的祖父开始,家境趋于衰落。他的童年生活十分不幸,父母双亡,是个孤儿。12 岁起穆罕默德就跟随伯父去叙利亚等地经商,十多年的商旅生活,不仅增加了他的见识,而且使他的思想和意志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为他以后的创教活动提供了生活和思想基础。后来,穆罕默德受雇于麦加的富孀赫蒂彻。赫蒂彻的前夫从事商业,十分富有,丈夫死后她独自经营商务。当时麦加有许多有钱有势

的人向她求婚，都被她拒绝。穆罕默德的才能和美德引起赫蒂彻的尊敬和仰慕，她便向他求婚。公元 596 年，26 岁的穆罕默德与 40 岁的赫蒂彻结了婚。此后穆罕默德的生活富裕了，社会地位也提高了，然而，他并没有沉湎于富贵的家庭生活中，而是不停地思考当时阿拉伯民族面临的严峻形势，寻求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良方。

伊斯兰教产生前夕，阿拉伯半岛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原始社会已经解体，国家处于形成阶段，宗教信仰开始由多神崇拜向一神崇拜过渡。国家形成的前夜，一般都是新的权威开始走上前台，但旧的权威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期，战争、劫掠、残杀层出不穷。希望社会安宁、要求团结统一，已经成为当时阿拉伯半岛各部落人民的普遍愿望。穆罕默德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需要，创建了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将近 40 岁时，常到麦加城北 5 公里的希拉山的山洞里隐居，昼夜苦思冥想。据说在公元 610 年的一天夜晚，他在希拉山洞里正当精神恍惚之际，突然接到神灵的“启示”，一位“天使”手捧经卷来到他面前对他说：“你宣读吧”。后来，伊斯兰教就称这一夜为“受权之夜”。此后，穆罕默德在妻子和堂兄的支持下，以“安拉”（使者）的名义，采取秘密的方式，开始了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大约 3 年后，他转向公开传教。

穆罕默德建立伊斯兰教的过程，也是统一阿拉伯各个部落，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的过程。到 632 年穆罕默德逝世时，阿拉伯半岛基本趋于统一。

二、《古兰经》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基础和基本经典。穆罕默德逝世后，《古兰经》才整理成册，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令人加以修订，编成定本（亦称奥斯曼本）。

《古兰经》不仅仅是阐述伊斯兰教教义的经典和治理伊斯兰国家的政书,它还对阿拉伯语言、文字、文学的形成、传播和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古兰经》出现之前,阿拉伯半岛没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古兰经》成为阿拉伯语言的规范,为阿拉伯语言的形成和传播奠定了基础。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语从阿拉伯半岛走向世界,成为一种国际性语言。所以,有的语言学家认为,没有《古兰经》,也就没有阿拉伯语。

三、伊斯兰教的信仰、义务和节日

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有六个方面:包括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前定、信后世,俗称伊斯兰教六大信仰。

信仰安拉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一切信仰均由它派生而来。“除安拉外,别无它神”,这是穆斯林最基本的信条。我国穆斯林称安拉为“真主”。伊斯兰教认为,安拉不是一个有形体,他不受时空的限制,既无始,又无终,但是他无所不知,无时不在,无处不存,他是宇宙间独一无二、创造一切、主宰一切、永生永存的神。正由于他没有形体特征,因此不可能有他的肖像或塑像。穆斯林把一切塑像、偶像和表现神的物体都视为对“安拉”的亵渎。所以,穆斯林反对偶像崇拜。

信经典就是信《古兰经》,认为《古兰经》是唯一的真理来源。穆斯林对《古兰经》非常尊敬,平时放在洁净的地方,任何东西都不得放在《古兰经》的上面,诵读时必须沐浴净身,排除一切杂念,专心致志。

信使者就是信仰安拉派到人间来的先知、圣人,先知向人们劝善止恶,引导人类走向正道。每位使者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凡人,但是他们受安拉之命,向人们传达安拉的“启示”。《古兰经》中提到过二十八位使者,最伟大的使者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安拉的意志。因此,信奉安拉

的人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他的使者穆罕默德。

伊斯兰教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生都是由安拉事先安排好的，必须坚决相信，这就是“信前定”。

伊斯兰教的宗教义务有五项，简称“五功”，即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念功是伊斯兰教“五功”之首，主要是指念诵“清真言”，即“除安拉之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礼功即礼拜，是穆斯林面向麦加克尔白天房（古庙）诵经、祈祷、跪拜等一整套宗教仪式的总称。礼拜是穆斯林的一项重要义务。“斋”即斋戒。伊斯兰教规定，每年伊斯兰历 9 月，每个成年男女穆斯林都应斋戒一个月。在这个月中，白天禁止饮食、房事，戒除一切邪念，纯洁思想，坚持斋戒的穆斯林只能在黎明前和日落后进食，老、弱、病、残、幼、孕妇和旅行者例外，但他们以后应补上所缺的日期。斋戒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穆斯林学会节制，磨炼意志，同时也可以体验饥寒者的痛苦，激发同情和救济穷苦人的恻隐之心。课功即“天课”，指交税，用以充实国库，赈济穷人，使自己的财产更为洁净。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每年将资产作一清算，除去正常的开支外，其盈余的资产按一定的比例交纳天课：现金纳 1/40，农产品纳 1/20—1/10，牲畜及矿产亦有不同的税率。朝功，即朝觐，它是穆斯林朝觐麦加克尔白天房的一系列宗教礼仪活动的总称。伊斯兰教规定，每一个穆斯林在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和路途平安的情况下，一生须至少赴麦加朝觐一次。在教历 12 月 9 日至 12 日之间进行的集体朝觐为大朝（正朝），其他时间的朝觐称为小朝（副朝）。朝觐是为了使穆斯林摆脱世俗打算，纯洁心灵并与安拉交流，激励朝觐者的余生。

伊斯兰教有很多节日，主要的有开斋节、宰牲节和圣纪三大节日。

开斋节又称“肉孜节”，中国穆斯林亦称之为“大开斋”或“大

尔代(节)”。伊斯兰教规定,每年教历 9 月为“斋月”,斋月的最后一天寻看新月(月芽),见月的次日即行开斋,为开斋节。这一天一般在教历的 10 月 1 日。开斋节期间(3 至 5 天),穆斯林都要举行聚礼讲道和其他庆祝活动,携带食品走亲访友。

宰牲节又称“古尔邦节”,中国穆斯林亦称之为“小开斋”或“小尔代(节)”,在伊斯兰教历 12 月 10 日举行。穆斯林每逢这一天要沐浴盛装,在清真寺内举行聚礼,宰杀牛、羊、骆驼,互相馈赠以示纪念。中国的哈萨克、塔吉克族的穆斯林还要在节日中举行叼羊、赛马、摔跤等文体活动。

圣纪和圣忌。伊斯兰教历 3 月 12 日为穆罕默德诞生纪念日,称为圣纪;又传教历 11 年(632)3 月 12 日为穆罕默德逝世日,称“圣忌”。中国穆斯林习惯上把“圣纪”和“圣忌”合并纪念,俗称“办圣会”。主要活动有诵经、赞圣、讲述穆罕默德生平事迹和“圣训”,有些地方的穆斯林还要宰杀牛羊,设宴聚餐。

第二节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形成

一、伊斯兰教的传播

公元 7 世纪阿拉伯统一国家形成后,伊斯兰教开始向阿拉伯半岛以外地区迅速传播开来,这种传播起初主要依靠军事征服。那时军事扩张对于阿拉伯民族显然是很有利的,一方面可以为城市商人开辟商路和市场,为贫困的游牧民寻求生活出路;另一方面也可以缓和阿拉伯贵族间的矛盾。

阿拉伯人的对外征战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时代(634—644)和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形成两次高潮。640 年,阿拉伯人攻占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642 年灭波斯萨珊王朝,同年西进埃及,占领亚历山大港。7 世纪中叶到 8 世纪初,阿拉伯

人征服了中亚大部分及阿富汗，进而深入印度西北部。711年，阿拉伯人从北非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远征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穆罕默德去世后的一个世纪中，穆斯林军队征服了东起印度河流域，西临大西洋，北至里海，南抵尼罗河的大片土地，形成了疆界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

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不仅仅是为了传播伊斯兰教，但是，这种扩张的结果使得伊斯兰教得以向阿拉伯半岛外广大地区迅速传播，很快从民族宗教演变为世界宗教。

伊斯兰教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除了军事征服还有和平的途径，如移民、通婚、穆斯林商人和学者的交往等等。西非、东非及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是和平进行的，当然有时是和平与武力相结合的形式，伊斯兰教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传入中国也是采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的。

伊斯兰教迅速传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与该教实行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很有关系。圣战打到哪里，穆斯林战士就把伊斯兰教传播到哪里。每次圣战结束，穆斯林战士都要在所占领的地区修建清真寺，兴建阿拉伯式的居民点。他们对被征服的地区一般不采取劫掠式的破坏，在归顺的前提下尽可能不触动当地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它们以扩大统治基础。所以，被征服地区的上层集团为了维护切身利益，纷纷改信伊斯兰教而依附阿拉伯统治者。伊斯兰教规定非穆斯林须交人丁税，穆斯林则免交，非穆斯林的土地税比穆斯林重一至二倍，许多异教居民考虑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改宗伊斯兰教。另外，伊斯兰教的教义简单易懂，没有烦琐的礼仪和教阶制，人们容易理解和接受。

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

伊斯兰教广为传播导致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形成。

文化圈这个概念现在用得很频繁，但文化圈由哪些因素构成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当时的阿拉伯文化圈来说，它大体上有这几个要素：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宗教和统一的语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在以中东为中心的亚非欧三大洲广阔的土地上建立了统一的统治、传播统一的宗教——伊斯兰教，接着又在这些被征服地区推广阿拉伯语。强迫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使用阿拉伯语相对说来比较困难，因为被征服民族宁可在政治上屈服于征服者，在宗教上改信伊斯兰教，仍然不愿放弃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初，各被征服地区仍旧使用本地语言。如在埃及，官方语言是希腊语，日常生活语言是当地的上著语言科普特语；在伊拉克东部省区，官方语言是古波斯语，日常生活语言为阿拉马语；在西班牙流行拉丁语。

这种情况到了倭马亚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拉·麦立克（685—705 年在位）当政时才有所改观。麦立克先后于公元 699 年、700 年、705 年三次颁布命令，规定阿拉伯语为帝国的官方语言，一切官方档案、法令、文件、公簿等一律用阿拉伯语来撰写。麦立克还推行币制的阿拉伯化，将印有阿拉伯语的金币作为帝国通用货币，以取代原先帝国各地所流行的多种货币。麦立克的阿拉伯化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语在被征服民族中的推广。伊斯兰教的传播也反过来很有助于阿拉伯语的推广。到 9 世纪末 10 世纪初，阿拉伯语不仅完全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和宗教语言，而且还成为各级各类教育和学术语言。

当阿拉伯语成为各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语言时，帝国各地的阿拉伯化便宣告完成了，这大约发生在 10 到 12 世纪之间。在这个庞大的文化圈中，虽然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但是统一的语言——阿拉伯语和共同的信仰——伊斯兰教就像两条无形的纽带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文化上的认同感。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融合波斯、希腊、罗马、埃及、印度等多种文化而形成的，并借助阿拉伯语将它表达出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形成不仅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文化的繁荣，而且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极其深远。

第三节 阿拉伯文化主要成就

阿拉伯文化是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各族人民在吸收世界上古代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的。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多民族性。阿拉伯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除阿拉伯人外，还有埃及人、叙利亚人、波斯人、柏柏尔人、西班牙人、印度人等等。各族人民通过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阿拉伯文化。它是各族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二是它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地，都是世界文化发达较早的地区。阿拉伯人在征服这些地区之后，不仅接受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且又吸收了希腊和印度文化的许多成分，创造了灿烂的阿拉伯文化。他们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自然科学

在数学方面，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里学到了印度数字——0、1、2、3、4、5、6、7、8、9 和十进位法，并把它传到欧洲。这一贡献主要归功于花刺子模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萨（约 780—850），在他撰写的关于印度运算法的著作中首次介绍了印度数字并指出其诸多特点。此书于 12 世纪被翻译成拉丁文，1202 年意大利人利奥那多刊印了这部著作，这是阿拉伯数字传入欧洲的标志。欧洲人通过阿拉伯人才知道印度数字，故称之为“阿拉伯数字”。穆萨还系统地阐述了代数学和儿

何学,发明了用代数符号解题的方法。他的代表作《积分与方程计算法》于 12 世纪被翻译成拉丁文,到 16 世纪为止,一直是欧洲各大学的主要教科书。阿拉伯人还研究了面积、体积及三角和圆锥体的计算方法,他们成功地计算出圆周率的具有 17 位准确数字的值。

在天文学方面,阿拉伯人提出了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论证了地球是圆形体、地球自转以及潮汐与月球运动的关系,对托勒密所著的《天文学大成》加以考订。他们通过对子午线的长度进行实地测量,推算出地球的圆周长为 48001 公里。他们创造了太阴历和太阳历。阿拉伯著名天文学家白塔尼(858—929)编制的“萨比天文历表”,曾被翻译成拉丁文,传到欧洲。哥白尼在其所著的《天体运行论》一书中多处引用了白塔尼的天文观测数据。他修正了太阳轨道和某些行星轨道计算的方法,从理论上证明了发生日环蚀的可能性。

在医学方面,阿拉伯人继承和发展了希腊、印度等民族的医学遗产,注重翻译医学名著,在各地广建医院。到公元 10 世纪,阿拉伯临床医疗技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看病的方法是:问、验、切。问是问病史、病状、病因,验主要是验尿,切是切脉,然后对症下药。在治疗方面,阿拉伯医师首创消毒技术,用酒精消毒伤口。阿拉伯医师还懂得手术麻醉,他们将海绵放入鸦片、颠茄液中浸泡,然后放在阳光下晒干,用时再浸湿,让病人去闻,待病人沉睡后再做手术。此法传到欧洲,一直使用到 18 世纪。对于伤寒、霍乱等传染病,阿拉伯医师也能进行有效的治疗。阿拉伯名医拉齐(865—925),欧洲人称他为“拉齐斯”,曾任巴格达大医院院长,著有《天花和麻疹》、《医学集成》,均受到欧洲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医中之王”伊本·西那(980—1037),欧洲人称他为阿维森纳,他对人体生理和病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第一个发现

脑膜炎,第一个详尽描述了脊柱炎、肺炎、肺气肿等病,并提出了治疗方法。他著有百万字的《医典》,在近 600 年时间里被用作西方医学指南。

在物理学、化学方面,阿拉伯的物理学家对物体的比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测量出的物体的比重与现代数据十分接近。他们运用力学原理制造杠杆、天平等。他们还研究了回声的物理特性,并将其运用到音乐创作上。伊本·哈赛姆(965—1038)著有《论光学》,研究了光的反射和折射问题,球面镜和抛物面镜,以及日蚀、月蚀、月晕、虹等自然现象。在化学领域,阿拉伯学者改良了各种化学器具,熟练运用蒸馏、过滤、升华、溶解、结晶等方法,制造出酒精、苏打以及硫酸、硝酸、盐酸、氧化汞等化合物。沿用至今的许多化学用品的名称,如苏打、酒精等都来自阿拉伯语。

在地理学方面,阿拉伯人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以航海贸易活动著称于世,他们的足迹遍及亚、非、欧各大洲,这为地理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另外,东方和西方的穆斯林千里跋涉前往麦加朝圣,以及穆斯林礼拜、封斋都必须面对麦加方向,这些宗教活动都增加了穆斯林对地理学研究的机会和兴趣。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8)曾经四次赴麦加朝觐,游历亚非许多国家,行程 12 万公里,并以印度素丹使者的身份来过中国,他撰写的《伊本·白图泰游记》是研究当时亚非国家社会风情的重要资料。

二、社会科学

阿拉伯人不仅在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取得辉煌的成绩,而且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都有新的建树和贡献。

阿拉伯人的史学,最初是以记载穆罕默德及其弟子们的生平事迹为主。9 世纪时出现了编年通史,塔巴里(839—923)是阿

拉伯编年通史的鼻祖。他的代表作《塔巴里历史》，是一部最负盛名的阿拉伯“编年通史”，全书 13 册，约 17500 页。号称“阿拉伯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学家马斯欧迪（？—956），生于巴格达，他将 30 余年的时间用于采访的旅途中，足迹遍及亚洲各国。《黄金草原》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第一卷记述了各国历史，包括印度、中国、埃及等国的历史，后三卷记载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兴衰史。

在哲学领域，阿拉伯人把伊斯兰教教义和希腊哲学结合起来，以哲学的方法来解释信仰问题。如肯迪、伊本·西那、伊本·鲁世德等。伊本·西那（980—1037）提出了科学与宗教“双重真理论”，认为哲学和科学的真理同宗教的真理并存，认为宇宙万物及其运动有自身的规律，不受神的支配。伊本·鲁世德（1126—1198）是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集大成者，亦主张“双重真理论”。他认为物质世界是无始无终的，时间和运动是永恒的，宇宙万物的变化都有其因果关系。但他并不否认真主，认为真主是世界的“第一推动者”。

三、文学艺术

脍炙人口的《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民间文学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它的成书年代已无法考证，根据故事内容和故事中反映的习俗、社会特性等，它的流传始于 8 世纪中叶到 9 世纪中叶，到 16 世纪才基本定型。《一千零一夜》以王后讲故事为线索，将几百个故事串起来，其中有格言、谚语，有寓言、童话，有航海冒险，有宫廷趣闻，涉及的人物上至哈里发，下至庶民。该书以其离奇怪诞的题材，挥洒豪放的艺术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一副副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社会生活的风俗画。这部作品的主要成就，在于它以朴素的现实描写和浪漫的幻想相互交织的表现手法，生动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憧憬美好生活、憎

恨罪恶势力的感情，这是它几百年来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在。书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阿拉丁和神灯》、《渔翁的故事》等等在我国有广泛的读者。

此外，阿拉伯文学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

在艺术领域，宏伟壮丽的清真寺是阿拉伯建筑艺术的最高体现，巍峨的圆顶，高耸入云的尖塔，宽大的庭院，华丽的厅堂，以及精巧的拱形架构，是清真寺群体建筑的特征。在装饰方面，穆斯林喜欢用花卉、几何图案、植物图案和阿拉伯字母雕绘出各种优美的花纹，特别是用各种字体的书法抄录的《古兰经》或先知的格言，与华丽的建筑浑然一体，成为广为流传的一种伊斯兰艺术形式。

四、教育

阿拉伯人的教育从一开始就与伊斯兰教和清真寺联系在一起。对于穆斯林来说，清真寺不仅是神圣的礼拜场所，也是接受教育的地方。清真寺是阿拉伯人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学校。帝国境内清真寺林立，9世纪时，仅巴格达一地的清真寺就多达万座以上。很多清真寺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著名的学者纷纷在清真寺内设座讲学，传授各种学科的知识，吸引大批学子，培养出众多的学有专长的伊斯兰教的和世俗的人才。

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教事业迅速发展，“库塔部”意为受教育的场所，相当于中国的“私塾”式的小学已遍及阿拉伯帝国各地。课程以《古兰经》为核心，此外，学生还要学习“圣训”语法、算术、诗歌等科目。授课的主要方式是背诵，并实行体罚制度。哈里发及贵族、大臣和富贵之家，多聘请家庭教师教授他们的子弟。

到10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就有了大学。著名的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大学是10世纪中创办的，它比后来建立的埃及的艾资

哈尔大学和巴格达的尼采米亚大学更完备，除教义学系和法律学系外，还有天文学系、数学系和医学系。学校从东方聘请许多知名学者任教，因而吸引了数千名来自西班牙各地，以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学生。诞生于 1067 年的尼采米亚大学是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所宗教大学。该大学的组织管理比较严密，教师聘任需经哈里发批准，每位教师配有二至三名助教，学生享有奖学金，并可在学校食宿。它的办学模式和某些规章制度，被后来许多大学包括欧洲的一些大学所仿效。尼采米亚大学存在了 300 多年，至 1335 年并入另一所大学。

阿拉伯帝国的不少统治者都很重视教育。12 世纪末时，大马士革的高等学校就有二十所。

第四章 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就产生于信仰基督教的核心地区——西欧，当代的发达国家绝大多数都属于基督教文化圈，所以它在世界上拥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早期基督教

基督教是信仰耶稣为基督的宗教。耶稣是人的名字，基督，有时又叫弥赛亚，意思都是“救世主”。基督教产生时的关键人物是耶稣。

一、耶稣和基督教的产生

耶稣是否实有其人，历史上是有争论的。不过学者们一般都倾向于认为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但现在流传的有关他的事迹中加进了许多神异的成分。有人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元年，实际很可能是公元前几年。他的父亲是木匠，叫约瑟，母亲叫玛利

亚,家住犹太加利利地区拿撒勒。父亲死得较早,他继承父业以木匠为生。当时他的家乡盛行的是犹太教,他也是犹太教徒,到耶路撒冷朝过圣。

耶稣生活的时代异常动荡,犹太社会正发生重大变革。这时罗马帝国征服了犹太人的国家,犹太人不甘心受奴役,一次次起来反抗,但都被镇压下去。在罗马人的高压和拉拢政策的诱惑下,犹太教徒中发生了分裂,形成各种派别,但没有一种派别有能力领导犹太人的斗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犹太教的教义和戒律异常苛刻,严重束缚了教徒的积极性,同时也妨碍了犹太人吸引其他被压迫民族加入反抗罗马帝国的行列。换言之,这时的犹太教需要一次改革,才有可能领导反对罗马人的斗争。罗马帝国这时已经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异常强大,单靠犹太人的反抗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

耶稣就是这样一位企图改革犹太教的人,但他不是唯一的改革者,比他略为年长的还有一个叫施洗约翰的人。施洗约翰蔑视一切宗教上的形式主义,用很简单的语言向群众讲道。凡皈依他的人他都为其举行洗礼,意思是洗去他们身上的罪行。耶稣受施洗约翰的讲道所吸引,到约翰那里去,接受约翰的施洗。通过这次洗礼,耶稣大概开始认为自己是上帝选定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救世主)。

耶稣受洗后不久施洗约翰被捕并被处死,但他并不害怕,在施洗约翰被捕前后,他也展开了广泛的传道活动。耶稣主要在犹太下层人民中传教,深入村落与普通人共同生活,巡回讲道。讲道地点也不限于犹太教的会堂,路旁、地边都可见到他讲道的身影。讲道内容也不以经文为惟一根据,而是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人们说明上帝已经显现,正在建立自己的统治,天国即将来临,号召大家悔改。他所讲的天国在当时还不是虚无缥缈的东

西,而是意味着推翻罗马人及其走狗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建立犹太人自己的新的国家。他要求信徒们不要与现世同流合污,统治者视他为危险人物,犹太教的一些派别也十分仇视他。

耶稣传道的时间大约只有三年,追随者众多,紧随他左右的叫使徒,其余的叫信徒。他也发现了统治者对他的敌视,但他坚持要到耶路撒冷去,结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间可能是公元 29 年 4 月 7 日。

耶稣死后,门徒四散。但至今仍无法解释的是,很快,这些门徒又聚集在一起,重新鼓起勇气,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已经死而复生,仍然活着,他复活的具体时间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第三天。这些门徒就是基督教最早的教徒,这时的基督教叫原始基督教。几百年后,即公元 325 年的一次基督教的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上,把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3 月 21 日至 4 月 25 日之间)定为复活节,是纪念基督死后复活的节日。复活节是基督教仅次于圣诞节的重要节日。

二、保罗与基督教的传播

保罗是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使徒之一,另一个是彼得。保罗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是仅次于耶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最重要的功迹是进一步改革基督教,使它在整个罗马帝国传播。

原始基督教产生后,其信徒主要是贫苦群众,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罗马帝国统治者和犹太教的顽固派或犹太上层都极其仇视它,它的发展面临着很大困难。基督教能否发展成世界性大宗教,如何使它跨出犹太人的范围向整个罗马帝国传播,这个关键性的任务是由保罗来完成的。

妨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其他居民中传播的原因,是基督教还没有完全摆脱犹太教各种繁琐的规定,比如割礼,非犹太人无

法接受。此外,还有一些敌视非犹太人的教义,如认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即上帝选定要上天堂的人,而其他的民族都不是,这带有明显的歧视非犹太人的性质。

保罗原来属于敌视基督教的法利赛派,曾残酷地迫害过基督徒。但大概在公元 35 年的时候,他被差遣去迫害基督徒,当他行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时,据说耶稣向他显灵,召他做使者,他当场昏倒,三天三夜不吃也不喝。此后他改宗基督教,四处传道。他在外邦人,即在非犹太人中传教,不要求他们割礼,只要诚心相信基督都可入教,使非犹太人入教的事变得很简单。他还抬高了基督的地位,使他从犹太人的弥赛亚变成上帝的独生子,基督为了救赎人类,降生人间,然后上十字架,用自己的血为人类赎罪,通过他的死而复活、升天,使人类得到救赎。总之,保罗为基督教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打下了基础。

保罗大概在公元 64 年罗马皇帝大肆迫害基督徒时被处死。

三、从被压迫者的宗教转变为统治者的宗教

基督教产生后的几个世纪里,渐渐从一种被压迫人民的宗教转变为统治阶级的宗教。在公元 1—2 世纪,它主要只在罗马帝国的下层民众间传播。恩格斯说道:基督教在其产生时“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①。但到 4 世纪初,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终于承认了它,它于是成为统治者的宗教。

初生的基督教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朴素的社会平等思想,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皆有罪,上帝救人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很特别,许多穷人组织成一些小规模的公社,过财产共有的生活,信徒平等地聚集在一起开会、听道、祷告、吃饭、

^①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25 页。

互助。另一个特点是对富人和统治者的痛恨,《新约》的《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对门徒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信徒们都坚持认为:“我的主在天上”,不承认罗马皇帝的统治。

这样的信念和生活方式招致了一次次的迫害,但不少教徒以殉道为荣,在罗马皇帝眼中,这些教徒是斩不尽、杀不绝的。迫害的方式十分残忍,如在公元 64 年开始的那场迫害中,尼禄皇帝处死基督徒的方法有:钉在十字架上,给被处死的人周身缝上兽皮然后给发狂的猎犬撕咬,在犯人身上涂满易燃物质,夜里点上火让他像火把一样当照明灯。当然,这些历史记载也可能有渲染之处。

公元 2 世纪后期,特别是 3 世纪时,罗马帝国进入危机时期,不少上层人士纷纷加入基督教,这些人有文化、有组织和领导能力,成为教会的领导人。基督教的性质也因而发生变化,对罗马皇帝和有钱人的敌视渐渐缓和下来,而是强调爱人和服从。

鉴于基督教已成为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公元 313 年,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宽容敕令”),规定教徒信仰自由,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归还迫害时期没收的教产。君士坦丁本人后来也受洗入教。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后,各阶层群众像潮水一样涌入教会,而罗马帝国则迅速走向崩溃,许多地方的教会成了当地的权力机构。基督教带着席卷一切的气势进入了封建社会。

四、基督教的典籍、教义和传说

1. 圣经,又称《新旧约全书》,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构成,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典籍。《旧约全书》是从犹太教继承下来的经典,主要内容是公元前 1300—公元前 100 年间的以色列人的历史资料、传说等等。《新约全书》是基督的使徒和弟子著

作的汇编,但到公元 2 世纪才成书。现在关于耶稣及其使徒保罗等人的事迹,大都来自这本书。书中有许多是保罗的书信,反映了保罗及其信徒的神学主张、政治态度及当时教会的人体情况,奠定了基督教教义的基础。

2. 上帝造世说和星期天的来源。在基督教中,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他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到处是水,上帝的灵在水面上运行,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看见光好,于是把光和暗分开,并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样就有了白天和黑夜。第二天,上帝造出空气,称空气为天。第三天,上帝把天下的水汇聚在一起,于是露出陆地,上帝称水为海,称陆地为地,并让陆地上长出花草、树木等,于是大地披上了绿装。第四天,上帝造出太阳、月亮和许多星辰。第五天,上帝在水里造出大鱼和各种水生动物,还造出各种飞鸟。第六天,上帝造了牲畜、野兽、昆虫,又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造了男人再造女人,并赐福给他们,要他们多生多养,又让人管理大地、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万物。第七天,上帝的创世工作已经结束,就休息了。第七日于是定为安息日,是休息的日子。

基督教的创世说来自犹太教,这两种宗教都把七天定为一星期,第七天是休息日,是“圣日”,谁也不能工作,这就是星期日休息制的来源。

3. 伊甸园的故事。上帝创世的第六天,用地上的尘土依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一个人,又把气吹入他的鼻子,使他有灵气,这个人的名字就是亚当。接着上帝造了一个美丽的花园,即著名的伊甸园。他让亚当看管伊甸园,园里有许多树木,树上的果子香甜可口。上帝吩咐亚当说,园子里各种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但有一种叫知善恶的树结的果子(即智慧之果)不能吃,吃

了必死。考虑到亚当独居太孤单,上帝造了各种飞禽走兽,又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条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做亚当的伴侣。当时,两人都是赤身裸体,但还没有羞耻感。

园内上帝造的动物中,蛇是最狡猾的。一天,蛇对女人说,如果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眼睛就会明亮起来,也与上帝一样能分辨善恶。女人禁不住诱惑,摘下这棵树上的果子吃,又摘给丈夫吃。结果两眼果然明亮,发现自己赤身裸体,感到羞愧,于是拿无花果树叶编成裙子遮羞。

上帝知道这件事后,异常愤怒。他罚蛇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罚蛇的后代与女人的后代为仇。并对女人说:“我必增加你怀孕、生育的痛苦。你必依恋你丈夫,受丈夫管辖。”他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禁果,你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上得到吃的。地上必定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你本是尘土,也归于尘土。”

亚当给妻子取名为夏娃,意为生命之源。上帝为他们做了皮子的衣服。他又考虑到,人已经与他一样能知善恶,恐怕亚当、夏娃采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会长生不老,于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要他们耕种土地。

基督教从伊甸园的故事引出了“原罪”的教义,即人生下来就有罪。这当然是贬损人性的,使人服从于神。但这教义后来也有过积极作用:既然人有原罪,那么人都是有缺陷的,所以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否则有权的人就会滥用权力。

4. 诺亚方舟的传说。亚当和夏娃的子孙渐渐遍布整个大地,由于原罪的作用,人间充满了暴力和邪恶,大家互相残杀、劫掠。上帝后悔造了人,决定把人和所有的飞禽走兽都消灭掉。但诺亚是义人,上帝要保全他的生命,于是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诺亚,要诺亚造一条方舟,方舟要一间间分开,有门、窗,并分

上中下三层。他还说：“我要与你立约，你与你的妻子、儿子、儿媳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公一母）带进你的方舟，包括飞鸟、牲畜、昆虫，每样两个带到你的方舟里，好保全生命。你要积蓄各种各样的食物供你和他们食用。”

诺亚遵照上帝的旨意，做好了一切准备。七天后，大雨倾盆而下，一连下了 40 昼夜，洪水滔天，把高山都淹没了。地上所有的生灵都死了，只有诺亚的方舟在洪水中漂浮。大水一直肆虐了 150 天，上帝记挂着诺亚方舟，让风吹地，使水势渐落。诺亚打开方舟，放出一只乌鸦看看洪水退了多少，但乌鸦没有飞回来。他又放出一只鸽子，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飞回到方舟上来。过了七天后，他又放出一只鸽子，这次鸽子回来时嘴里衔着一枝刚折下来的橄榄枝，表示地上水已退了。再过七天后，放出去的鸽子也不回来了。又过了若干天后，上帝吩咐诺亚及其家人说可以出方舟，他要他们多多繁衍，使带来的一切生物尽情滋生，还说他再也不会惩罚人类和消灭各种活物了。他还表示与诺亚立约，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一切，天上的彩虹就是上帝与一切生命永世和好的标志。此后，诺亚的三个儿子发展成地球上三大种族：希伯来人、非洲人和北方人。

诺亚方舟的故事出自旧约的《创世纪》，口衔橄榄枝的鸽子代表和平的典故就来自这个传说。诺亚方舟的传说反映了上古先民普遍有过的一种遭遇，我国古代有大禹治水的传说，上古西亚、埃及都有大洪水的传说，考古挖掘也证实了这些传说。现存苏美尔关于英雄吉尔伽美什的史诗中就有类似诺亚方舟的描写。

第二节 封建社会里的基督教

在封建社会里，基督教是一种异常强大的宗教、政治力量，

连西欧各国的皇帝和国王一度也处在罗马教皇的控制之下。^①

一、庞大的基督教王国

经过长期的演变,基督教在 4 世纪后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王国,这个王国有自己一整套独特的制度,它的力量就得力于它的这套制度。其主要构成是:

1. 教阶制。教阶制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处在塔顶的是罗马教皇。教皇下面是主教,主教下面是神父和助祭。主教制是整个教阶制的核心,因为教皇本人原先也是一个主教,即罗马主教。主教的驻地一般是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主教施行教区内的圣事,任命、领导辖区内各地教堂的神父。主教还有权驱逐“不良”或不受管束的成员。

主教又可分好几种,如大主教,红衣主教(又叫枢机主教)和一般的主教。一般而言,主教辖区有大有小,像法国大约是一个省设一个主教。主教之上有大主教,主管数个主教区或整个国家的所有主教区,如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就主管整个英国教会的事务。红衣主教又叫枢机主教,中世纪时一般是三十来个,是天主教中最重要的主教,他们由教皇任命,有选举教皇和当选为教皇的权力,平时参与和辅助教皇管理整个罗马天主教的行政及宗教事务,领导梵蒂冈各部门和各重要教区(大主教通常是红衣主教)的工作。全体红衣主教组成红衣主教团,是教皇的高级咨询机构,在教皇缺位时负责教廷日常事务。

^①基督教被皇帝接受后,罗马帝国逐渐走向崩溃,东部与西部的联系日益困难。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于 476 年灭亡,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又叫拜占廷帝国)则延续至 1453 年,在这期间,罗马主教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矛盾渐渐尖锐起来。1054 年,东西教会正式分裂,西方的称天主教,东方的称东正教,大体上以东西欧为界(但波兰是天主教国家),本节讲的主要是天主教的情况。

2. 修道院制度。基督教成为官方宗教后,教会日趋腐败和世俗化,一些坚持宗教理想的禁欲主义者对此不满,发起了修道运动。早期的修道运动是独修,即自己一个人在荒野和冷僻之处修行。其中出过所谓“柱顶修士”“树上修士”,即长年累月住在柱顶上、树上,过苦修的生活。后来,修道的人多了,一些有影响的基督徒把他们组织起来,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建立修道院,制订准则,从事规范的隐修活动。

西欧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修道院,对修道生活有不同的主张和解释,许多主张相同的修道院结成母子关系,自成系统。一些修道院系统曾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拥有广阔的领地和庞大的财富。修道院还是教会的教育中心,许多著名的教会人士出身于修道院。大修道院院长权势显赫,一些教皇和枢机主教就出身于修道院。修道院长和院内各种神职人员及修士、修女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拥有特殊的地位,修道院是教阶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圣事制度。这是天主教把教徒从生到死的过程都控制起来的制度。圣事共有七项,其中洗礼和圣餐大概是最重要的。最初的洗礼可能是浸洗,全身或半身浸在流水中,没有流水时也可在别的水中施洗,若不能在冷水中受洗,也可用温水洗。如水不够用,也可用一点点水,三次浇在头上即可。施洗前,受洗人应禁食,口中要讲述自己的信仰,答应过基督徒的生活。受洗后,受洗人要尝一点混合的奶与蜜,然后在头上抹油,行按手礼,表示领受圣灵之意。

圣餐,又叫圣体,行圣餐礼时要吃饼与酒,饼表示基督的身体,酒表示基督的血。在最后的晚餐中,基督拿起饼和葡萄酒祝祷,然后把饼和酒分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和血,是为众人免罪而舍弃和流出来的。”天主教的圣体礼称弥撒,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预祭,诵读圣经和讲道;第二部分是圣体圣事,献上圣体圣血、祈祷和领圣体圣血。

其他五种圣事是:坚振,受洗过去一段时间后,再接受主教的按手礼、敷油礼,以坚定其信仰;告解,教徒向神父说明对上帝犯下的“罪过”,表示忏悔,神父告诉他如何通过忏悔、修行来赎罪;终傅,教徒病危时,神父使用主教祝圣过的橄榄油,敷擦在病人的五官和手足,并诵念经文,认为这可以使临终的人减少痛苦,赦免罪过,安心去见上帝;圣品,接受神职时的礼仪;婚配,教徒在教堂上举行婚礼,由神父主持,神父分别问男女双方是否同意结为夫妇,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诵念规定的祈祷经文,宣布“天主所结合的,人不能分开”,并祝福双方幸福。婚配礼体现了西方文化中对妇女的婚姻权利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以上主要是天主者和东正教的圣事,16世纪后产生的新教一般只保留洗礼和圣餐两种,有些激进的新教教派不主张圣事。

二、教权与政权

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督教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王国”,它拥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和各级法庭,不可能再接受西欧各国皇帝或国王的调遣,而是与他们分庭抗礼。当然,名义上教会只能掌管精神权力,世俗权力是国王的事情,所以教会一般也不否定国王的权力,只是它不让国王们干预自己的事务。中世纪的教会有所谓“两把剑”的理论,说的是上帝把两把剑交给教皇,一把剑是治理灵魂用的,由教皇掌管,另一把由教皇转交给皇帝或国王,由他们来治理世间犯罪之用。这里,教会不否定皇帝或国王的统治权,但又认为教皇高于他们,因为上帝的剑是交给教皇转交的,而不是相反。

教皇拥有批准皇帝、国王们婚姻的权力,不经教皇批准的婚姻是无效的,这有助于抑制君主的多妻制的出现——即使国王

事实上有多个“妻子”，但合法的妻子只能是一个。各国间有什么争执往往由教皇来裁决，甚至一些贵族也喜欢把争端上诉至教皇的法庭。教皇势力鼎盛之时是 13 世纪上半叶，他甚至 can 任意罢免世俗君主。

教、俗统治者的这种关系对西欧以后的发展影响很大，特别是这使后来的资产阶级比较容易冲破封建束缚，因为资产阶级先是从思想上发起反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斗争，联合国王们批判教会所维护的封建观念，然后，再发起反对国王的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

三、中世纪天主教的两大罪行

1. 组织十字军。1095 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列芒召开宗教会议，号召各阶层居民都到东方去夺回“主的坟墓”。他许诺凡参加远征的人都可赦免罪孽，死后可升入天堂。他还用挑逗性的语言叫人们到东方去发财，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土地肥沃，像天堂一样，人们到那儿去可以把这块流着奶与蜜的土地夺过来，成为自己的产业。当时的西欧封建化刚刚完成，社会动荡，又由于长子继承制的推行，无继承权的非长子失去生活来源，乐于出去冒险。对于他的号召，与会者不断报以“这是上帝所愿”的呼声。

次年，先后有五批人马出发到东方去。人们在衣服上缝上红十字作徽号，故称为十字军。这些队伍有的是骑士组成的，但有的是普通百姓组成的乌合之众。有的地方全村人都出走了，拖家带口，人马嘈杂，车辆拥塞着道路，几乎毫无作战能力。这些人在路上缺吃少穿，常靠抢劫维持生活。大约有 1.2 万人的这种农民“军队”在进入小亚细亚后就被消灭了。其余各支骑士武装历经千辛万苦和大量减员来到了地中海东岸。路上酷暑异常，他们穿着重装铠甲，穿行在陡峭的山脉和广阔的沙漠中，连

喝水都常发生困难，沿路的穆斯林又不断与他们展开殊死搏斗。但他们一路烧杀劫掠，于 1099 年 7 月攻下耶路撒冷，把这座城市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屠杀一空，据说有 7 万之众，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一些小国家。

此后，教皇还先后组织过多次十字军，1270 年组织了第 8 次十字军，其中 1212 年时竟兴起过所谓的“儿童十字军”。据说是成年人有罪，不能解放主的坟墓，只有无罪的儿童才有能力做到。这一年，几万法国儿童集结在马赛准备渡海到东方去。结果，部分儿童因船只遭遇大风而葬身地中海，大多数儿童被船主运到埃及，卖为奴隶。来自德国的儿童在越过阿尔卑斯山时死亡大半，其余的在意大利滞留一段时间后回国，但许多儿童因饥寒交迫和疾病而死于途中。

十字军的暴行引起了地中海东部各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创立者萨拉丁于 1187 年收复耶路撒冷。1291 年，埃及军队攻克十字军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据点，宣告了这一罪恶运动的结束。

整个十字军运动给东方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它使极端粗野的西方骑士知道了东方高度发达的文明，使他们萌生了追求东方的财富和东方生活方式的强烈愿望，同时，它使西欧的商人扩大了在地中海东部的影响，有助于他们此后的扩张。

2. 建立宗教裁判所。基督教被统治阶级接受后，内部就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派别，这些派别大多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 and 利益，因而为正统派所不容，称其为“异端”，实行残酷镇压。12、13 世纪时，西欧各地的异端影响一度相当大，教会建立了专门镇压异端的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活动最活跃的时候是 13—15 世纪，16 世纪后逐渐衰落。

对异端的判决通常有两种：死刑和苦修赎罪。死刑均采用

火刑。苦修赎罪的方法很多：最轻的是背诵祈祷文；其次是朝圣，朝圣地有多处，去什么地方，去几次，去多少时间皆由审判官决定；较重的是在公共场合接受鞭打和戴十字架；最重的是监禁，如伽利略就曾被判终身监禁。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有罪的人不计其数，被烧死的人也很多。仅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 1483—1820 年间判处的异端分子就达 38 万人，处火刑的据说有十几万。受火刑的人中，最有名的大概是布鲁诺（1600 年）。

教会也用“经济手段”来处理异端，使各级统治者对镇压异端有积极性。异端被没收的财产 1/3 归世俗国家，1/3 归宗教裁判所一般官员，1/3 归主教和审判官。有时教皇也从中分赃。在现实中，常常没有那么多的异端，一些官员，甚至国王为了邀功或为了现实经济利益，常常“制造”异端，他们鼓励人们互相告密和作伪证，但不把作证者的名字告诉“罪犯”。宗教裁判所常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不顺眼的居民，说他或她是异端，诱供、逼供是常用的方法，不招者施以拷打，或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长期折磨，逼其承认有罪。这些异端中有许多是乡村妇女，她们常常因“女巫”罪而被处死。

第三节 中世纪的大学

大学是西欧中世纪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通过辩论发现真理的传统就来自中世纪的大学。

11—13 世纪间，欧洲各地兴起许多城市。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势必要求教育有相应的发展，一些教堂和修道院办的学校规模很小，而且教会教育的日的主要是培养圣职人员，神学是其最主要的课程，根本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也不完全符合社会要求。这样，世俗学校就应运而生。

早在 10 世纪时，意大利就有了非教会办的学校，接着欧洲其他地方纷纷出现这一类学校。不少学校都把教授罗马法放在重要地位，因为罗马法强调产权，为商品经济发展所必需。这些学校是未来大学的基础。

西欧第一所大学是 11 世纪末形成的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其前身是波伦亚法律学校。12 世纪上半叶，巴黎大学形成。12 世纪后期，牛津大学也开始出现。到 13 世纪时，西欧出现了许多大学，“13 世纪是大学的世纪”^①。这时兴起的著名大学有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巴勒摩大学、西班牙萨拉曼加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国奥尔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

中世纪的大学是无国界的，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学生们为求学背井离乡，漫游各地。他们成群结队或者跟着自己的老师到处求学，或者与真正的流浪者混在一起四处流动，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是流浪者。在大学里，他们构成学生里的穷学生帮，靠为富裕的同学当仆人、甚至靠乞讨或靠寺院施舍为生。有时他们也靠充当杂耍艺人或小丑维持生计。当然，在学习到一定程度或毕业后，他们就设法谋得一份正常的职业，有的甚至进入社会上层，或加入诸如十字军等冒险活动。

关于巴黎大学的情况人们知道得比较多。学校开办初期，既无宿舍，又无教室，往往借用教堂的房子，或一些学生联合租用民房充当教室和宿舍。后来，一些施主开始专门造起一幢幢房子供学生住。当时这类房子特别多的地方，后来就叫稻草街，因为房子内不可能有什么被铺之类，学生们都睡在稻草窝里。学费也不固定，开始时通常是教师叫一个学生到学生中收集自愿捐献的钱。有时，一批学生与一批老师协商安排，在学生中分

^①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第 59 页。

摊负担。学生每天上三节课，但有的课长达三小时。第一节 6 点或更早就开始上课。教学相对自由，答问和辩论是重要的学习方法。辩论时学生自由发表意见，老师只在一边指点。名教授有时在公共广场、教堂的院子或田野里上课，以便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听课。学习虽无严格限制，考试较为严格，学生只有通过考试才能授予学位。

巴黎大学人文学科学生的学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学习是为了取得硕士学位。先是学位申请人在 12 月举行的“问答”中同一位教师展开讨论，然后在次年的四旬斋期间（复活节前 40 天）进行考试。考试通过后，再参加学士学位考试，同时他还必须讲几堂课，以证明他有能力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涯。第二阶段的学习是为了取得博士学位和在大学授课的资格，也细分为几个小阶段，最重要的是作出一系列评注，回答大学总监或副总监与四名教师组成的委员会的提问，这算是通过了学位申请。通过学位申请的人几天后在隆重召开的庆典上由大学总监授予许可证，申请人要发表一篇报告。大约 6 个月后他再经过一次类似答辩的行动，才正式获得博士学位。

学生和教师都组成行会，师生的权利都受到国王保护。国王看到这么多外省、外国人到自己的首都来，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给他带来了荣誉，扩大了他的影响。教授和学生都受到国王优待。学生们不受城市法规的管束，常常无法无天。今天的法国仍流传着当时学生们浪漫生活的故事。他们斗剑、喝酒，常常整夜把附近居民吵得不能入睡。如果有居民与学生打架或吵架，学生们就成群结队冲进居民家中进行报复，砸烂其家中物品。国王法庭常为学生讲话，所以居民只得尽量搞好与学生的关系。

13 世纪后，教会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中世纪大学的黄金

时代慢慢过去了。当然,也不能过分把这“黄金时代”想象得过分美妙,这到底是一个封建天主教会控制一切的时代。当时知识分子的悲剧可从阿贝拉尔的经历中看出来。

阿贝拉尔(1079—1142)是当时巴黎大学极有名的教师,据说当年他夜晚时在塞纳河边讲课,灯火通明,听者成千上万,名噪欧洲,各国学生皆以听过他讲课为终生幸事。他因为反对教会的权威,颂扬人的理智而受到教会的迫害,学说被斥为异端,著作被烧掉。他与一位叫哀洛伊丝的女学生秘密恋爱结婚,哀洛伊丝的叔父弗尔贝很有权势,就在一次夜里差了人去阿贝拉尔的房子把他阉割了。他被阉割后,许多学生仍不断来到他的住处,邀请他讲课。哀洛伊丝后来在修道院里度过余生,但两人还是偷偷通信,至今仍有一些信件留传下来。阿贝拉尔与哀洛伊丝的故事后来成为法国许多文学作品的故事蓝本,卢梭也曾写过《新哀洛伊丝》。

第四节 近代思想解放运动

大约从 14 到 18 世纪间,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矛头直指封建天主教会和一切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扫除了思想障碍。

一、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发生在 14—16 世纪,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涉及文学、艺术、宗教、科学和哲学等各个方面。它打着“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但并非是对古典文化的简单模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1. 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重视现世生活,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飘渺的神话,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讴歌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人有无穷力量,可以创造一切;主张理性,反对蒙昧主义,认为人的高贵就在于理性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快乐的源泉”;在文学艺术上表达人的真情实感,反对虚伪做作;重视科学实验。人文主义的这些思想通过这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哲学、历史、政治著作表达出来。

2. 文学

文学是早期文艺复兴最有成就的领域,最重要的作家有三个。但丁(1265—1321)是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时期的伟大作家,代表作有《神曲》。

彼特拉克(1304—1374)是文艺复兴第一个人文主义者,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他以其十四行诗著称于世,后世人尊他为“诗圣”。他用意大利语创作的《歌集》,共有 386 首抒情诗,颂扬了诗人对其女友劳拉的爱情,表达了他追求现世幸福与爱情的愿望。《歌集》向人们公开袒露作者向往幸福生活的内心活动,劳拉不再是中世纪那种矫揉造作、高不可攀的贵妇人,而是单纯开朗、平易可亲的妇人。

乔万尼·卜伽丘(1313—1375)的巨著《十日谈》开创了近代短篇小说的先河。《十日谈》讲的是一群男女青年因躲避瘟疫离开佛罗伦萨来到乡下,为打发时光,他们每天轮流讲故事,共讲了一百个故事。作家在书中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认为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灵魂是上帝赐予的,具有同等的机能与效用。因此,他主张人类应是天生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

区分人的标准。由此，他还导出了人在政治上平等的观念。

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15世纪以后在欧洲各国传播，欧洲各国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文学家。最主要的有：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先后写了37部剧本、两首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法国的拉伯雷，代表作是《巨人传》；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代表作是《唐·吉珂德》；德国的伊拉斯莫，代表作是《愚人颂》。

3. 艺术

后期文艺复兴最重要的成就是在艺术方面，最伟大的艺术家是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的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达·芬奇（1452—1519）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芬奇镇，是世界文化的天才之一，涉足知识的各个领域，对工程学、数学、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音乐等学科都有独到的见解，同时他也是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但他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绘画，代表作是《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这是文艺复兴中最受赞赏的名画。

拉斐尔（1483—1520）出生于意大利一个艺术世家，父亲是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家。拉斐尔自幼就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一生中创作了许多绘画作品，尤以画圣母像最为出名。他用世俗化的描写方法来处理圣母圣子这种传统的宗教题材，以现实生活中的母亲和儿童的形象为模特儿，把圣母和圣子加以理想化。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形象非常温柔、美丽，完全是一个生活中年轻的洋溢着幸福和欢乐的人间少妇，在她身后和周围往往画成一片优美的田园风光。圣子则显得天真无邪，在圣母的膝下嬉笑玩耍，没有任何神秘色彩和禁欲主义气味。《草地上的圣母》、《花园中的圣母》、《西斯廷的圣母》等是拉斐尔圣母像中的杰作。罗马教皇宫殿中的壁画《雅典学派》，也是拉斐尔的代表作。

米开朗基罗（1475—1564）诞生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卡普里斯

镇,早年起,他就为绘画所吸引,想成为画家。1488年他进入著名画家多梅尼科·基兰达约的画室,开始走上从事艺术的道路。他进步十分迅速,以致很快受到老师的嫉妒。因此,次年米开朗基罗转而进入洛伦佐·德·梅迪奇开办的雕刻学校,在那里其造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米开朗基罗的传世之作有雕塑《哀悼基督》、《大卫》、《摩西》,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纪》等。

评论家认为《摩西》是米开朗基罗的代表作。该画塑造了古犹太人最早的领袖摩西的形象。摩西突闻有人违反了《十诫》,误入歧途,内心十分气愤。作品艺术地表现了这位希伯来首领当时那种激动的表情,塑造了一位英明、果断、具有坚忍不拔精神的英雄形象,同时借此表达了当时意大利人民的共同愿望:寻求一位能推动国家统一事业的英雄人物。

4. 政治学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西方学者称他为“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出身于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但属贫寒的一支,因此,他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但他敏而好学,博闻强记,靠勤奋自学,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并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1498—1512年,他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国务秘书,负责国防和外交。1512年,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政权,马基雅维利被解除职务,但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在学术上获得了成功。

他的代表作是《君主论》,提出君主应当比狮子更勇猛,比狐狸更狡猾;统治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外交上,依靠的是实力,而不必遵守信义和诺言。马基雅维利把政治学从宗教传统和封建道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形成奠定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还出现了近代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

物托马斯·莫尔(1476—1535)和康帕内拉(1568—1639)。莫尔出身于官僚家庭,本人官至大法官,由于拒绝承认英国国王为教会最高领袖被处死。莫尔是个深沉的人文主义者,写有名著《乌托邦》,控诉当时英国的圈地运动造成的羊吃人的局面。他同情百姓疾苦,幻想着建立一个公有制的社会。康帕内拉是个多明我派僧侣,他热爱祖国,反对西班牙对意大利的统治,事泄被捕,因在狱中达 27 年,在狱中写下了《太阳城》,幻想一个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是这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另一部名著。

二、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是欧洲近代思想史上继文艺复兴以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是在教会外部对封建意识形态发起批判,而宗教改革则是从教会内部批判封建天主教会,是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步骤。

宗教改革的发动者是德国维滕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64)。教皇利奥十世为了修造圣彼得大教堂,派人前往德国出售赎罪券,引起了马丁·路德的反对。1517年10月,他把自己的意见写成《关于赎罪券功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滕堡大教堂门口,抨击罗马教廷出售赎罪券的卑劣行径,人们争相传抄,两个星期内传遍全国。

1520年,教皇下令革除马丁·路德的教籍。在这种情况下,马丁·路德连续发表了《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论基督徒的自由》三篇文章,阐明了他的宗教改革思想和政治主张。

路德的改革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因信称义”,即只要信仰上帝,就可称为义人,死后可以上天堂;一个人成为义人与是否积有善行功德无关,而在于上帝的恩典和人对上帝的

笃诚信仰。这一理论否认了“善功”和“赎罪券”的作用，同时也否定了天主教会所主张的教士在拯救人的过程中的作用。由此而推之，教阶制也没有必要存在了，因为包括教皇在内的各级教士在上帝面前并不比平常人更高贵。(2) 圣经是惟一的权威。按天主教传统的解释，教士是上帝在世界上的代言人，上帝通过他们把自己的旨意传达给普通百姓，这一理论再次否定了教士和教阶制的作用。由于教士的作用降低，也没有必要举行那么多的圣事，只留下两种就够了，即洗礼、圣餐。(3) 不需要有一个教皇，由教徒来选举教会的管理人员，这是主张圣经是惟一的权威的必然结果。(4) 普通信徒皆为教士，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5) 天职观：只要做好日常工作就可以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反映了路德的人文主义思想。

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得到了一些诸侯的支持，但当时德意志帝国的皇帝是支持天主教的。支持路德的诸侯与支持皇帝的诸侯经过长期战争，1555年，查理五世与路德宗诸侯签订了《奥格斯堡和约》，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即诸侯信什么教，其领地内的居民就信什么教。天主教的大一统局面维持1000多年后终于被打破了，路德宗的合法地位由此得到确认，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找到了一个可以发展的空间。路德宗后来还传播到了丹麦、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

宗教改革中另一个著名人物是加尔文（1509—1564），他在接受路德的基本教义后，又提出了自己独立的宗教主张。

加尔文神学思想的核心是“预定论”。他认为，上帝从创世纪以来，就把世人分为“选民”和“弃民”，前者注定得救，后者注定下地狱。这是人的意志无法改变的，所以功德根本与得救无关。但是，按照加尔文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可以对他们在世上的行为漠不关心，谁是“选民”，谁是“弃民”是以人在现世

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为标志的。成功了就是“选民”，失败了就是“弃民”。这样，加尔文把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分化、商业竞争的成功与失败的社会现实加以神化，鼓励追求财富。他认为平信徒要做的就是荣耀上帝和证明自己是选民，标志就是在现世上的“成功”。

加尔文对教会组织进行了改革。他主张平信徒管理教会，教会设牧师、教师、执事和长老。牧师负责解释圣经、施行圣礼等；教师负责宣讲圣经；执事掌管教会的慈善机关；长老掌管教会和维持道德纪律与社会秩序。“长老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从信徒中选举产生。这种长老制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受到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西欧各国的欢迎。

加尔文还主张教会要监督国家、社会和家庭。他不要求其信徒过修道僧般的独身生活，像路德一样，主张教士结婚，享受天伦之乐，但享乐要有节制，要避免一切纵情于声色的财富炫耀，不能完全屈从于俗世的美、艺术等，而是要活泼的、为理性所支配的生活方式。他不准跳舞、演戏等，还下令烧掉各种艺术品。这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要求节制自己消费欲望的思想。

加尔文的教义在西欧传播更广泛，荷兰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在加尔文的旗帜下进行的。英国和北美的清教徒都是极其典型的加尔文派的信徒。

三、启蒙运动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欧洲近代思想解放的第三场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封建意识形态在思想上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资产阶级思想臻于成熟。

1. 启蒙运动概况

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从时间上说，它开始于

17 世纪末,18 世纪末达到高潮。从范围上说,启蒙运动波及西欧各个国家,但其中心是在法国。

启蒙运动出现于 17 世纪末的荷兰和英国,因为这两个国家较早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荷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斯宾诺沙(1632—1677),其代表作是《伦理学》。英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霍布斯(1588—1679)和约翰·洛克(1632—1704),前者的代表作是《利维坦》,后者的代表作是《政府论》。

启蒙运动在法国经历了三个时期。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为准备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梅叶(1664—1729),其著作《遗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早期作品之一。18 世纪中期是启蒙运动全面发起并进入高潮阶段,代表人物是伏尔泰(1694—1778)、孟德斯鸠(1689—1755)和卢梭(1712—1778)。伏尔泰的代表作有《路易十四时代》、《哲学通信》、《哲学辞典》;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是启蒙时代的名著。18 世纪中后期,启蒙运动继续发展,其代表人物是狄德罗(1713—1784)等人,他们编纂的《百科全书》是这时期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

启蒙运动还波及德国、俄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国,这就使启蒙运动超出西欧范围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场带有世界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2. 启蒙运动的思想内容

启蒙运动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崇尚理性。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一直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有力思想武器,在整个 18 世纪它几乎成了科学的代名词。启蒙思想家把抽象的人作为一切事物的中心,用人的理性来代替神的意志,以人的理性来检验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种种制度、法律和政策。恩格斯曾这样评述道:“在法国为行将到来

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人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①

其次是提倡科学，反对愚昧。伏尔泰、狄德罗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倡导和宣传自然科学。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一书中系统地介绍了牛顿的科学理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全名就是《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或工艺详解辞典》，撰稿人中不少人是科学家。

第三，向往自由、平等的社会。自由作为与封建压迫相对立的政治观念，自然成了启蒙思想家的追求。斯宾诺沙认为自由是天赋人权之一，而且特别主张思想和言论自由，并认为思想和言论自由是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必要途径。为了保护自由，人们应该作出一切努力，甚至牺牲生命。洛克也认为自由是人类的自然权利之一，自由高于一切。卢梭不仅主张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之一，而且特别崇尚个人自由，强调个人不受他人的压迫和支配。他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契约所建立的国家也不是用于限制和破坏自由，而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由。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自由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一个人能做法律所不禁止他去做的事情，不强迫他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换言之，自由要受到法律的管束，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限，因为其他人也是自由的。

总之，启蒙思想家对自由作了较全面的理解：一方面，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另一方面，自由不能无限，无限的自由将带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

新的专制从而丧失自由。

第四，权力制衡。洛克是西方分权和权力制衡学说的奠基人。他把国家的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执行权和外交权。执行权和外交权实际上可以合二为一，即行政权。洛克认为，立法权和执行权应该分立，因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就会滥用权力，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从而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此外，他还强调人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作用。

孟德斯鸠是西方分权和权力制衡学说的完成者。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认为如果三权集于一身就会导致暴政，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能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从而保证自由，平等的实现。他的这一思想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君主立宪派所采纳，并体现在《人权宣言》和 1791 年的宪法中。

经过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西方近代思想和文化最终确立。这一运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五节 科学技术革命

通常认为，从 1500 年至今，人类历史大体上发生了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从 1500 年到 19 世纪中期为第一次，19 世纪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第二次，20 世纪中期以来为第三次。

一、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

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成就是天文学革命，经典力学的创立及英国工业革命中的许多重要发明，此外还有解析几何、微积分的发现，血液循环的发现等。

1. 哥白尼与天文学革命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约前 582—前 500）及其学派提出了大地、天体是圆球的假说，同时还认为天体运动都是匀速的圆周运动。至于各个天体的中心问题，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生了分歧。有的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有的认为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到罗马帝国时，古代天文学的集大成者托勒密（约 90—168）的地心说占了优势。中世纪里，基督教把这作为正统的理论，地心说遂牢牢占据了人们的头脑，但丁的《神曲》就是根据地心说来写他游地狱和天堂的经过的。

中世纪后期，自然科学在慢慢发展，地心说越来越与人们观察到的现实相矛盾，但推翻地心说意味着反叛基督教，哥白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掀起天文学革命的。

哥白尼（1473—1543），波兰人，十岁丧父，由其舅父抚养成人。18 岁时进入克拉科夫（当时波兰的首都）大学学习，后来两次去意大利留学。在大学教授的影响下，他开始萌生了“日心说”的思想。1516 年，哥白尼开始写作《天体运行论》，提出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地球等行星都绕太阳转动。1536 年，这本书基本完稿，但由于害怕教会的迫害，一直未敢发表。当该书出版时，哥白尼已卧床不起，且失明，据说，哥白尼收到《天体运行论》的样书后，只用手摸了摸书的封面，就与世长辞了。

传播并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理论的是布鲁诺、开普勒和伽利略等人。布鲁诺（1548—1600）20 多岁时就成为日心说的坚定信徒。而且，布鲁诺还进一步认为：太阳并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而只不过是太阳系的中心；太阳与其他恒星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其他千千万万恒星都是各自所在星系的太阳。布鲁诺还甚至推断，不仅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整个宇宙根本没有中心。

布鲁诺的大胆思想招致教会的不断迫害。1592 年，他被诱

捕。在狱中被囚禁了八年后,1600年,罗马教廷将布鲁诺处以火刑。289年后,罗马宗教法庭宣布为布鲁诺平反。1889年,在布鲁诺殉难的罗马鲜花广场上,人们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树立了他的铜像。

开普勒(1571—1630)生于德国南部,祖父是当地有名的贵族,但到他父亲时已经没落。开普勒自幼体弱多病,幼年时席卷欧洲的天花毁坏了他的面容,猩红热又损坏了他的视力。但他坚持刻苦求学和钻研,经过长期努力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规律,使哥白尼的日心说更为完善。其三大规律中的第一条是:地球和行星运行的轨道并不是正圆,而是椭圆。他还得出行星运动不是匀速的结论。这些重要的发现弥补了哥白尼学说的缺陷,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受毕达哥拉斯的影响,认为正圆是最完美的形体,而匀速圆周运动是最完美的运动,哥白尼也沿袭了这一古老的错误。

2 近代科学技术的奠基人伽利略

伽利略(1564—1642)生于意大利西部滨海城市比萨,父亲是音乐家,他希望伽利略去经商,而伽利略本人喜欢数学。那时科学的地位很低,父子经过争执达成妥协,伽利略既不去经商,也不去搞数学,而是去学医。

在比萨大学学习期间,伽利略发现了摆的等时性定律。比萨市的一座古老教堂的大厅内挂有一些大吊灯,由于海滨多风,所以这些吊灯总是在风中来回摆动,对此,谁也没有在意。可是,青年伽利略却对吊灯摆动现象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以自己的脉搏作时间计算单位,对吊灯的摆动进行观察和分析,最后他发现,吊灯的摆动周期与吊灯的振幅无关,无论吊灯的振幅多大,摆动周期总是一样。这就是摆的等时性原理,此时,伽利略年仅19岁。这一原理后来被应用于钟表的制作。

伽利略对数学、力学的兴趣日益浓厚,而在医学上不能尽心学习。结果,比萨大学医学院拒绝发给伽利略毕业证书。但十分有趣的是,数年后,由于伽利略数学方面的才能,比萨大学聘请 25 岁的伽利略出任数学教授。

伽利略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自由落体定律。大约在 1609 年,伽利略进行了著名的斜面实验:让一只小铜球从一个用木板做成的光滑平直的斜面上自由滚下,记下每一个单位时间内小球滚过的距离。他不断改变木板的长度和倾角,通过上百次的反复试验,推算出小球沿斜面滚下的运动是匀加速运动。当木板的倾角变成 90 度时,小球由滚动变成垂直下落,下落的运动也是匀加速运动。由此他得出了自由落体定律:物体下落的快慢只与时间或距离有关,而与重量没有关系,从同一高度下落的物体,不管它们的重量是否相同,必然同时落在地上。这就否定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重物比轻物下落快”的结论。

伽利略在天文学上也是成就卓著。1609 年,他制造出一架能放大三十倍的天文望远镜。1609 年 8 月 21 日夜晩,当伽利略攀上威尼斯钟楼的楼顶,把他的天文望远镜指向夜空时,一幅奇异的天体图景立即在天文望远镜中展现出来:原来,月亮并非平常看到的那样圣洁完美,而是遍布着数不清的环形山及火山遗迹。此后伽利略观察到木星有四颗卫星,就像一个小小的太阳系;金星与月亮一样亦有圆缺,证明它确实运行在地球与太阳之间,与哥白尼安排的次序相一致。他还观测过太阳,在西方天文学史上最早观测到了太阳黑子,而且还最早观测到太阳黑子的移动,这说明太阳本身也处在自转之中。

伽利略的发现引起轰动,但神学家们称伽利略在望远镜中耍了魔术,才使望远镜中出现了幻影。所谓的月亮表面的群山、木星的卫星、太阳的黑子、金星的圆缺,统统不过是望远镜中的

幻影，因为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记载。1633年，教会审判了伽利略。罗马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作了如下判决：“太阳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静止的原理在哲学上是荒谬的、虚伪的；大地不是世界的中心、不是静止的而且是昼夜运行的原理，在哲学上也是荒谬和虚妄的。”伽利略被迫在宣布它有罪的判决书上起誓：“地球并不环绕太阳运行”，但据说他在判决书上签字后，又喃喃地自语说：“可地球仍在转动。”

1980年，教廷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该案，准备为伽利略平反。1983年，该委员会公布调查结果：“给伽利略定罪的法官犯了错误”；“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些错误”。1992年，教皇保罗二世正式宣布，当年对伽利略的判决是错误的，“伽利略案是一个悲剧”，是教廷过去“拒绝接受科学进步”的象征。

3. 牛顿创立经典力学

在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中，发展较快、成熟较早的是经典力学。对经典力学的创立作出最大贡献的是牛顿（1642—1727）。牛顿出身贫寒，因成绩优异被推荐入剑桥大学学习，他边学习，边打杂，以便减收学费，而且还可以免费得到午餐。牛顿就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下开始科学生涯。他首先在数学方面显示出才华，在获得硕士学位留校后，他的老师数学教授巴罗（1630—1677）主动让出自己的讲座，使他在26岁就成为数学教授。牛顿在天文学、数学、光学、热学、热力学等方面成就巨大，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据说，牛顿是在无意间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1665或1666年夏天，他坐在苹果树下沉思时，一只熟透的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心里想，苹果为什么总是笔直地落在地上呢？苹果为什么不落向旁边或往上升，而始终不变地落向地中心呢？无疑，原因在于地球吸引着苹果。物质必定具有一种

吸引力：吸引力的极点必定在地球中心，而不是地球的任何一边，因此，苹果垂直地下落，即落向地中心。如果物质如此吸引着物质，吸引力必定与物质的分量成正比。所以，不但地球吸引着苹果，而且苹果也吸引着地球。牛顿将这一思想发展成万有引力定律，其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专门论证这一定律的。

牛顿还在吸收伽利略的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作用与反作用定律。这些成就使他成为经典力学的创立者。他还享有与莱布尼茨共同发明微积分的荣誉。

4. 瓦特发明蒸汽机

英国工业革命中有一系列重大发明，如纺纱机、织布机、用焦炭炼钢的方法等，但最重要的发明是蒸汽机。

瓦特(1736—1819)生于苏格兰一个小镇的工人家庭，由于家里贫穷，只受过初等教育。1754年瓦特到伦敦做学徒，按照伦敦的惯例，学徒工要当七年才能满期，但他没有这份耐心。1757年，瓦特来到格拉斯哥大学所属的一个机械车间做机修工，在这里，他一边学习机械技术，一边与格拉斯哥大学的师生建立了联系，从中学到一些科学知识。到1760年，瓦特已成为一个不仅具有实践经验，而且具有相当科学理论知识的青年机械师。

在瓦特以前，已经有人在试制蒸汽机，其中最好的一种叫纽康门蒸汽机，但这种蒸汽机的一些关键问题尚未解决，所以还没有实用价值。在有了一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后，瓦特产生了革新纽康门蒸汽机的强烈愿望，开始了反复的分析和实验，并在1765年时使蒸汽机的效率成倍提高，但离实用和推广仍有距离。

瓦特是时代的产儿，因为如果时代不需要蒸汽机，他就会得

不到试制蒸汽机必需的资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有两位富有的企业家资助了瓦特，一位是罗巴克，另一位是博尔顿。罗巴克对研制新式的蒸汽机极感兴趣，全力资助瓦特，直到自己濒临破产为止。博尔顿不仅在经济上支持瓦特，而且还介绍瓦特参加了伯明翰地区著名的科学社团“圆月社”，使瓦特广泛接触各类学者，进一步增长科学知识，开阔了视野。

1781年，瓦特用一个齿轮装置将活塞的直线往返运动转化为轮轴的旋转运动。这种改进使之成为一切动力机械的“万能蒸汽机”，彻底克服了纽康门蒸汽机的缺点。1782年，瓦特又设计出双向汽缸，让蒸汽轮流从活塞的两端进入。瓦特后来还发明了离心调节器，以调节蒸汽的输入量，这进一步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

从1761年开始接触蒸汽机，到1782年完成改良，瓦特经历了21年的漫长岁月。1785年，瓦特蒸汽机开始安装在诺丁汉舍尔纺纱厂。1801—1804年间，英国棉纺织厂改用蒸汽机代替水力发动成为普遍现象，瓦特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使工业革命进入新高潮。

5. 斯蒂芬森发明火车

工业革命中，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问题突显出来，迫切需要新的运输工具。1803年，美国人罗伯特·富尔敦发明了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船只。1838年，完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汽船“大西方号”胜利地横渡大西洋，证明了汽船用于海上远航的安全性。在这期间，英国工程师斯蒂文森（1781—1848）发明了蒸汽机车。

1814年，斯蒂文森试制成功第一台具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车。这台机车载重30吨，时速6—7公里。但其外形比较难看，行驶时剧烈颠簸，铁轨易受损坏。据说当时试车时，极其强烈的

震动破坏了路轨,造成翻车,车上的交通公司董事长及一位议员摔伤。

斯蒂文森用十多年时间对机车和轨道进行技术改革。1825年9月27日,他亲自驾驶牵引26节车厢的机车,车上运载着90吨货物和450位旅客,以24公里的时速,行进在由他主持建造的世界第一条铁路线斯托克顿—达林顿铁路上,铁道两旁参观的人有如盛会一般,还有人骑上快马与机车赛跑。1829年,斯蒂文森又设计制造了“火箭号”,车速已达每小时50公里。

蒸汽机车的成功使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迅即掀起兴建铁路的高潮。19世纪中,铁路网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1840—1870年,世界铁路网的总长由8千多公里猛增到20多万公里。

二、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

19世纪后期开始了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这次科学技术革命与前一次有很不相同的特点。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时,科学对工业没有什么影响,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运输工业方面的种种发明,大多是由有才能的技工完成的,与科学家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则不同,科学和发明密不可分,19世纪后期一些技术成就就建立在19世纪前期和中期科学发现的基础上。19世纪30年代,德国人施莱登和施旺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细胞学说,19世纪40年代英国物理学家焦耳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全面论证了进化论。这就是19世纪的三大发现。此外,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并提出发电机的理论基础,俄国的门捷列夫1869年发现元素周期律等都是19世纪后期技术革命的理论基础。

1. 电气工业的创立

1879年,德国的西门子驾驶电动车出现在柏林夏季展览会

上。这辆车用第三轨道向机车输送 150 伏直流电，后面拖着可乘坐 18 人的三节车厢，被认为是第一辆有轨电车。三年后，西门子又创制了无轨电车。这一技术成就就是法拉第的电磁感应理论的产物。

西门子是一位“集科学家、工程师和商人特点于一身的多才多艺的人物”，这正是近代科技工作者和实业家的风格，被称为近代德国科技之父。他的公司在电机技术方面遥遥领先，后来发展为德国电气工业的最大公司之一。

在电器的发明中，最著名的当然是爱迪生（1847—1931）。爱迪生是美国的大发明家，被称为“打开电气时代的领袖”。他一句常说的话是：“发现并非发明。”这里的意思是发现多少还有一点偶然的性质，而发明不是凭头脑漫无目的地探索，不是碰运气的结果，而是有目的地追求的产物。他一生共有近两千项发明，有人说他踢坏了美国专利局的门槛。他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研究所——“爱迪生发明工厂”，即 1876 年春他在新泽西州一个名叫门洛帕克的偏僻村庄建立的工厂。这家工厂外表看并不大，宽 30 英尺，长 100 英尺，人们很难看出他想生产什么，但他却有一个很具体的目的：每十天搞出一个小发明，每半年左右搞出一项大发明。他和他的工厂曾有过上千种发明，后来人们把他称为“门洛帕克的巫师”，爱迪生的发明中，最伟大的是电灯和留声机等。

19 世纪中，就有人在研究电灯，19 世纪 60 年代，英国沿海的灯塔已使用弧光灯。1876 年，在费城举行的美国建国百周年展览会上，三盏露天的弧光灯放射出令人炫目的光芒，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爱迪生正忙于研究留声机，他对用电来照明的问题也有兴趣。1878 年他成立电灯公司，要为家庭照明发明一样方便的东西，因这时已较广泛使用的弧光灯和煤气灯都

不适合在室内使用。他对纽约《太阳报》的一位记者透露了他改造整个照明系统的想法：中心电站通过电力网向各家供电，电流点燃千家万户的电灯。他还预言，仅在纽约闹市区，很快就有 50 万家人会使用电灯。这时他的实验刚刚开始，但这些预言使他很快得到了范德比尔特及德雷克塞尔 - 摩根公司的资助。

爱迪生一边实验，一边宣传。1879 年 12 月 21 日，纽约《先驱报》的头版新闻宣称：“爱迪生的电灯是伟大发明家在电力照明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只需一张纸，不用煤气，不要火焰，价比油廉，棉丝能产生明亮光线”。爱迪生宣布：1880 年除夕，门洛帕克将用神奇的新灯照明。从圣诞节到新年的一个星期里，人们纷纷拥到门洛帕克，观看爱迪生的“神奇之光”。一台直流发电机供电的四十盏白炽灯使人们惊叹不已，特别让人惊讶的是它可以随时打开和关闭。接着，他设计了在曼哈顿岛南部建立美国第一个中央发电厂。1881 年的巴黎博览会上爱迪生展出了他的照明系统模型。纽约的照明系统于 1882 年 9 月 4 日下午开始启用，到夜晚时，人们发现电灯是那么可爱。《纽约时报》的评论说：“直到 7 点钟左右夜幕降临时，电灯才真正显示其威力，人们看到它是那样明亮，又是那样稳定”。

爱迪生成功的诀窍是面对市场和依靠集体的智慧。他不相信什么灵感或发明天才，他的传记作者说他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比他早几十年就开始研究电灯的英国的斯旺，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自己的地下室里一次次做实验，用钨丝做灯泡的试验也是他开始的，爱迪生只是受报纸上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影响后才从事这种试验的。由于爱迪生是集体进行研究，集中了集体的智慧，所以爱迪生成功了。

电的开发和利用，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文明的进步带来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独立的电力工业部门形成、壮大，发电

机、电动机、电车被大量生产并投入使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

2. 内燃机和汽车、飞机的发明

内燃机因燃料直接在发动机气缸内燃烧而产生动力,为区别于蒸汽机(锅炉和气缸分开的外燃机)而得名。1862年,法国工程师德罗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内燃机的四冲程工作原理。1876年,德国人奥托(1833—1891)根据德罗夏的理论,建成以煤气为燃料的内燃机。它完全摆脱了对蒸汽机的模仿,获得了更高的机械效率。后来,内燃机经过改进,变得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用汽油发动。1892年,德国的狄塞尔制成使用廉价的柴油作燃料的柴油机。

内燃机使用液体燃料,不需要笨重的锅炉,很快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中得到广泛使用,汽车和飞机随之出现。

1885—1886年间,戴姆勒和其德国同胞本茨(1844—1929)各自独立地制成了最早可供实用的汽车,随后两人合办了汽车制造厂。1895年,爱尔兰发明家邓禄普在车轮上安装了可充气的橡胶管,改善了行车条件。从此,轮胎汽车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1893年,美国人福特(1863—1947)试制出时速达到25英里的汽车。他于1903年创办福特汽车公司,通过技术革新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流水作业法,使生产成本降到原先的1/10。从此,汽车开始大量生产。福特公司20年间生产汽车1500万辆。占当时世界产量的一半。福特本人被称为“汽车大王”。

内燃机的研制成功还导致飞机的发明。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在双翼滑翔机上安装了自制的汽油引擎和螺旋桨,在北卡罗来纳州试飞。最好的一次留空59秒,飞行距离约260米,开辟了航空的新纪元。

内燃机使用液体燃料，推动了石油开采业和提炼业的发展。德国、俄国和美国的科技人员研制成功在高温、高压作用下分解石油的新技术，掌握了石油精炼方法，使石油继电之后成为极其重要的新能源。世界第一口油井 1859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开钻。此后，石油产量直线上升，由 1870 年的 80 万吨增加到 1900 年的 2 千万吨。

3. 电信工业的创立

先是有线电报、电话的发明。1837 年，美国画家莫尔斯制成实用有线电报机，他还用点和线代替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发明了莫尔斯电码。同一年，他说服美国国会花了 3 万美元，在华盛顿与巴尔的摩之间架设了世界上第一条有线电报线路。此后，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有线电报线路也相继架设起来。1846 年，英国还成立了第一家电报公司。

19 世纪 50 年代初，英法在多佛尔和加来间铺设海底电缆。1866 年，横贯大西洋的海底电缆也铺设完成，欧洲市场与美国市场紧密地联系连接起来。

1876 年，美籍苏格兰人贝尔(1847—1922)发明了电话。贝尔发明电话之初，不少人对电话是否有实用价值持怀疑态度。为此，贝尔几乎跑遍美国所有的大城市进行宣传 and 通话实验。1877 年，有人向波士顿的《世界报》发了第一份用电话发送的通讯稿。1881 年，贝尔在美国建立了第一家电话公司。1884 年，波士顿与纽约之间架设了第一条长途电话线路。

非常有趣的是，在 1876 年 2 月 14 日这一天，当贝尔去专利局申请电话专利时，美国的另一名工程师戈尔连也在这一天去申请电话的发明专利。戈尔连也发明了电话，他的电话与贝尔的电话在工作原理上是一样的，只是使用起来没有贝尔的方便。另外，戈尔连在发明电话以后没有像贝尔那样去全国大力推广，

因此他失去了发明电话的名誉。

接着是无线电技术的发展。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1831—1879)提出电磁理论,论证了电磁波的存在,并预言在自由空间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等于光速,这就揭示了利用电磁波通讯的光辉前途。德国科学家赫兹(1857—1894)通过实验,证实了麦克斯韦的设想,为无线电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1894年,年仅20岁的意大利人马可尼(1874—1937)从赫兹去世的卜告中了解到电磁波的性质,产生了利用电磁波进行无线电通讯的想法。1895年,马可尼成功地实现了一英里距离的无线电通讯。同年,俄国物理学家波波夫(1859—1905)也成功地表演了用电磁波传递摩尔斯电码的操作。

1906年,美国物理学家费森登(1866—1932)发明无线电广播,使人们第一次听到用电磁波传来的音乐和新闻。1923年,电磁波被用于无线电传真。此后,电磁波应用于许多新的技术领域。

电报和电话的发明,成为扩展人类感官功能的革命。它们与一系列新交通工具一起,把相距遥远的人类紧密联系起来。信息时代的到来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4. 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

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开启了物理学革命的序幕。19世纪末以前,由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的伟大成就,使人们一直认为物理学方面的重要问题已经全部解决,新的发现只能是对现有理论作些小修小补。当年轻的德国人普朗克(1858—1947)向他的老师表示要献身于理论物理学时,老师的回答是:“年轻人,物理学是一门已经完成了的科学,不会再有多大的发展了。将一生献给这门学科,太可惜了。”但实际上,19世纪末经典物理学已经碰到了一系列用牛顿的理论无法解决的难题,

一些人知难而上,导致了物理学的重大突破。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1845—1925)发现了一种具有强穿透力的新的神秘射线——X射线,使用X射线照相,可以照出绝缘包皮中的金属线,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伦琴夫人的手骨照片上的手骨和手指上的戒指都清晰可见。伦琴的论文和照片发表后,立即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手骨照片则成为当时最轰动的新闻。

X射线是一种放射性现象,它的发现说明物理学还有许多亟待探索的未知领域。人们开始研究放射性的物质。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1852—1908)发现只要有铀元素存在就有辐射产生,铀是人们发现的第一种放射性物质。

居里夫妇在研究放射性方面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居里夫人本名玛丽·斯克罗多夫斯卡(1867—1934),波兰人,后来到巴黎求学。1895年,与法国科学家彼埃尔·居里(1859—1906)结婚。在获悉贝克勒尔的发现后,她即把放射性物质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放射性”一词是她首先使用的。1898年,居里夫人发现了一种放射性比铀强四百倍的新元素,为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该元素被命名为“钋”(Polonium)。几个月后,居里夫妇又发现一种放射性更强的元素——镭(射线的给予者)。不过,居里夫妇发现的镭,还是很不纯净的,需要进一步努力才能得到纯净的镭。

居里夫妇既没有设备又没有资金,在极其简陋的实验条件下,从1898年到1902年经过整整45个月的含辛茹苦,终于从一吨沥青铀矿渣中离析出0.12克纯氯化镭,确定了镭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

镭的发现推进了原子物理学的发展,使放射学得以造福人类。居里夫妇因此而与贝克勒尔同获1903年诺贝尔奖。1906

年,居里遇车祸后,居里夫人接替他在巴黎大学的教职,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1910年,居里夫人又分离出纯金属镭,次年再获诺贝尔奖,成了第一位两度获此殊荣的人物。

居里夫妇他们着重研究的是什么物质有放射性,另一些科学家则着重研究放射性的性质。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1856—1940)在1897年发现了电子。

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打开了原子的大门,否定了原子不可分、元素不可变的传统观念,使人们的认识深入到微观领域,推动人们进一步去研究原子的内部结构,建立物质结构的新理论。总之,这三项重大成就,揭开了物理学革命的序幕。

5. 相对论和量子论

相对论和量子论是20世纪物理学发生的两场革命,对象都是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牛顿物理学建立在绝对时空观上,时间与空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但人们根据这一经典时空观解释光的传播等问题时,发生了一系列困惑,相对论应运而生。相对论是关于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关系的新理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之一。

法国物理学家昂利·普恩加莱(1854—1912)是相对论的先驱。1895年,他提出用任何实验手段都不可能测量到物质的绝对运动,而只能是物质的相对运动。可惜的是,普恩加莱受经典物理学的影响太深,未能在理论上作出根本性突破。

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出身于德国犹太人家庭。小时候他并没有显示出什么天才。但他勤于思考,据说,16岁时他就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以光速运行,他将看到一幅什么样的景象?电磁波是否会像凝固了一样静止不动?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脑际,使他坚信绝对运动是不存在的。

1905年,年仅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一篇题为《论运动物体

的《电动力学》的论文,标志着狭义相对论的诞生。1915年,在同学的帮助下,爱因斯坦又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相对论认为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与选择任何一个坐标系无关,光速不变。由此爱因斯坦提出以下结论:运动的尺子要缩短,运动着的时钟要变慢,光速是物质运动的极限速度,引力场会使光线偏转等。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空间、时间和物质的运动联系了起来,它揭示了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能解释一些用牛顿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他预言遥远的星光如果掠过太阳表面,将会发生偏转。由于白天太阳太亮,看不到星光,晚上能看到星光,但太阳下山了,所以这个预言只有在日全食时才可以验证。

1919年5月29日发生日全食,英国派出两支远征队,一支到非洲西部,一支到南美。两支队伍不久就带回了日全食时太阳的照片,经反复核对和比较,最终结论是星光在太阳附近的确发生了1.7秒的偏转。

相对论的提出具有伟大的意义,得到广泛应用,并引发了天文学革命,开拓了现代宇宙学的新道路。

量子论是反映微观粒子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它的建立是许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在1900年最早提出来,他的理论后来被称为旧量子论。

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玻尔(1885—1962)把量子观念引入原子,对原子结构作了分析。玻尔由此获得1922年的诺贝尔奖。玻尔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哥本哈根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并招揽了大批人才。他们中有27岁当教授、31岁获诺贝尔奖的海森堡(1901—1970),他在20世纪20年代开创了量子力学。其他还有1945年获诺贝尔奖的泡利,1962年获诺贝尔奖的朗道,他们都对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该研究所也成为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研究中心之一。

量子论的意义不亚于相对论。它标志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从宏观世界深入到微观世界,是当代科技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开辟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新天地,促使原子物理学、量子化学和原子能技术等新学科和新技术的产生。

三、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变化,集中体现了人类知识和科学技术以几何级数发展的特点。

1. 计算机技术

电子计算机是 20 世纪的重大发明之一,从第一台计算机诞生到今天,其发展时间只有 50 多年,但其演变速度却是惊人的。人们按照电子元件的发展,把它分为四代:

第一代是电子管计算机时代(1946—1956)。这一代计算机最主要的特点是采用电子管作为基本的电子元件,运行速度一般是每秒几千至几万次。与后几代计算机相比,它的运行速度太慢,且体积大、成本昂贵、维修复杂,应用范围小,仅限于导弹、原子弹等国防尖端科技部门。

第二代是晶体管计算机时代(1956—1962)。运行速度一般为每秒几万次以上,比第一代高了近百倍。1958 年,IBM 公司制成全部使用晶体管的计算机,编制程序不仅专业人员能做,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也可以做,使计算机应用范围扩展到商业和管理等许多领域。

第三代是集成电路计算机时代(1962—1970)。这一代的计算机体积小、可靠性强。且具有通用性和标准化的特点,因此大大减轻了人们购机的费用和编制程序的负担,促进了计算机的普及。

第四代是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时代(1970—)。这一代计算机向着微型化和巨型化方面发展。1971 年,英特尔公司把大

约 2300 个晶体管集中在一块 10.6 平方毫米的芯片上，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微型机。微型机具有体积小、成本低、操作方便等特点。计算机的微型化使其得到普及，而巨型机又促进计算机技术不断提高。1975 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亿次机，每秒运行 1.5 亿次。2000 年，美国新研制的超级计算机每秒已达 12 万亿次。由于巨型机运算速度快、贮存容量大，使它在众多领域中发挥作用，如应用于工程设计、宇航、原子能、生物工程等等。因此，巨型计算机技术标志着一个国家计算机技术的水平。

从计算机的发展趋势看，科学家们正致力于智能计算机、光学计算机和生物计算机的研究和探索。

智能计算机的主要特征是具有人工智能，像人一样能够思维，并且运算速度极快。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光电子集成电路问世，揭开了光学计算机的序幕。科学家预计，光学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可能比今天的超级计算机快 1 千至 1 万倍。生物计算机具有更优异的性能。它的最大优点是具有生物活性，能跟人体的组织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可跟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有机相连，这样一来，生物计算机就可以直接接受人脑的指挥，真正成为人脑的延伸。2000 年，美国研制出到目前为止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和生物计算机。

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是新科学技术革命最重要的内容和主要的标志之一。它迅速影响并推动了产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2. 航天技术

现代航天技术的先驱是俄国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 (1857—1935)，他在 1903 年第一次提出以火箭作为航天动力的思想。他还写了一本科幻小说，系统完整地描述了宇宙航行的全过程。他提到了宇航服、太空失重状态、登月车，这些设想与

现代太空技术完全一样。可惜,也许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但齐奥尔科夫斯基对空间技术的未来充满信心,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人类永远不会将自己束缚在地球上。”

二次大战后,航天技术快速发展。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的上天宣告了航天时代的到来,也宣告了苏联在航天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随后,美苏两国在空间展开竞赛,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是载人太空飞行。1961年4月12日上午9时7分,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驾驶“东方一号”飞上了太空。上午10时25分,飞船返回大气层,在离地面7700米时,加加林与座椅一起被弹出,安全地飘落到地面,成功地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太空飞行。

苏联的成功使美国举国震惊。在加加林飞出地球43天后,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美国要在十年内,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再让他重新返回地面”。这就是著名的“阿波罗计划”。

1969年7月21日,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月成功,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率先走出登月舱,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阿姆斯特朗的那句话已成千古名言:“这对个人来说只是一小步,但对人类来说却是一次大飞跃”。

70年代以后,空间技术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空间站(空间实验室),一是航天飞机。苏联主要发展空间站,美国则重点发展航天飞机。

世界上第一个空间站是1971年苏联发射的“礼炮1号”。80年代,苏联又推出第三代空间站即著名的和平号空间站。

美国则在航天飞机方面居领先地位。1981年2月,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首航成功。1986年1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第十次发射,但升空第73秒后发生爆炸,包括一名

中学女教师在内的机上 7 名宇航员全部遇难。这是航天史上最大的灾难性事件，使整个美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但美国人不屈不挠，1988 年“发现”号航天飞机成功升空，1992 年，代替“挑战者”号的“奋进”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

随着冷战的结束，航天技术方面出现了合作的趋势。1988 年，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欧盟国家签署有关空间站设计、开发、运行和使用等方面的框架协议。1993 年，俄国被邀加入。1998 年 11 月，国际空间站第一个组件“曙光”舱被送入指定轨道。同年 12 月，第二个组件“团结”舱被送入轨道并与“曙光”舱结合。国际空间站初具规模。2000 年，国际空间站有了第一批长住宇航员。

此外，人类不仅对月球进行探测，还对太阳系的其他行星进行探测，其中，重点是探测火星和金星。至今，太阳系的九大行星除冥王星外，人类都进行了探测。

3. 核能技术

核能最初用于军事领域。1941 年 12 月，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1901—1954)在芝加哥领导美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的建造。1942 年 12 月，反应堆正式开始运转，第一次实现了输出能大于输入能的核反应，宣告了人类利用核能时代的开始。

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1904—1967)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45 年 7 月，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西部沙漠地带试爆成功。对于这次试爆，最好的描述是古印度的一段圣诗：“漫天奇光异彩 / 有如圣灵逞威 / 只有一千个太阳 / 才能与其争辉”。

战后，各国都开展了对核能的和平利用。1954 年，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从那以后，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发展非常迅速，据日本原子能产业会议提供的资料，到 1998 年底，全世界共有核电站 422 座（其中美国 104 座，法国 55 座、英国 35

座、俄国 26 座、日本 52 座)。中国在这方面也已开始起步。1991 年,中国首座自行研究、设计、制造和建设的中型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正式投入使用。1994 年,中国首座引进外国资金、先进设备和技术建设的大型核电站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投入商业运行。

核电站在正常运行时相当安全,但万一出现事故,危害就极其严重。1986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机组爆炸,6 千人死亡,1 万多人迁居他乡,且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目前的核电站均依靠核裂变反应获得能量,但裂变反应会产生大量废料,至今仍未找到永久性处理方法。

4. 基因工程

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的发展和当代各种尖端技术在生物领域的运用,诞生了一种划时代意义的高技术,这就是基因工程。它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传统生物技术的被动状态,使得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生命的愿望成为可能。

20 世纪的最后几年,生物技术领域最轰动的事件是克隆绵羊“多利”的诞生。1997 年 2 月,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宣布,他们在 1996 年 7 月成功地用成年母羊的乳腺细胞克隆出一只小羊“多利”。

这一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人类科技的进步,它将使人们有能力快速培育大批量具有某种特殊用途的动物,并解决人类移植器官不足的问题。

当然,这一技术也带来一些难题,如能否克隆人。在克隆出“多利”后,就有人要求科学家帮助克隆他们的宠物甚至他们死去的亲人。许多国家严禁克隆人,但也有一些国家并没有对此严加禁止。

现在,科学家们正在进行着另一项大工程——人类基因组

工程。要想彻底弄清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规律，就必须揭开人类基因的神秘面纱。始于 1990 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终目的是在 15 年内绘制出人体 10 万个基因的图谱。2001 年 2 月，美、日、法、德、中、英的科学家和美国塞莱拉公司联合宣布，他们绘制出了更加准确、清晰、完整的人类基因图谱，对人类基因的面貌有了新的发现，初步揭开了人类基因的神秘面纱。

基因工程的前景是非常诱人的。它将能够实现人类的很多梦寐以求的愿望，如：想要孩子的人可以在怀孕之前预先对婴儿进行“设计”；医院将不再通过治病来赚钱，而是通过预防使人们避免进医院来赚钱；人类通过基因的调控来大大延长寿命，长寿不再是梦想。

但是，基因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又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我们将在第七章第五节来谈这个问题。

5. 纳米技术

“纳米”是一种几何尺寸的量度单位，一纳米是一米的十亿分之一，略等于 45 个原子排列起来的长度。

纳米科技以空前的分辨率为人类揭示了一个可见的原子、分子世界，它最终目标是直接以原子和分子来构造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纳米科技是信息和生命科学技术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共同基础，将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纳米科技得到迅速发展，新名词、新概念不断涌现，如纳米电子学、纳米材料学、纳米生物学等等。专家预言，知微见著的纳米科技将彻底改变目前的产业结构，它在未来的应用将远远超过计算机产业，并成为未来信息时代的核心。

纳米科技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日本工程师们制成了直径只有 1—2 毫米的静电发动机，德国工程师制成了一架只有黄蜂大

小且能升空的直升机、肉眼几乎看不到的发动机等等。

纳米科技的前景最具诱惑力的是纳米机器人。科学家们设想，未来的机器人将可注入人体血管内，可以进行全身健康检查，疏通脑血管中的血栓，吞噬病毒、杀死癌细胞等。而更先进的机器人将包含有纳米计算机，这是一种可以人机对话的装置。这种机器人一旦研制成功，有可能在 1 秒钟内完成数 10 亿次操作，人类的劳动方式将产生彻底的变革。此外，还有纳米卫星、纳米飞船、原子精密度计算机、纳米多功能抗菌塑料等等。

正因为如此，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日本到欧洲，一些国家纷纷制定相关战略和计划，投入巨资抢占纳米技术战略高地。

美国政府部门仅在纳米科技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就将从 1997 年的 1 亿多美元增加到 2001 年的近 5 亿美元，试图像微电子技术那样在这一领域独霸老大地位。

日本从 1992 年开始了微型机械技术计划，目标是制造出能进入血管内进行手术的微型机器人、生产微型机械部件的超小型工厂，以确立日本未来在微型机械加工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

中国也加入了这一领域的竞争，并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纳米技术还是刚刚起步，把纳米技术的前景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六节 当代天主教

基督教从 1054 年分裂为东正教与天主教，16 世纪初，又由于宗教改革从天主教里分裂出各种新教教派。从那以后，东正教的版图大体上仍限于东欧，新教主要在西欧北部传播，德国、荷兰、英国、北欧各国都是以新教为主的国家。天主教主要限于

西欧南部,如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还有比利时、爱尔兰、波兰等。

地理大发现后,新教和天主教纷纷随殖民主义者往外扩张。天主教控制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拉丁美洲、菲律宾,使大批土著居民信仰自己的宗教;而新教则随英国人传入北美(当年去北美殖民的英国人也有不少是天主教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此外,新教和天主教都大力往非洲和亚洲各国渗透,颇有成就。但二次大战以来,天主教传播的势头更猛,在北美它大有取代新教之势。欧美是现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从理论上讲,现代科学技术是与宗教不相容的,基督教是如何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情况下站稳脚跟并不断拓展新的领域的呢?下面,我们着重谈谈 20 世纪天主教的情况。

一、梵蒂冈第二届公会议与天主教的革新

近代以来,西欧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19 世纪以来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及 20 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的震撼,同时还受到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如进化论等的冲击。为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形势,天主教会曾断断续续作出过一些改革,但力度都不够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开始建立福利国家,东方国家的非殖民化运动全面展开,这时,天主教会脱离现实社会的倾向已经非常严重。比如,它仍坚持否定人生和现世的观点,这与推崇人生价值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再如,它坚持仇视基督教的其他教派和其他宗教的传统立场,不与之进行对话,成了整个宗教界的孤家寡人。此外,它也坚持敌视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成就的传统立场,为世人所不齿。天主教会内部早已出现各种各样的改革派,他们主张吸收现代自然科学成果充实教会理论,满足现代人对现世生活的需求。二战后,要求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到 20 世

纪 60 年代,天主教终于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改革。

1958 年约翰二十三世当选为教皇,两个多月后,他宣布要召开公会议进行天主教会的革新。约翰二十三世阅历丰富,眼界开阔。他青年时做过教区工作,曾两次服兵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过神学并广泛接触青年,对自己的时代十分了解。1962 年 10 月至 1965 年 12 月间,约翰二十三世与继位的保罗六世主持召开了罗马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会议),这是基督教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发表文件最多和涉及内容最广泛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许多重大变革,掀起罗马天主教在当代世界的革新运动:

1. 理论上提出“基督中心论”,肯定人的地位和人的价值。众所周知,天主教历来宣扬上帝是万物的主宰,不承认人的地位和人的价值。但梵二会议大唱关于“人”的赞歌,以便与当代重视“人”的观念接轨。但为了在肯定“人”时不否定上帝的地位,这次会议挖空心思地利用了基督具有人和神两重性的特点,把基督看成是“完人”、人的“最高榜样”“历史的日的”等等,说基督是崇拜的中心、启示的中心、教会的中心、历史的中心、人类的中心、世界的中心。这样,通过重视基督,既重视了人的价值,又保留了上帝的权威。

2. 对现实世界作出积极评价。天主教一贯以真理的惟一代表自居,贬低人生、世俗世界和其他宗教,认为现实世界只是个影子,而天国世界才是真实的,否定科学和其他种种意识形态。这次会议却明确宣布,承认人的肉体的合法需求和基本人权,承认人在世界上的努力是合法的,承认人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承认人对世界的统治、人的意志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世俗世界的自主权。梵二会议还正式与科学和解,宣布科学自由,还说科学与信仰来自同一个真理。会议甚至赞美人

类的智慧,赞美人类的科学技术发明和世界的文明进步,还表示要与其他宗教和解,认为其他宗教都反映了“真理之光”,都是“救赎之路”。它甚至提出要与马克思主义者对话。

3. 宣布天国就在这个世界上。梵二会议宣布:“按照上帝的意志,在世上已有了天国的因素,天国已在世界中显现,只是还不完美。”在犹太教和原始基督教思想中,本来就有在现世建立天国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不占正统地位。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上,占正统地位的是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要死后进天堂才能享受。这种消极等待的思想不符合现代人的观念,梵二会议大胆地采用了基督教历史上这一不受重视或甚至受批判的思想,调和了天国与尘世,亦即教会与世界的关系,为教会的“人世”提供了理论基础。

4. 扩大上帝的救赎神恩的应用范围。前面我们已经讲到,犹太教认为上帝只选中以色列人,即以以色列人是上帝选民,只有他们才能得救上天堂。基督教兴起后,经过保罗等人的改革,基督教开始不分种族接受信徒。但从那以来一直到 20 世纪中,罗马天主教都坚持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救赎工具,其他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其他教派都不行,只有加入天主教才有得救的希望。梵二会议放弃了这种已显得极不合时宜的教条,郑重宣布:上帝的计划是拯救全人类,不仅信仰基督的人要拯救,所有不信基督的人也是上帝救赎的对象,都有可能得到上帝的恩典。这就把上帝的爱扩大到了所有的人。

5. 进行组织改革,强调发扬教会民主。天主教内等级森严,其教阶制是宗教改革时受攻击的主要目标,但多年来,天主教没有作过太大的改进。这种状况与强调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的现代社会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各级神职人员间、神职人员与普通信徒间的关系很紧张。梵二会议强调发挥教会民主,

张主教与教皇共同管理教会，注意发挥一般神职人员和信徒的作用，分权给地方教会，加强教会内部的沟通与对话。

梵二会议还就天主教的礼仪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通过这些改革，天主教完成了向现代的过渡，或者说，天主教终于“现代化”了。一方面，它与现实世界达成了妥协，它赞美人和世界，赞美人和世界的自主，赞美人的智慧和世界的文明进步。另一方面，它又维持了基本的教义，因为基督是人又是神，赞美人和现实世界归根到底仍是赞美上帝和基督，因为是上帝创造了人和世界，是上帝派基督来救赎人类，人的成就和智慧都是上帝成就的体现。当然，现代社会极其复杂多变，梵二会议不能解决天主教面临的所有问题。

二、西欧天主教现状

天主教是当今世界上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之一，其信徒与人口增长同步。1994年时，共有天主教徒约9.44578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7.6%。这些教徒约一半分布在美洲，欧洲有2.85亿，其余的在非洲、亚洲和大洋洲。

西欧是天主教的大本营，尽管近年来，天主教在东欧、北美、非洲和亚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西欧仍是它最重要的根据地，通过它在西欧的进展和面临的问题，我们约略可以了解它在现代世界的地位。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欧天主教会与各国政府的关系仍然很密切，它在各个国家里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成为政府与信徒之间的纽带。西欧各国都有强大的基督教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这些党虽然都是世俗的，并不隶属于教会，但它们都受到天主教或新教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并得到教会的合作与支持。

战后，各国的天主教会多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宣扬基督教的和平主义和仁爱观。“世界和平日”就是由教皇保罗六世于

1967年提出来的,1970年经联合国决定,每年元月1日定为“世界和平日”。每年这一天,教皇都要提出一句新的有关和平运动的口号,作为天主教徒的行动指南。天主教通过和平运动使自己介入社会事务,发挥宗教的社会作用。

文化教育是天主教界的一个重要的传统领地,现在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的综合性大学在世界上有200多所,其中有许多在西欧。天主教国家一直来有教会自己的教育网,自小学、中学到大学,不仅培养神学家,也培养实业家、政治家、律师等人才,影响着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1984年1月,法国政府提出想把教会学校改为公立,引起全国各界强烈反对,6月24日巴黎发生了150万人参加的游行,迫使密特朗总统宣布取消改革法案,并导致政府辞职。

西欧的科学技术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不少科学家是天主教徒。教会密切关注当代科技的进展及各学科的发展情况。西欧各国教会资金雄厚,人才众多,在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有发言权,使教会有能力把宗教信仰与人类文化的演变结合起来。早在1936年,梵蒂冈就建立了教皇科学院,规模宏大。1994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又宣布建立教皇社会科学院。针对当今世界人口发展,许多国际组织和政府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宣传计划生育、人工避孕等情况,1994年,教皇还成立教皇生命研究院,召集科学家进行生物医学研究,协助教会答复科学新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提出教会有关人类生命的信息。

天主教会也不放松与群众联系的传统纽带,继续兴办慈善、文化、社会事业。他们兴办各种医院、老弱病残人之家、儿童服务团等,还组织人们戒毒,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既弥补了政府能力之不足,又使教会保持在群众中的良好影响。

不过,天主教会在西欧也不是一帆风顺,在科学技术如此发

达的今天，要维持教会对群众的影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要的难题有两个：

1. 教徒的宗教感情日益淡薄，享乐主义和世俗化的发展使许多教徒对上教堂和教会的说教不感兴趣。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1995年，西班牙教会公布一份材料，尽管90%的西班牙人自称是天主教徒，但生平从不或几乎不进教堂参加弥撒的人数高达45%，只有30%的人经常去教堂。

宗教感情淡薄还表现在献身于教职的人员日益减少，神职人员后继乏人。20世纪80年代初的法国有1300所教堂缺神职人员，700多所教堂没有神父举行弥撒。申请放弃教职的人也比较多。

2. 教会内的自由化倾向日益发展。不少神学家和教徒认为梵二会议的改革不彻底，认为教会内应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平等，要求铲除教会内的家长制和中央集权制。法国埃夫勒教区主教加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上半期发表了许多言论，反对强制性的神父独身制，赞成祝圣妇女担任神父或主教，支持人工流产及使用避孕套防止艾滋病的传播，要求关心穷人及被社会排斥的人等等。对这些离经叛道的言论，教廷忍无可忍，于1995年元月13日宣布把他撤职，结果在教会内外均引起强烈反响。来自各地的慰问信和支持信、电报、电传像雪片似地飞进埃夫勒主教区，堆积如山。人们还在主教座堂前的广场上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法国一些城市乃至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都有人上街示威。法国主教团一些成员感到“伤心和震惊”，德国有八位神学家要求让加约复职。

从加约事件可以看出，在教会民主化、教士结婚、重视妇女在教内的地位及在流产、堕胎等问题上进一步作出改革，仍是天主教面临的重要任务，但这些改革很难在圣经中找到根据。

第五章

美国、俄国和日本文化

美国和俄国属于基督教文化圈，日本属于中国文化或儒家文化圈，但这三个国家在当今世界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文化有独特的性质和特点，在对文化圈的一般论述中（本书未涉及中国文化圈）很难顾及这些特点，故这里设专章加以讲述。

第一节 美国文化

一、从殖民村落到资本主义世界中心

北美是印第安人的故乡，西方人到来前，这里的印第安人一直处于原始社会阶段。1607年，英国的弗吉尼亚公司在北美建立詹姆斯城，被认为是弗吉尼亚建立的开始。但最有名的移民通常指1620年驶向北美的五月花号。这条船上有102个移民。他们本来是往詹姆斯城的，但船偏离了航向，在北部后来取名为普利茅斯的地方靠了岸。

移民在路上的生活是很苦的。在船上吃的只有盐腌的牛肉

和猪肉,干巴巴的饼干以及一些从荷兰(五月花号的乘客先从英国到荷兰,再从荷兰前往美洲)带来的奶酪、豌豆和大豆。食物坏得很快,贮存水的桶很脏,许多人晕船。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走了两个多月。这些移民来到荒凉的北美,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自然环境,真是吃尽千辛万苦。他们上岸时已是12月21日,深冬时节来到这块陌生的地方,没有住所,粮食少得可怜。许多人只好在船上度过这个冬天。由于疾病,一半多移民在这个冬天里死去。

此后,北美的殖民地就一个又一个地建立起来。到1733年佐治亚州建立,北美沿大西洋岸边共有了13个殖民地。北部4个殖民地称为新英格兰,中心是麻萨诸塞的波士顿。

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中,美国发生了两件大事,即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和美国内战(1861—1865)。19世纪后期,美国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中,迅速发展成世界资本主义中心。

美国是如何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呢?有三方面的条件起了很大作用:

1. 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没有封建传统的束缚,有利于形成一套发挥个人才能的制度。它的居民开始时主要来自英国,即来自当时欧洲也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思想本来就比较开放。又由于它没有封建传统,所以它的制度比英国还要开放,不存在英国那样的贵族精英意识。在拓荒时期,即使是国王来到美国,他的地位也不会比乞丐高多少。早期移民中不少是贵族,但一来到美洲,他们马上变成了一个普通百姓。每个人的地位和财富,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他自己的奋斗,他个人的品质和魅力。一套使更多的人都能发挥创造才能的制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

2. 美国的地理位置异常优越。它远离旧大陆，被太平洋和大西洋包围和保护着，北部的加拿大和南部的墨西哥又比它弱得多，所以它花在军事上的费用少得可怜；另一方面，它地大物博，加上两面临海，哪一个国家都没有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样一种地理条件，使美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游离于世界性的冲突之外，只是在当旧世界“需要”它时，它才“不情愿”地出来捞取冲突的成果。很大程度上，美国是靠两次世界大战而建立起世界霸权的。

3. 欧洲的人才和资金。美国的发展主要还靠大力引进欧洲的人才和资金。美国在内战后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欧洲的投资。我们常说，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输出的时代，实际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输出地主要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还太落后，基础设施太差，对资本的吸引力还不大），而是各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特别是美国。

在上述条件作用下，20世纪上半叶，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跃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跃升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重要步骤。在这次大战中，美国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20世纪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外债达60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字。应该说，这个时候，美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已远远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但它还是自卑的，至多也只是一个暴发户的心态，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扭转了这种形势。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在隔岸观火，悠闲自在。总统威尔逊发表了一个中立宣言，强调美国要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我们常常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但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的美国却不愿加入战争，而是喜欢看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交战。这里的奥妙在于，美国远离欧洲

战场,战火不可能烧到它的身边来,它有充分的理由等到战争双方两败俱伤时坐收渔翁之利。

大战爆发后,美国资本家大发战争财,与协约国和同盟国同时做生意,同时借钱给双方的国家(主要用来向美国买军火)。但到后来,由于英国的海上封锁政策,美国与同盟国做的生意越来越少,而与协约国做的生意越来越多,亦即借给协约国的钱越来越多,于是,渐渐地它的命运就更多地与协约国联系在一起,最后它加入了协约国一方作战。

战争结束后,美国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欧洲国家倒欠给美国 60 亿美元。战争极大地削弱了欧洲国家,到 1929 年,美国已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 1/2。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欧仍拥有传统的优势,如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上仍处于领先地位,但二战后,这些方面的优势均转归美国。大战之初,美国持中立态度,从向战争双方出售军火发了一笔大财。珍珠港事件后它加入战争,由于战场远离美洲大陆,它成了盟国的大后方。美国曾创造过一个月生产 1 万架飞机的记录。1942—1945 年间它共生产了 28 万架飞机,比苏联、英国、日本三同时期生产飞机的总和还多 5 千架。1943—1944 年间,它每天生产一艘船舶,每 5 分钟生产 1 架飞机。战争使美国达到了充分就业,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说:开战以来,生活水平还能提高的只有美国,整个欧洲都已精疲力竭,而美国却没有。据说,1942 年 3 月间,美国有个妇女在公共汽车上大声说:“现在可好啦!我丈夫的工作从来没有那么好的,挣钱比以前多。所以我倒希望战争再打下去。”

当然,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不是否定美国人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包括对我

国的帮助，最著名的如驼峰航线及陈纳德的飞虎队等。但我们还是要看到，美国确实是通过战争而最终获得了世界发展中心的地位。

战后，欧洲百孔千疮，德国打得山穷水尽，政治上也抬不起头来；英国虽然是胜利者，但也是皮洛士式的即得不偿失的胜利，它光负债就高达 240 亿英镑，是个天文数字。西欧最强大的这两个国家已是两败俱伤。法国长期处在德国占领下，是个欧洲的二流国家。苏联也受战争重创，再加上东欧的一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它帮助。这样，在战争中唯一没有伤筋动骨的国家就是美国，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通过一系列努力，美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50 年代初，美国利用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发起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大量被淘汰的旧设备转移到了日本和与美国友好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科学技术革命中心、各种新思潮产生的中心和发起军备竞赛的中心。

这种中心的地位为美国带来了无法估算的利益。它吸收或者说掠夺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专门从事高级的服务工作，而把制鞋和制衣等劳动密集型工作交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去做，两者的报酬不可同日而语；它掠夺或无偿地占有第三世界的动植物资源，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后以高价卖给第三世界国家，这里的利润说也说不清；它滥发纸币，但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各国政府害怕美元混乱会带来自己国内经济的混乱，不得不千方百计保护美元的权威。

二、清教精神与实用主义

美国最早的移民来自英国，许多人信仰清教，清教是新教中的激进派，代表了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处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强调多赚少用，多劳动少享受，追求自

由、平等,不讲究过多的礼节,反对奢华和浮夸。他们自认为这种作风是上帝所喜欢的,所以也不怕别人讥笑。总的来说,清教徒的生活习惯是既简朴,又虔诚。

来到北美后,这些清教徒面对的主要困难是需要在那莽莽的荒原里生存,所以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探讨抽象的问题,而是养成了随时随地解决现实难题的习惯。这样,欧洲的清教精神与美洲特定环境相结合,渐渐形成了我们通常讲的美国精神。其特点是:

1. 独立、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祖先都是远离母国的移民,失去任何可以依赖的东西,一切全靠自己奋斗,形成很强的独立、自主意识。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自由是天生的。独立和自由为的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政治上、经济组织上他们都不照搬欧洲的一套,而是根据现实需要加以采用、创造。

2. 机会均等和竞争的观念。由于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谁也没有什么特权,或者说他们原有的特权谁也不去承认;要在社会中取得地位,只有靠自己的努力,看在竞争中是否能取得成功。就是皇帝来到这里,也必需从头开始,否则会没有饭吃。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里的平等不是财产平等,而是机会平等,所以他们要求社会保证人人有发展自己才能的机会,保证人人有自由生活和追求幸福的机会。在机会这个问题上,不论属于什么阶级、阶层,也不管你的身世经历如何,都应该平等。在这基础上,人是否成功,就看你自己是否抓住了机会,或有没有能力去抓住机会,这只有靠竞争才能搞清楚。所以抓住机会、积极竞争,成了美国人生活的一大特色。在许多人看来,人生就是不断地在冒险中寻找机会,是不断拼搏竞争的过程。

3. 务实、实干和效用至上的观念。成功要靠自己的奋斗和

竞争,但在美国人看来,只有竞争精神还是不够的,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必须务实,必须面向实际,不能固守抽象的原则,不能拘泥于本本,更不能把成功的希望寄托于空想。如果不面对现实,思想脱离实际,一定会失败。实干奋斗才能达到成功,所以一切都不是看最先的原则和理论,而是看最后的事实和效果。

这样的精神气质,加上 19 世纪欧洲自然科学成就的影响,到 19 世纪末美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 (Pragmatism)

实用主义是当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是一种强调实践、行动、生活的哲学,是在上述美国精神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哲学,或者说,这是美国精神升华的集中表现。

实用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讲求效用、进取的哲学,它强调的不是最先的范畴、原则,而是看最后的事实和效果。它主张以行动求生存,以效果定优劣,以进取求发展。它包含有反对僵化、反对教条主义及工作中的经验主义的合理因素。当然,它也有缺陷:通过强调相对主义而否定绝对主义,否认任何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有很大的片面性。

早期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皮尔士(19 世纪 70 年代最先提出实用主义)、詹姆士(代表作为《实用主义》)、杜威(代表作为《哲学的改造》)、米德。20 世纪中,实用主义发展成了新实用主义。

三、60 年代的民权运动

60 年代是美国的多事之秋,也是美国多种改革同时进行的年代:民权运动如火如荼,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悲壮激烈,女权运动和各式各样的新左派运动也有声有色。

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60 年代

它进入了所谓战后的黄金时代，经济极度繁荣，人民生活富足。但这时的美国仍有大量矛盾没有解决：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严重，黑人和妇女地位很低，穷人仍然很多，青年人的学习、就业等等也面临许多问题。经济越是繁荣，这些矛盾越显得突出。特别是种族歧视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1. 黑人运动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个老问题，黑人的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二战后在有利的国内外形势鼓舞下，他们掀起了新一轮的斗争高潮。斗争是从黑人要求有权在公交车上和学校里与白人同起同坐开始的。一个时时讲自由平等的国家，竟然长期在公交车和学校里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实在有悖常理，但黑人的这种看来十分简单的要求并不容易得到满足。50年代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1957年9月2日，该州州长福布斯以维持秩序为名派遣州国民警卫队包围了小石城中心小学，不准该小学接收9名黑人学生，尽管该市市长表示根本不需要州国民警卫队来维持秩序。联邦法院站在市长一边，宣布不准包围学校。但在这些黑人学生进入学校的消息传开后，白人暴徒又将学校包围起来，而且越来越多，公然向前来驱散他们的警察起哄。由于这些人实际上受到州政府的支持，是一起州府对抗联邦政府的极其罕见的行为，迫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往小石城派遣联邦军队进行干预。八架C-130和C-123运输机把101空降师327战斗大队的1千名官兵运到那里维持秩序。因种族问题竟不得不动用二战期间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可见种族问题的严重性。

1960年2月1日，4名黑人学生进入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城的沃尔夫百货商店。他们想在这里专为白人服务的便餐部就餐，但遭到白人服务员的拒绝，于是他们就坐在便餐部的

座位上以示抗议，直到这家百货店关门。这 4 个黑人学生想不到的是，他们从此拉开了黑人“静坐”的序幕，“静坐”运动迅速兴起。格林斯伯勒城的沃尔夫分店等许多商店都取消了种族隔离，连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弗吉尼亚的热餐店等都开始接纳黑人顾客。到 1961 年，已有 200 个城市实行了非隔离化。

1961 年 5 月，黑人又开始了“自由乘客运动”，反对州长途汽车上的种族隔离措施。尽管最高法院在 1946 年就已作出禁止在州长途运输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的判决，但南部各州在长途汽车及其检票口、厕所仍实行种族隔离。5 月 4 日，7 名黑人从华盛顿分乘两辆长途汽车南下，他们在车上实行黑白混座，并在沿途车站共同使用专为白人设置的候车室和厕所。途中不断有“自由乘客”加入，但他们沿途经常受到警察的逮捕和白人暴徒的袭击。这一运动同样发展迅速，1962 年 9 月，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得不发布命令，禁止这种种族隔离。

黑人也为争取同样的教育条件而斗争。1962 年，密西西比州州立大学拒绝接纳黑人退役军人詹姆斯·梅雷迪斯入学，一个联邦巡回法院于 6 月 25 日颁发迫使该校接纳他的指令，联邦最高法院于 9 月 10 日对此指令加以确认。但该州州长罗斯·巴尼特竟亲自出面干预，并动用州警拦阻梅雷迪斯入学。9 月 30 日，肯尼迪总统派遣数百名联邦执法官，护送梅雷迪斯进入该校校园。当天晚上有大群暴徒呼啸而至，把那些联邦执法官包围起来，肯尼迪派出联邦军队，并将该州国民警卫队收归联邦指挥。最后，在两人被打死，70 人被击伤后暴乱才结束。

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基础上，黑人运动渐渐发展向高潮。1963 年 8 月 28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高高的台阶上，著名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中最著名的一次演说，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

一个梦想”，后人以此作为他这篇演说的题目。他说道：

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这一庄严宣言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它之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漫长夜。

然而 100 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100 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100 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100 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众。

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

但是对于等候在正义之宫门口的心急如焚的人们，有些话我是必须说的。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敌对和仇恨之杯痛饮。我们斗争时必须永远举止得体，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我们要不断地升华到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

现在黑人社会充满着了不起的新的战斗精神，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不信任所有的白人。因为我们的许多白人兄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他们今天参加游行集会就是明证。他们的自由与我们的自由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单独行动。^①

大约有 20 万人听了这场演说。集会结束后，肯尼迪总统接见了他及其他黑人领袖，表示了友好的姿态。

马丁·路德·金(1929—1968)一生曾 30 次被捕，为黑人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心血，深受美国黑人的爱戴。

在黑人的坚决斗争下，美国政府终于开始认真对待种族歧视问题。1964 年 7 月 2 日，约翰逊总统签署了《公民权利法》，1965 年他又签署了《选举权利法》。1968 年 4 月 10 日又通过法案：伤害从事民权工作的人以反联邦罪论处；禁止在出售、出租公共和私人住房时实行种族歧视。后者是 20 世纪第一个包含黑人、白人混合居住的法案，又称开放住房法。

但一些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地方，依然我行我素，冲突因而一浪高似一浪。1965 年 8 月洛杉矶瓦茨区发生骚乱，在六天时

^①艾捷尔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第 216—217 页。

间里,连续出现暴乱、纵火、砸坏门窗、抢劫等,34人死亡,856人受伤,3,100多人被捕。当局动用了刺刀、步枪、机枪、催泪弹、瓦斯、坦克和直升飞机,并动用了1.5万国民警卫队和1千名执法人员。1966年,强调黑人武装和军事战略的黑豹党成立。

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被刺,暴力冲突进一步走向高潮。6日,华盛顿150家商店起火,军警与黑人狙击手在街头上进行枪战。当局还动用直升飞机监视和攻击黑人枪手,第83空降师也调来参加战斗,又调来13,600名正规军对黑人地区进行封锁。卷入冲突的城市达到110个。华盛顿经历了历史上最糟糕的混乱,需要派军队保护白宫。

今天,马丁·路德·金已进入美国最有名的人物之列,他的像供奉在美国国会大厦里那些先贤们的头像间,即使在白人中也有巨大的影响。从1986年开始,每年1月5日,即他的生日这一天,成为法定假日,并宣读他的《我有一个梦想》。

经过60年代的斗争,黑人的地位已大为提高,但美国的种族问题依然严峻。1992年,洛杉矶军警又同黑人发生激烈冲突。1999年2月4日,纽约布朗克斯区四个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迪亚洛。2000年纽约州高等法院宣布这四名警察无罪,成千上万的黑人和拉丁语裔人走上街头示威。这年3月2日,纽约同一个区,又发生了白人警察乱枪杀死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事件。

2. 女权运动

比黑人运动稍晚兴起的是女权运动。20世纪中,美国妇女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仍然处于低人一等的状态。直到1954年,美国国内税收法仍明文规定不给予全职工作而同时照顾孩子的母亲以减税的优点。她们无权使用信用卡、无权以自己的名字购置房产、签订合同等。到1957年她们仍无权作为陪审团成员出

席法庭的审判。到 1963 年,美国尚有 26 个州不允许妇女在州级法院中充当陪审团成员。大律师事务所大多公开拒绝雇佣女性。全美法学院的毕业生中,女性只占 3%。

女权运动的领导人贝蒂·弗里丹 1963 年出版了《女性的奥秘》一书,反映了当时美国妇女所处的矛盾:妇女们达到了物质上的目标,当起了贤妻良母,生下几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的住宅,但当实现了这种梦想后,却在心灵上感到空虚和困扰。由此她提出,妇女们除了丈夫和孩子,还有自身独特的利益,是美国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

1966 年,她创立了全国妇女组织,标志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复兴。从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妇女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争取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通过堕胎法,建立全日制幼儿园,反对雇佣中的性别歧视等。

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是要求在宪法中公开宣布男女平等,这是 20 年代由当时的全国妇女党提出来的,提出时就出现过多方争论。1973 年春天参众两院通过了该修正案,但按规定,它必须经过至少 38 个州的批准才能生效。到 70 年代末,只有 35 个州批准,所以该修正案未能生效。关于堕胎的争论也十分激烈。保守派的政治家、天主教和摩门教会都反对堕胎,该法案至今也未通过。

到 70 年代,女权运动日趋激进。1970 年黑人女律师艾林·赫尔南德兹继任全国妇女组织主席,吸引许多黑人妇女参加,把工作重心放在争取堕胎权和建立托儿所上。出现了一大批理论性的书籍,如《性政治学》、《性辩证法》、《姐妹的联合是有力的》,统称为“新女性文学”。她们主张社会不应向妇女过分灌输“淑女形象”和“母德”的重要性,应让妇女发现自身的兴趣和接受适当的职业训练。男人婚后仍可称先生,女士婚后也不一定就称

夫人、太太,空中小姐应改为“飞机乘务员”,也可招收男性,等等。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还把美国社会所有罪恶都与男性至上主义联系在一起。妇女若拥有地位后又当如何?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些主要目标都未达到,但实际上还是富有成果的,主要是妇女自身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社会上许多人改变了以前对妇女的看法。法律的改变需要通过习惯的改变才能真正得到承认,所以习惯上的变化才是关键性的。60年代以来,妇女就业、受教育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她们还闯入了许多以前由男人垄断的职业,如司机、警察、电工等。

妇女的解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社会和家庭的稳定是一方面,妇女自身认识的提高是另一方面。有人做过一次调查,把两篇质量类似、内容相同的文章分别署上男性名和女性名,让女大学生评价,结果大多女大学生都认为署男性名的文章更好。可见,妇女在潜意识上总认为自己不如男性,这才是关键性的。

四、美国人的追求

美国人好像总是生活在矛盾中。我们已经讲了他们的实用主义,外国人也总是用实用主义来看待美国人的思想。美国人处处讲究有用、实效,排斥虚无缥缈的东西。在当代,他们的实用主义其实似乎已体现为金钱至上,任何事情,只要能赚钱(*make money*),就具有压倒一切的价值。但对美国人的追求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他们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追求金钱的。

首先,美国人崇拜英雄,追求成功和未来。美利坚民族是一个极容易感情冲动的民族,如果你去参加他们的竞选大会或观看什么运动的比赛,你会难以理解他们怎么会把这些事情看得那么神圣或那么重要。会场上或运动场上,人们如痴如狂,非常热烈、激动,是广泛的感情上的共鸣。两党的候选人或比赛双方

的运动员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出现时，可以欢呼十分钟之久。竞选人的讲话不断地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两党的领导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这样的欢迎。在一种十分讲究个人主义和自由平等的文化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偶像般的崇拜？显然，他们是在赞美一种精神，一种不畏惧任何险阻而去取得成功的精神。美国人对其他成功者都是这样，带有偶像般的崇拜，特别是对歌星、影星、球星，商场、战场上的成功者及西部牛仔或“超人”、“007”等。总之，他们崇拜出名的人。

这种崇拜是一种世俗的崇拜，不是神化的崇拜。美国人只崇拜自己周边的亲身了解的东西，绝不崇拜不了解的、遥远的或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对英雄的崇拜在一定意义上与个人利益无关，但它又是与实用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把成功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美国人不仅崇拜英雄和追求成功，他们还追求未来。比如在科技领域，在基础理论、天体物理、生物科学、化学等基本领域，未来主义观念极其兴盛。人们常说，理科在美国大学中钱最多，这些钱从什么地方来的？来自学校以外的各种基金会或什么机构。这些基金会或机构所以会在这些方面投资，是因为美国人着眼于未来。在城市建设上，无论是几万人口的小城市，还是大城市，未来主义在城市建设的设计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未来几十年中这项设计将会变得怎么样，会变成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还是城市进一步发展的桥梁？在许多城市中，高速公路、地铁、楼宇、住宅的设计和建造均有着对未来世界的考虑。如在 9.11 事件中被炸毁的纽约世界贸易大厦，上面是高高屹立的雄伟建筑，下面的世界也同样惊人，有巨大的地下层，有地铁、火车等通往纽约各地及毗邻的州。设计

师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未来城市发展的需要。在不少城市里，许多住房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岁月，至今仍不显得破旧或狭小。在人才教育上，未来主义也十分突出。美国人强调教育要支撑未来的竞争，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这一点更明显。1988年总统大选，布什和对手杜卡基斯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 21 世纪的美国或美国与世界：美国能保持它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吗？而对来自日本和欧洲的挑战，及可能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将何去何从？……两党在争取选民时，无不谈到自己的政策方略将如何使 21 世纪继续成为美国的世纪。布什和克林顿都强调自己是教育总统。美国人这种对未来的强烈关注体现了他们的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一种与“实用”有关，但又不能只用“实用”来解释的东西。

其次，美国人总是在不断的流动中寻求机会。常常有人说，美国是坐在四个轮子上的民族。但在汽车发明前，美国人就已在不断迁移、不断在寻找机会了。迁徙使美国人保持极高的希望，从 16 世纪欧洲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开始，这里的居民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迁移是美国人的进取心和独立性的表现，是他们不断地追求机会的基本手段。

美国人希望靠迁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点美国人自己也早就强烈地意识到了，19 世纪的惠特曼在《大路之歌》中这样唱道：“你刚到达你要去的那座城市，还没有满足地安顿下来，你又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呼唤叫了出去。”

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 100 多年来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并非大家都能从这种迁移中得到收获，但既然这么多的美国人在迁移，总有他们的理由，有许多人确实通过迁移改善了他们的地位。

第三，成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大部分美国人都知道，成为

大富翁的机会只保留给少数人，但进入或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却是大多数人都可以或能够达到的，所以，成为中产阶级是一个十分实际的也是比较理想的目标。

什么是中产阶级？他也许是一个一般的企业主，他也可能是一个大公司的职员或部门经理或小公司的经理，反正他们包括美国人的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阶级这个词，但如果你一定要他们说自己属于什么阶级，他们总说自己是中产阶级。他们有一定的财产，有比较稳定的工作或找个比较满意的工作并不太困难，可能在郊区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或别墅、汽车、车库等等，较好的可能还有附属于房子的游泳池。这个阶级包括大多数美国人，所以这个阶级的上层和下层相差很大，但比较穷的人仍愿意认为自己是个中产阶级。美国人所说的“中”，即他们承认的中产阶级的“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等”，而是带有“中心”、大多数、主导、主流的意思，他们是美国传统、美国信仰、美国进步的继承者。

决定着美国社会走向的是中产阶级，他们是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但在媒体上出尽风头的人常常被认为不属于这个阶级，如一些反社会或反文化分子，吸毒者或黑社会人物。

还得强调一下：中产阶级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但又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在不断地流动、分化当中——这也许是美国人不愿使用阶级这个概念的原因。成为中产阶级已是现代社会的一般追求，不限于美国人，但追求的方式——不停地迁移，总是想保持自己的某种独立性和自由等，则是在美国人那里表现得最为鲜明。

五、美国文化面临的挑战

1. 多元文化主义发展的挑战。多元文化主义是 90 年代以来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新词，用来指美国种族多元结构引起的文

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即各有色人种在美国的数量越来越大,他们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影响日益扩大。1970年时,美国人口中,外国出生的人口为970万,而如今(1999或2000年)在2.63亿美国人口中这个数字已上升为2,260万。白人人口占83%,黑人占13%,其余占4%。美国全国有2,300万人口自称为拉美移民,这个数字比1980年增长了50%,这还不包括非法移民。据移民专家估计,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至少有700万人。1985—1995年外来移民的数目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十年都多。这些移民一方面接受美国的文化,但另一方面继续保持自己固有的文化,与此相适应的是他们在自己的孩子中推行双语教育。

20世纪上半叶,移民主要来自欧洲,而该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世纪末,大多数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学者认为,欧洲移民的减少会使欧洲文明在美国的影响下降,而多元文化主义最终会危及美国的共同归属感,即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念。在多元文化发达的洛杉矶,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进一步的发展就会导致“巴尔干化”,即下属的各个区自成一个文化体系,互相冲突。

关于美国是个人熔炉还是一块马赛克,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所以,乐观的看法认为,美国文化的欧洲渊源是很难否定的,在看到各种文化分歧的同时,应该看到各种文化在不断互相融合的事实。即使在洛杉矶,这种融合也在进行,在这里,拉丁裔、亚洲裔和黑人共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里,在每个社区、每家工厂都可看到这种融合。有人还说,在工厂中,可以看到天主教价值观与儒教价值观的混合。这是各种文化的融合,最终将融合进美国整体文化当中,而且这还有助于缩短美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的距离。尽管如此,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事实。

2. 电子生活(e-life)的挑战。1999年10月,美国社会哲学

家彼得·德罗克尔(Drucker)提出了信息革命的作用及后信息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信息革命的影响才刚刚露出端倪,其最有影响力的不是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本身,而是电子商务。在互联网上出现的电子商务将成为全世界主要的商品、服务、管理及专业职业的分配渠道。这将深刻地改变经济、市场和工业结构,改变产品、服务及它们的流通,改变消费者的价值和行为及劳务市场。它也将对社会和政治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改变我们对世界和白身的看法。他还认为,电子商务所起的革命性作用,犹如铁路对工业革命所起的作用一样。铁路创造了新的心理地理,人类掌握了距离,而在电子商务所创造的心理地理中,距离消失了。

确实,互联网正在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思维方式、谈话方式,甚至爱情方式:它正在影响人们对所有问题的决定,如接受教育、赚钱、求医、听广播、投资、寻求抵押贷款、了解新闻、交谈、选择政治候选人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出现了一种思潮,认为信息时代将带来社会秩序混乱。他们认为,信息社会能提供给人们最珍贵的东西:自由与平等。选择的自由已达到了爆炸性的程度,从有线电视、电子商务上的廉价购物到互联网觅友,人们无不处在自由自在的选择之中。这种种自由使人们传统的亲属、亲情关系及社会责任感都日益淡化。60年代以来,婚姻率与出生率下降,离婚率上升,1/3的儿童是非婚生;犯罪率上升,城市中心原来最富有的地区“空洞化”,成为无法居住的社区。更严重的是,人们对体制的信任感下降,即对政府和社会机构的信任度下降。

能不能改变这种现象?很困难。因为在这个信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社会里,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员必然要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必然要腐蚀传统的社会价值观。特别是他们的价值在于无限制地追求技术创新,这种无限制必

然也要影响他们其他行为的无限制,犯罪率上升,家庭破碎,邻居互不关心,公民越来越不参与公共生活,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等等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反映。

3. 家庭模式问题上的冲突。这里涉及的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他们各自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孩子的教育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扩大就成了社会或政治问题。

工业化破坏了家庭的凝聚力,大有割断家庭与亲属、社区及教会的关系之势,城市化使年轻人的道德沦丧,那么,工业社会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家庭呢?这一直是美国争论不休的问题。持正统观点的人认为,19世纪的中产阶级家庭是理想的家庭,这种家庭是符合自然的,是上帝所要求的,而且这种家庭模式有助于社会和谐。反对派(“进步主义者”)则认为这种传统的家庭是建立在夫妇不平等的基础上的,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他们要求夫妇平等地分担家庭和养育的责任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负担。更有甚者认为,对妇女的压迫来源于妇女的生育功能,他们主张妇女有决定是否生育的权利。他们不是从夫妇的生理关系来规范家庭,而更多的是把家庭看成一种伴侣关系,主张不同的家庭模式,即单亲家庭、同居、同性恋。由此产生了两个重要问题:

一个是同性恋问题。“进步主义者”认为,反对同性恋就是反对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社会原则,对同性恋的恐惧反映了保守派人士竭力捍卫传统的家长式家庭的努力。主张同性恋的人还认为同性恋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反抗,是一种社会改革的努力。

另一个是堕胎问题。关于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不是杀人的问题,在恩格斯的时代就已在讨论。圣经认为,上帝的生命的礼物在怀孕时就存在了,现代科学也证明,胎儿的心脏在第24天

就开始跳动,第 43 天便可记录到脑电波,第 6 周便有完整的骨骼和反射作用。传统主义者认为,堕胎就是扼杀生命,也就是反对耶稣。赞成堕胎的人则认为,潜在的生命与实际的生命有明显的区别,堕胎是一个宗教上的解释问题,不同的宗教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反对堕胎也就是破坏一部分人的宗教自由,而宗教自由正是一个社会民主程度的试金石。当前的美国,妇女能否堕胎,是一个争论相当激烈的问题,立法尚未对此作出裁决。堕胎在中国是一个毫无疑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不加抑制的人口增长会对社会和资源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但西方不存在人口过多的问题,另外西方文化长期来热衷于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他们往往把我们认为纯属生活的问题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在美国,处理这个问题并非轻而易举。

第二节 俄国文化

俄罗斯是个两极化异常鲜明的民族,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一些极其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民族性格中这些矛盾的特征和俄罗斯的地理位置是密切相关的,19世纪时,马克思就称俄国为“半亚细亚”的国家,即俄国的特征半是亚洲、半是欧洲。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也指出:“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① 记住这一特点是理解俄国文化的关键。

^①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 1995年,第2页。

一、东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俄罗斯

作为东斯拉夫人的一支，俄罗斯民族的祖先生活在西起德涅斯特河、东到第聂伯河、以及黑海北岸广袤的东欧平原上。俄罗斯人首先是东欧人，俄罗斯国家是欧洲国家。但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后，开始有意识地向东部，即向亚洲开拓、移民、扩张。其结果是俄国越来越远离欧洲，俄罗斯人越来越深入到亚洲腹地。因此，俄罗斯人经常自问，自己是深入亚洲的欧洲人，还是居住在欧洲的亚洲人？

公元 988 年，俄国的前身古代罗斯国家受礼入教，加入拜占庭的教会，即后来的东正教。据说当时罗斯的大公有多种选择，比如选择罗马教会或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但当时罗马教会和犹太教会都很弱，伊斯兰教虽然很强大，但他无法接受该教戒肉禁酒的规定，认为“喝酒是俄罗斯人的乐趣。没有这种乐趣，我们就无法生存”。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首都之一，给罗斯的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他不知道是在天空还是在人间，因为人间没有如此壮观、如此美丽的景象。

罗斯选择了君士坦丁堡的宗教，也就是接受了拜占庭的文化，10-12 世纪的俄罗斯是在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下度过的。在此后几百年的发展中，有两件大事深深影响了俄国。一件是 1237 年蒙古军队侵入俄罗斯，并在此后几百年间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由此切断了俄罗斯与欧洲文化的联系，给俄国人留下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国家范式。第二件是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占领，俄罗斯成为东正教的唯一堡垒。这使俄罗斯人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他们认为意大利的罗马已因被异端控制而垮掉，不值一提，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也被伊斯兰教的战斧劈开，已经灭亡，留下来的只有第三罗马即俄罗斯仍然屹立着

1480年，俄罗斯摆脱了鞑靼蒙古的统治，这时的俄国文明已完全不同于西欧的文明。到17世纪，俄国在政治上是沙皇专制制度，在经济上是封建农奴制，国家的面貌总的来讲是野蛮落后。与西方相比，俄国的物质贫乏、生活简陋，人们穿长袖衣服、留大胡子、住小木屋，贵族缺乏知识、盲目自大，整个社会没有朝气。这时，西方的工场手工业已经很有起色，那些较有远见的俄国人开始看出他们的经济和技术落后是对自己的国家安全的威胁，感到必须与西方进行接触。这样，俄国人开始了持续几百年的关于俄国走什么道路的探索。

二、向西方学习

17世纪初，俄国首先采用西方的军队制度训练俄国军队，然后就是购买外国的机器、聘请他们的技师、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最后是学习西方的整个工业技术和工场制度。1639年沙皇给莱比锡大学的学者奥列阿利写邀请信说：“朕，伟大的君主，知道发生的事情。你对星相术、地理学、天体运行和土地测量以及其他许多有用的工艺和复杂的东西都学得很好，很有经验，而朕就需要这样的人才。”^①

一些外国人开始来到俄罗斯，有手工业技术人员、军官、商人、医生、矿业工程师等，并渐渐在离莫斯科不远的雅乌扎河畔形成一个欧洲人的居留地，称“德国村”。“德国村”是西方文化进入俄国的一个小小的根据地，是俄罗斯西化最早的基地。它为俄罗斯展示了欧洲生活方式、先进的西方文明的样板。

面对干净整齐的道路、漂亮而设施完备的房屋、华贵的德意志轿式马车、音乐和舞会，俄国贵族对舒适优雅的外国侨民生活充满新奇和羡慕，在宫廷和社会上层形成了一个热衷于欧洲生

^①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3—264页。

活方式的圈子。

开始只是为西方的好东西所迷惑，渐渐地，不仅限于渴求西欧的美好事物，在俄国人心中，产生了要学习这些美好事物背后所依赖的西方文化的愿望。18世纪初，彼得大帝(1682—1725)以铁腕手段把俄罗斯推向西方。

彼得大帝创立了俄国第一支海军，开设了航海学校，建立了正规陆军部队，俄国的科学院和第一份报纸都是在彼得时期开始的。他引入各种类型的专家，派出一群群年轻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1697年，他派使团出使西欧，自己装扮成随员随团出访，在荷兰的造船厂挥斧当学徒，亲自参加船只建造。在他的倡导下，贵族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开始穿戴西方的衣帽，模仿西方时尚，有的贵族舍不得俄罗斯传统的大胡子，彼得亲自当众将其剪掉。在波罗的海沿海，他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新俄罗斯的象征。敢于把首都建在西部边界，就意味着一定要向西推进。

彼得于1725年去世，但整个18世纪都是俄国向西方学习的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看到落后的祖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以极大的热情吸吮着欧洲文化之浆，普希金称18世纪为“俄罗斯启蒙的真正春天”是有道理的。1755年，莫斯科大学建立。杰出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1711—1765)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了。大批德国的、法国的学者来到俄国科学院从事研究。国民教育出现繁荣景象，建立了许多新的学校。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时期俄国的杂志出版特别活跃，她也是法国启蒙哲学的爱好者，与伏尔泰通信，极力赞美对方，盛情邀请狄德罗来俄国。

三、十二月党人起义

但彼得大帝的铁腕及其以后的学习西方的浪潮未能真正使

俄罗斯西方化,俄国上层社会表面上欧化了,但整个社会没有根本改变,彼得时期的工场手工业是建立在农奴制的基础上的,这与西方的工场手工业建立在自由雇佣的基础上完全不一样。19世纪初,参加反对拿破仑战争的俄军将士到了巴黎,年轻的贵族军官强烈地受到了西方正在发生的工业文明的震撼,觉得农奴制的俄国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向西方学习的要求再度激烈起来。

这些在巴黎驻过一段时间的青年军官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是一种历史趋势,俄国必须进行农奴制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秘密建立了组织,并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1825年12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死去,这给了激进派一个机会。事情的起因是,亚历山大一世无子,皇位应归其弟弟康斯坦丁继承,但康斯坦丁早已声明放弃皇位,并指定弟弟尼古拉为继承人。但这一安排并未宣布过,彼得堡军民已按照传统习惯向康斯坦丁作过宣誓,现在宫廷又宣布尼古拉为新沙皇,要求人们重新宣誓,这使国内人心惶惶,军队内不满情绪迅速增长。革命组织北方协会决定利用这种混乱举行起义,即在宣誓那天,把倾向革命的军队集中到参议院广场,通过拒绝向尼古拉宣誓来迫使参议院实行改革。

1825年12月16日举行再宣誓时,3000多士兵集中在参议院广场,处死了前来劝说他们不要起义的彼得堡总督米格拉多维奇。但起义总指挥特鲁别茨科依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使起义失去指挥,而新沙皇尼古拉一世马上调来四倍于起义者的军队,镇压了起义,起义者死伤数百人。

起义失败后,沙皇把起义的组织者彼斯特尔、雷列耶夫等5人处死,120人被剥夺贵族称号,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些人被称

为十二月党人,他们是贵族革命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他们是俄国资产阶级第一批革命家,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对这次起义充满同情,在送给流放者的诗篇中,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诗句。

四、西方派和斯拉夫派

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俄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沙皇恢复了反动统治,而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在开始悄悄发展。面对这样的事实,俄国思想界进一步展开了俄国道路的探索,并在探索中分裂成两大派:西方派和斯拉夫派。

1829年,俄国哲学家恰达耶夫(1794-1856)发表了他的《哲学通信》。在这些著名的书简中,恰达耶夫以悲观主义的情绪来看待俄国,不仅批判俄国的现实,而且彻底否定俄国国家的历史道路,甚至否定俄罗斯民族本身:“我们不属于人类大家庭中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既不属西方,也不属东方,我们没有任何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任何东方的传统。我们站在时代之外。”他还说:“我们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我们没有给世界任何东西,也没有教会世界任何东西;在人类的思想总体中我们没有贡献任何一个思想,我们没有拿出一样东西去促进人类理智的进步。”为此他提出,为了融入“世界潮流”,俄国应该转向新的道路,转向欧洲。^①

恰达耶夫的这些信震动了整个俄罗斯,使俄国思想界就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进行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争论。双方争论的要点是:西欧具有人类最进步的工业文明,它的道路是否也是俄罗斯的历史道路;抑或俄罗斯文明属于另一种类型,有其特殊的道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就是在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中形

^①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34—35页。

成的。

斯拉夫派肯定俄国历史的独特性，认为俄国的村社和东正教是俄国优于西方的特殊因素，主张俄国走自己独特的、固有的彼得以前的发展道路；而西方派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坚信俄国与欧洲历史进程的共同性，认为俄国的未来必将毫不例外地沿着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

斯拉夫派否定西欧派关于人类文明统一性的看法，认为每个国家都有特殊的民族精神，如果试图使一个国家模仿另一个国家，结果肯定是矛盾和混乱。他们把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历史理想化，把彼得大帝看作是俄罗斯文明和民族团结的主要敌人。他们还完全否定西方，认为它是一个被唯物主义、无信仰、冲突和革命撕裂得支离破碎的社会。

西方派则指出：西欧的文明全是劳动的成果，科学和技术已花费了那么多代人的努力，这些成果已是人类的财富，只要俄国人丢掉迷信，抛弃偏见，那么俄国人也会拥有这些人类的财富。

必须指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是出于爱国才介入这场争论的，他们都希望俄罗斯迅速繁荣，这是一场关于俄罗斯走什么道路才能富强的争论，异常激烈，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解决问题的不是文字之争，而是不可抗拒的外来的压力：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英法钢铁制造的军舰和现代化的枪炮打败了俄国木头制造的军舰和旧式的枪炮。一句话，资本主义战胜了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迫使俄罗斯再一次全面向西方学习。1861年，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

不过，俄国的道路之争并没有真正解决。

五、民粹主义

就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激烈争论的 19 世纪中，一种思潮又

悄悄发展起来，即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似乎与斯拉夫派有更多的联系，但不是这样。它是在俄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深切地理解了西方文明的弊病后产生的，其基本观点是俄国应该跨过资本主义阶段，通过俄国农村的固有组织形式村社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思潮开始时的代表人物是赫尔岑。

赫尔岑(1812—1870)出身于贵族，与沙皇有亲戚关系。他曾深受十二月党人的影响，当沙皇当局绞死十二月党人五个领袖时，赫尔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可他像当时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感到了最深切的耻辱、仇恨和痛苦。执行死刑后，当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祈祷仪式，以示庆祝。30年后，赫尔岑写道：“我参加了祷告式，我当时只有14岁，隐没在人丛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圣坛前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到底。”

赫尔岑开始时是个激进的西方派，是西方派的主将，认为俄国应该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1847年他被莫斯科大学开除后来到了西欧，次年亲眼看到了欧洲各国爆发的革命，即1848年革命，资本主义的弊病在这场革命中暴露得一览无遗，使他深感失望。对欧洲资产阶级的希望破灭后，他把眼光投向俄国的农村，认为在那里可以找到拯救俄国的希望。

当时俄国农村的什么东西引起了赫尔岑的注意？这就是古老的农村公社或村社制度。俄国的村社或农村公社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一直存在，上千年来俄国的农村未曾发展起土地私有制，农民一直共同使用土地。当然，土地是贵族的，农民要向贵族交纳各种捐税；但从农民方面来看，土地是共同使用的，为防止较强的农民蚕蚀较弱的农民的利益，村社还保持每隔一段时间重新分配一次耕地（叫份地）的习惯，非耕地是共同使用的。

每个村社里,农民还有自治式的组织,自己管理自己。赫尔岑与他的追随者认为这些农民仍保持着原始社会以来的公有制传统,通过这种传统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需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也就是说,赫尔岑把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同俄国的农村村社结合起来,希望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利用村社直接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

19世纪60—70年代,民粹派发展很快,他们捍卫农民的利益,认为俄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强调村社和劳动组合的独特性,把村社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他们还突出知识分子的作用,宣传个人恐怖活动。这些民粹主义者或民粹派观点上有分歧,分成多个派别,但都主张通过村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要通过村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必须发动农民,向农民讲解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理,于是民粹派兴起了“到民间去”的运动。从1873年冬起,民粹派青年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城市纷纷走向农村。1874年夏,到民间去的运动达到高潮。据克鲁泡特金的估计,有二三千男女青年到了伏尔加河中下游各省农村。他们脱下学生服,穿上农民装,以教师、医生、护士、文书的身份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号召农民起来推翻沙皇政府。但是,由于农民相信“好沙皇”,不相信他们的宣传,不相信这些从城市来的穿着农民服装的陌生人,甚至向警察告密。1874年底,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捕。“到民间去”运动以失败告终。

此后,民粹派发生分裂,其中的民意党渐渐走上恐怖活动的道路。民意党人专门从事个人恐怖活动,谋杀了多名政府高级官员。1881年3月,民意党人在彼得堡大街用一枚炸弹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有五名民意党人被处死,大批革命者被逮捕。民粹派运动转入低潮。后来列宁的哥哥也是因参与暗杀沙

皇未遂而被捕并遭处决的。

19世纪末，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民粹派不愿看到这一事实，仍坚持俄国不需走资本主义的主张，激烈反对新生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主张。20世纪初，民粹派仍没有改变旧的立场，毫无希望地同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作斗争，因而被称为自由民粹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对俄国意味着衰退，它将使俄国崩溃，所以应当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

十月革命似乎表明民粹派的失败，但有意思的是，民粹派所向往的农村村社，在十月革命后，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复活，而且发展到空前的程度，甚至在以前没有村社的地方也建立了新式的村社，集体农庄遍及全苏联。苏联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实践恰恰符合民粹派的想法：从村社到社会主义。1990年，苏联解体后，俄国农村才全面开始了土地私有化的过程。

在18至19世纪里，俄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就是围绕着道路之争而进行的。俄国作为跨越东西欧大陆，兼有独特的东西方文化特征的国家，在探索走向现代的道路上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极其惊人。可以说，今天的俄国人仍在继续探索着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三节 日本文化

和其他文化相比，日本文化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它的混杂性。可以标示其混杂性的最好例证，莫过于日语。在今日的日语中，除汉语外，包含着大量外来语，多达数十种。在信仰上，日本人既敬日本的神，又敬中国的、印度的和其他地方的神。在节日上，日本既过日本的节，又过中国的、西方的节。日本文化的这一特征与它善于学习外来文化有关。二是对传统的保守

性。虽说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海绵样的吸收能力，但对于自己的传统却同时具有保而守之的特性。这一特性使日本保留着像俳句、茶道、花道等传统文化因素，但同时也保留了与文明社会完全不相容的东西如武士道。

一、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是日本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日本对外来文化从来就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外来文化的价值往往在于它的实用性，而不在于它的原则性。文化自身的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可以被利用。因此在日本历史上，外来文化曾多次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在文明初露曦光的时候，日本就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形成文明，文明是从中国引进的，从石器时代一步进入铁器时代，农耕文化也因此取代渔猎文化。这大概是在中国秦汉之际。此后日本受中国文化的不断影响，文明进步速度很快，佛教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中国的文字、医药、服装、生活方式等等无一不成为日本文化吸收的对象。日本把中国看作完美的典范，定期向中国派遣使者，并且派大量留学生留学中国。6—9世纪，日本社会再度出现一次飞跃，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及科学、技术、器物甚至文章诗歌等都大量传入日本，不仅使日本社会变成一个摹拟的中国社会，而且建成以皇权为中心的大一统国家，从当时来说在各方面都赶上了最发达的东亚文明。

日本的主流文化都是从外国传入的，比如说儒学、佛学，以及后来的程朱理学、阳明学等等。一位日本学者把日本文化比喻成“软体动物”，“经常变化形体，没有一个固定的形状”，不像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看起来像是“哺乳类动物，和马、狮子很相像，有骨骼而且很清楚”。他还说正因为日本文化具有这种无固定形态的特点，所以它“不是依照原则来行动”，而是视具体需要

而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一点也不拘泥于习惯与传统的权威。^①

17世纪上半叶，由于大批日本人信仰天主教，幕府感到这对自己的权威构成威胁，遂采取锁国政策。但锁国不符合日本的文化传统，也未能阻挡住西方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于是又给锁国留下一道豁口，即允许中国与荷兰商船在长崎进行贸易。长崎成了西方科学文化甚至其思想意识形态的入口，日本很快出现一批“兰学”学者，他们以学习和传播荷兰人的即西方的学问为己任，因此在西学大举入侵日本前，日本已经对西方的科学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

兰学的传播使日本人认识到近代西方有很大建树，在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上超过了东方。早在1755年，日本学者杉田玄白(1733—1817)就根据西方的科学知识指出：“地者为一大球，万国分布于上。”这是对中国的“华夷”宇宙观的彻底否定。1787年，另一位学者林子平(1738—1793)在《海国兵谈》中指出西方各国的船只“牢固而巨大，如非优势之大炮，则难以挫败之”。他把正在崛起的俄国视为日本的榜样，因为俄国通过学习西方，已经从后进国变成了先进国。

随着西方列强压力增加，西方舰队日益逼近，连奉行锁国政策的幕府也开始认真研究对策。为此，老中松平定信于1792年开始收集“红毛之书”(荷兰书籍)，以便在必要时借用西方之“理”以对抗西方。差不多同时，幕府开始组织人员学习英语、俄语，编纂字典并翻译有关两国的书籍，这为不久后扩展到全面了解西方打下了基础。中英鸦片战争后，幕府更命人操练西方炮术，购置西方武器。各藩大名走得更远，比如西南各藩，不仅铸

^①中根干枝《国际社会中的日本文化》，载井上靖《日本人与日本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80—82页。

造西式枪炮,还引进西方的纺织技术,开采矿山,举办实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日本向西方学习的决心更坚定。1862年,幕府向欧洲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同时还派出第一个遣欧使团。各藩武士开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以致多次发生偷渡出国到西方去留学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吉田松阴(1830—1860)两次偷渡未能成功,结果受幕府惩罚,在国内引起巨大震动。

日本统治者与中国统治者在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上有明显不同。1793年,英国政府派往清朝的使节马嘎尔尼来到北京,随身带来了许多工业革命的产物,包括望远镜、化学器械、电机产品等等。但这些表达西方最新科技成果的器具并没有引起清朝官员的注意,它们只被当作几千年来一如既往的“番邦”朝贡品登记在册了事。而几乎就在同时,甚至还比这略早一点,杉田玄白却记载说,对于荷兰船只“舶来之一切珍品,不论多少,闻稍有好事者无不爱收集之”,比如“气候测验器(晴雨表)”“暗室摄影镜(暗箱摄影机)”“现妖镜(幻灯机)”“呼远筒(扩音器)”等等,都会引起日本朝野的广泛兴趣,“赞叹其穷理之微妙”。正是这样一种愿意接受新知识的开放心态,帮助日本人在面对西方挑战时首先看清西方在物质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巨大优势,从而感到要战胜西方,就应该首先使自己强大,而要使自己强大,就要向西方学习。这就是“富国强兵”的由来。

从日本学者会泽正志斋(1782—1863)提出“富国强兵”以来,日本统治层对于如何学习西方又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富国强兵”论希望向西方学习“大炮巨舰”,这是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前的初期阶段。鸦片战争发生后,佐久间象山(1811—1864)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技术)术”,类似于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被美国逼迫开国以后,横井小南(1809—1869)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对国富民强的重要性,因此主张学习西方的

政治制度。到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1835—1901)集数十年向西方学习思想之大成，以“文明开化”的口号为新生的日本指出了方向，开始了向西方全面学习的新阶段。因此，在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思想界就从有选择地学习西方的器物发展到全面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和政治法律制度，这是思想的大飞跃。

日本文化传统中的拿来主义帮助日本在面对西方的严峻挑战时迅速改变自己，利用西方文化追赶西方，从而在“四海大抵为洋人领地”的险恶环境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避免了被西方列强征服的命运。

二、武士道

如果说“拿来主义”说明了日本文化的灵活性，那么武士道则说明了日本人对传统的执著，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是封建社会里武士的道德规范，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日本武士道导源于神道教、佛教、儒学及神权迷信，是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江户幕府(1603—1868)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但那时的武士道只强调对上级领主的服从，与天皇没有多大关系。

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不复存在，但是，武士道并未随武士阶层的消亡而消亡，而是发生了重要变化，成为日本近代军人的精神支柱。这种变化表现在：

1. 其适应对象不再是武士，而是全体日本国民。
2. 以前的武士道只强调效忠于各自的领主或藩主(大名)，现在转为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个人。明治时代的武士道

以“忠君爱国”为核心,军人自列入军籍之初,就宣誓“拥戴皇上,忠于朝廷”,天皇被视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天皇与国家不分,报效国家就是报效天皇,效忠天皇也是由报效国家来体现。

3. 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商才”即经商之才。封建的道德就这样变成了资本主义的道德。

4. 将江户时代一些封建文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发展到极端,崇尚残忍,歌颂“玉碎”。

武士道的最大特点首先在于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武士道所以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锐利武器,其根源就在于它是武士(军人)及全体日本国民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其次,武士道的核心是无条件效忠君主,对君主忠诚的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

用武士道武装起来的日军可以说是近代最反动、愚蠢和残暴的军队。它勇猛顽强、战斗力极强,随时准备为天皇献出生命,但同时又是最残暴、野蛮,毫无人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即使被团团包围在孤岛,也无人言降。每次对日作战,要俘虏一名日军极难。二战后期的“神风特攻队”以及“举国玉碎”的想法更是把武士道推向极端。而同时,日军在二战中的暴行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著名学者万峰教授曾说过,一想起武士道便反感、便作呕、深感憎恶,便想起太阳旗加军刀,想起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这是中国人直到现在都还有的普遍感觉。

武士道还影响战后日本对其战争罪行的认识。二次大战后,德意志民族成熟了许多。她勇敢地面对过去的罪行,彻底地

清算过去,赢得了受害各国的真正谅解、信任、合作和友谊。相反,日本对自己的战争罪行却是另一种态度。政府态度暧昧,从田中角荣到今天的小泉纯一郎,首相换了 17 位,只有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承认过“侵略”或“侵略行为”。且这种态度只代表个人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总体意志。学术界美化战争,认为日本人是为亚洲而战争,不是为侵略而战。右翼势力强,如 1995 年右翼势力搞的反对“不战协议”^① 签名运动,签名者达 456 万人之众。日本不肯认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武士道痼疾所致。具体表现在:

第一,武士道意识不允许对天皇“不恭”。天皇是战争的第一罪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裕仁天皇从 1945 年的“御音广播”开始,至死始终没有承认“侵略”,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有罪。这种现实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一是既然战争的最高领袖未受战争惩罚,国民还有什么必要自觉清算战争罪行!武士道对天皇的愚忠意识,决定了国民不允许对天皇有“不恭”的言行,天皇自己不认罪,没有人敢指责天皇。直到今天在战争问题上,每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对那场战争表示歉意,但最终却没有哪一个人承担责任,更没有哪一个肯服罪,形成一种无责任体系。又由于在武士道中名誉高于生命,高于一切,为了荣誉,不管对错是非、流血犯罪,可以豁出生命,可以掉脑袋,不能丢面子。在这种荣誉观支配下,如果承认侵略战争,岂不等于说活着的天皇是侵略者、死去的亡者是侵略者,仅为此也不能承认是侵略战争。

第二,靖国神社是武士的“光荣归宿”。武士道的生死观中,

① 1995 年,在二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日本国会通过了《不战协议》,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日本对其给周边国家带来的伤害进行反省;二、悼念所有战争中的阵亡者和死难者。对这样一个暧昧的决议,日本右翼仍持反对态度。

死也有光彩体面，“死得其所”，即使生前罪恶多端，死后也会成佛，均可以供奉起来供人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这样的机构。1996年，桥本龙太郎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时说道：“50多年前我在孩提时代时，站在欢送出征人士的队伍里，当初，人们高呼‘光荣回到靖国神社’的口号，把他们送到战场。今天我的参拜，仅仅是来兑现孩提时代那些英灵的承诺。”靖国神社是祭祀近代以来历次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军人，约 250 万人，是公认的“对天皇忠诚的典范”或“为国捐躯的英雄”，每年春秋两季神社都要举行“大祭”悼念。届时政府的达官显贵都要进行参拜，有时甚至天皇还要亲自祭拜，一些旧军人还要身着“皇军装”，奏着旧军歌，回忆往昔的荣耀。这种“沐浴皇恩”的待遇对于死者的亲属来说，简直是光宗耀祖的殊荣，武士道死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无限的升华。

第三，武士道穷兵黩武的意识没有熄灭。战后民主改革只是清除了武士道转变为军国主义的条件，但武士道崇尚武力、穷兵黩武的意识并没有很好地得到清除，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彻底去掉。因此，崇尚强者、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价值取向没有变。这种价值取向往往容易走向极端，不服输不认错，只信服强者，对强者恭顺、学习，对弱者凶残、野蛮，一旦强大便以怨报德，反口不仁。

第六章

东方国家现代文化的产生

这里的东方国家主要指亚非拉国家^①，这些国家的历史差异非常大，比如在西方国家入侵前，美洲和南部非洲大都处于原始社会的不同阶段，有的地区即使进入了文明社会，也是属于国家发展的早期。而在亚洲和北非的一些地区，却早已拥有辉煌的古代文化，像埃及、印度、中国这些国家，其农业文明发达的程度曾远远高于西欧国家。

不过，尽管这些国家的历史差异很大，它们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在现代文化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都是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产生的。这种碰撞和相互影响是一种长期的、极其痛苦的经历，正是在这种种痛苦的折磨和刺激下，东方国家的人民慢慢产生了学习西方、达到民族自强的

^① “东方国家”是与“西方国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包括亚非拉和东欧，不过本章着重讨论的是前者。

追求。

第一节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从 15 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到现在的五百多年间，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一、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第一阶段

15 至 18 世纪中、后期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第一阶段。这种碰撞是由西方人的侵略引起的。这时期，早期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西方殖民主义者掀起地理大发现的热潮，到亚非拉的许多地方进行殖民活动。在文明程度发展比较低的美洲和南部非洲，西方殖民主义者到处杀人放火，抢劫掠夺，为了发财无所不为。但在中国、印度等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由于西方人在物质生产和武器制造方面尚未取得绝对优势，所以在这儿百年中，双方的大部分交往还是在平等或比较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的。通过这种交往，西方人得到了并学会了许多东西，可以说，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西方文化也慢慢向东方文化渗透，但可悲的是，东方人夜郎自大，对自己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缺乏一种批判的眼光，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根本未想到要从西方人那里学点什么。这样，在这大约 300 年的时间里，西方各国相对说来发展很快，而东方各国则相对停滞不前，或虽有发展变化，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变化十分有限。

东西方文化碰撞是从 15 世纪后期开始的，这时西方人开始大力探索到亚洲的海路，希望从海路直接到达中国和印度。他们想到东方来，并不是因为东方人好欺侮，而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东方是一个金银财宝取之不尽的地方，东方还有西方人梦寐以求的香料、丝绸和瓷器，是一个文明程度远远高于他们自己

国家的地方。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中国简直比天堂还要美好。在现存哥伦布的遗物中，还有一封当时佛罗伦萨人托斯卡内利写给他的信，信中赞美杭州的富丽堂皇，并说日本庙宇和皇宫都铺着金板。

1492 年秋，哥伦布来到美洲，登上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岛屿，这时这些岛屿上的土人还未进入文明社会，身上的饰物中只有极少量的黄金，殖民主义者感到十分失望，也使支持他们航行的西班牙君主十分失望。此后，哥伦布又多次进入美洲，但仍没有发现太多的黄金。不过直到 1506 年死去，他都坚信他已经到达了亚洲，只要继续寻找下去，就能找到马可波罗书中所描写的那些富丽堂皇的城市。

1497 年，达·伽马来到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卡特，当时这里是阿拉伯商人的天下。葡萄牙人要想在这里立足，就必须搞好与这里的土王（地方统治者，这时印度处于分裂状态）的关系，但他们拿不出什么礼品——他们的国王未能给他们准备下一份稍微像样一点的礼品，所能拿出来送人的只是羊毛织品、帽子、成串的珊瑚珠、脸盆及罐装的油和蜂蜜。土王对这些礼品不屑一顾，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当时的东方物产丰富，价格低廉。葡萄牙人带到卡里卡特来卖的衬衫，只能以相当于葡萄牙国内价格的 1/10 出售。土王在给达·伽马带回给葡萄牙国王的短信中这样写道：“我国盛产肉桂、丁香、生姜、胡椒和宝石。我请求您用来交换这些东西的是黄金、白银、珊瑚和鲜红的布。”^①但当时的葡萄牙人还拿不出这些东西。

此后几百年间，西方人与美洲、非洲及亚洲发展起广泛的贸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第 134 页。

易联系,从事各种形式的殖民活动,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东方对西方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许多事实可说明这一点。直到 17 世纪末,东方的棉织品充斥着英国的市场,连王后本人也喜欢穿着中国丝绸和日本花布出来见客。显贵们的家里、书斋里、卧室里都充满了这些织物:窗帘、垫子、椅子、乃至卧铺本身都是白布和印花布。18 世纪里,欧洲有一些地方在仿制或假冒中国的瓷器等手工艺品。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还把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看成是井井有序的、符合理性的制度,希望他们的国家好好学习。

同时,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精华也在向东方渗透,如时钟、西洋历法、西洋绘画等,还有西式建筑,特别是教堂。但对这种渗透,东方的统治者没有思想准备,也从未仔细思考向西方文明可以学点什么的的问题。除了像徐光启这样少数有识之士,中国人很少有人看到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这样,在西方日新月异变化的同时,东方各文明古国的变化却不明显。由此,一些西方人开始得出东方停滞不前的结论。像伏尔泰这样对中国十分友好的学者也指出:“在科学上中国人还处在我们二百年前的阶段”。^①

在该阶段末,西方人中开始产生东方(这里主要指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落后,西方先进的观念,但东方人却不知道,也未想到要考虑这类问题。

二、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第二阶段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东方开始普遍出现学习西方,达到自强的追求。

18 世纪后期,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西方国家对东方的全

^①伏尔泰《哲学辞典》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第 330 页。

面征服、奴役也由此开始。1757 年英国占领了孟加拉，此后的九十多年间，征服了整个印度。19 世纪中，列强开始征服或企图征服中国及日本、阿富汗等许多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19 世纪末，它们更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东方各国纷纷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西方的意识形态同时向世界各地全面扩张。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东方国家先后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最初形式，是一些原先的王公或旧式农民领导的反侵略斗争。1825—1830 年印度尼西亚的蒂博尼哥罗王子领导的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大起义、1857—1859 年印度的反英民族大起义、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9 世纪末苏丹的马赫迪起义都属这种性质。这些斗争虽然都是正义的，但基本上属于用封建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所以都先后失败了。

东方国家反侵略斗争的下一步是资产阶级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这时，东方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现代科学知识已经在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传播，一些有远见的人士开始思索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人一般都受过西方的教育或西方思想的影响，毫无例外都提出了学习西方，实现民族自强的主张。中国的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印度由于受英国侵略较早，其民族资产阶级发生得也较早，在 19 世纪末就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关于印度为什么贫穷，及印度如何实现新的复兴等问题。他们主张扶持民族工业、进行社会改革、普及欧洲式的教育。这里的“新”指的是把民族复兴建立在现代工业生产力的基础之上，而不再是恢复以往的农业社会。

在这种种努力中，只有日本人通过改革而实现了自强，大多数东方国家都未能像日本那样摆脱受奴役的地位。但对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变化迅速、争论激烈、战乱或动荡频仍的时代。中国从康梁主张维新、孙中山倡导资产阶级革命

到马克思主义传入和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系列急剧的变化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具体变化过程因各国的内外环境不同而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都出现了领导救亡图存的现代政党，并先后取得了民族的独立，然后把实现民族的现代化或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总之，在这一阶段里，必须学习西方慢慢地成了共识，这一共识是东方国家建立现代文化的基本前提之一。但许多国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或受列强的欺压，学西方怎么学，学什么的问题一般尚未解决或甚至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三、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第三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而来的非殖民化过程，使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都获得了独立，并确立了自己的发展目标。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与前两阶段相比，这一阶段东方国家的内外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内部看，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各国政府都转向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工作，这是一个性质上与领导独立斗争完全不同的任务，可以说是一个艰巨得多的任务；从外部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进一步采用非暴力手段来影响东方国家的发展，这些非暴力的手段对东方国家的经济文化渗透比暴力征服时还要厉害。

这时期，东方国家面临着一系列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于：(1)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狭义上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建设问题，如果不把社会和文化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也无从谈起。(2)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大规模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各种文化产品，东方国家存在丧失民族文化传统的危险。(3)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成就是与西方的人文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很难分开；而对东方各国来说，如果

不加区别地或过多过滥地输入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文化传统和人们的价值观都会出现断裂,社会会因之陷入混乱。这些问题表明,学习西方需要解决现代文化的建设问题。

其实,在第二个阶段这些问题就已出现,但那时还不是很严重,在学者中虽然争论得很激烈,但人们的注意力主要还是在国家独立的问题上。只是在国家获得独立,全体人民投身于经济建设大潮,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非暴力的扩张手段时,它们才成为非常迫切的普遍性的问题。

总的说来,在这一阶段里,学习西方怎么学、学什么的问题变得非常尖锐复杂。但正是这种尖锐性和复杂性,使东方人民增长了见识,经过众多的教训和考验,从中摸索出了一些建立现代文化的经验。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东方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如何逐步使自己的文化走向现代化。

第二节 东方国家建设现代文化的斗争和经验

东方国家的现代文化是在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斗争或争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在探索学习西方时如何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要不要学习西方?

东方现代文化产生之初就充满着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学习西方。19世纪中,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尽管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还是相当狭窄的,只主张学习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只限于学习西方人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

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即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去 30 多年后,中国要不要修建铁路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1876 年修成的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在运行几星期后就被拆毁,是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这条铁路在修建时,沿线居民就极力阻拦,拔掉施工的木桩,拒绝迁移。铁路修通后火车轧死了一个人,地方官员竟提出要火车司机“以命抵命”。由于这个要求被拒绝,这些官员就煽动农民拆毁铁轨。这样,火车只运行六个星期后就停开了,接着两江总督沈葆楨下令把它拆除。

这种情况不光中国有,其他国家也一样。1718—1830 年间,土耳其历史上进行了学习西方的第一次改革(土耳其的改革出现得这么早,是因为它是与西欧国家最为接近的亚洲国家,它的部分领土在欧洲,所以它是最早受到西方影响的亚洲国家),改革中有一条措施是建立印刷所。但由于 1730 年土耳其对外战争失败,首都掀起暴乱,主持改革的大维齐(宰相)被杀,苏丹(皇帝)被迫退位。印刷所也被关闭,理由是用机器来印刷真主的话是亵渎神灵的。

无论是中国还是亚非其他国家,提倡采用西方技术在开始时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行为,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守旧派的反对非常厉害。守旧派所以拼命反对采用西方人的科学技术成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西方人的发展水平,夜郎自大,总觉得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看到西方文化有摧毁本民族传统的危险。当然,由于民族危机的出现,放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会渐渐增多。这些人尽管仍然是旧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所能作出的改革也还十分有限,如我国的洋务运动,但他们毕竟具有危机意识,懂得光靠祖宗的遗产不行,必须向人家学习,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越

来越坚定。19 世纪上土耳其有一个海军上将的一段话很有名，常被引用：“在我访问俄国归来的时刻，我比任何时候都确信，如果我们继续延误仿效欧洲，我们除了乖乖回到亚洲，别无出路。”^①

二、向西方学什么，怎么学？

必须向西方学习的认识慢慢为许多人所接受了，新的问题马上就尖锐起来，迫切需要人们加以解决。

一个问题是：人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发现，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与西方人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紧密联系着的，如果只学习他们的科技成果，那可能很难真正学会或使用他们的科技成果。比如，中国的洋务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破产了，当时许多人都看得很清楚，中国的失败不是由于船不坚炮不利，而是由于制度的落后、腐朽。必须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教育百姓，必须开民智，使国人具有现代公民的意识，只有具有现代意识并在现代制度下工作的官员才能领导一个使用现代技术的国家，也只有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才能使用现代的武器来保卫自己的祖国。祖国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这就提出了改革旧制度的问题，而旧制度又是与旧的所有制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改革绝非易事，而是牵一发而动全局。这种改革无异于一场革命，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阶层，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如果统治阶级中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改革的绝对必要性，就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坚强的领导阶层。

另一个问题是：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也随同在社会上传播，造成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混乱。当然，如果人们是比较理智地接受这一切，所造成的混乱不会太大，可怕的是国门打开后马上汹涌而来的是盲目崇外的浪

^①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343 页。

潮。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提倡文明开化，结果崇洋思想迅速泛滥，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一味歌颂、向往西洋事物，鄙视民族传统，传统文化如歌舞伎、茶道、花道、佛教等一度普遍受到破坏，一些年轻人甚至认为自己的民族没有历史。盲目崇外也表现在接受外国的东西时囫圇吞枣、生搬硬套，造成巨大损失。如脱离基本国情，不顾国力引进欧美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致使生产不配套，无法进行生产或无法充分发挥设备的生产能力；或者是引进过多、过快，政府财政出现巨大亏空，造成通货膨胀，人民怨声载道。

以上问题，归纳起来是一个学西方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意见，这些意见都与一定的阶级立场或与一定的利益关系有关。因为向西方学习意味着发展和改革，而改革牵涉到利益的再分配。一般说来普遍出现过三种意见。

一种是激进的或左派的意见，强调推翻旧制度，否定一切与旧制度相联系的旧道德、旧习惯、旧文化等。这一派中有的主张全盘西化的，有的则主张革命或用暴力推动改革。

一种是右派的意见，这一派美化民族传统，强调用国粹抵制西方的事物。这些人中的一些人甚至连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反对，因为他们看到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与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紧密连系在一起的。他们反对工业化，主张以农为本，建立以农民为核心的社会。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中国有章士钊、梁漱溟，印度有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甘地。这些人与普通的守旧派不一样。普通的守旧派是出于对西方一无所知、夜郎自大而守旧；这些人则往往对西方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像甘地曾接受西方的良好教育，他们之所以守旧，是因为看到了西方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尖锐冲突，同时也看到了西方文明或工业文明内部的深刻矛盾。

第三种是调和派,调和派的主张也差别很大,最典型的是中国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科学技术是西方的,而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的。日本人也曾在明治维新前后提出过一个与中国人类似的口号“和魂洋才”,即灵魂是日本人的(日本人称自己为大和民族),而才能是西洋人的。

这三种意见,主要见之于知识分子的争论或政府文献、报纸杂志中,至于普通老百姓,则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处理办法。一般说来,普通百姓的处理方法有两点:一是看外来的东西与自己的传统习惯差别大不大,二是看外国的东西是否使生活或劳动更方便、更实用。凡是更方便、更实用的东西,即使与传统习惯差别很大,经过一段时间后也会慢慢为公众所接受。比如,像火车这样的交通工具,尽管在开始时在中国曾受到普遍反对,但不久后它就被人们所接受了(1887年,清政府批准海军衙门在天津等地试办铁路)。当然,器物类的东西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像个性、婚姻自主这类与价值观密切相关的东西传播开来则要难得多。

普通百姓对外来事物有自己的一套处理办法,但这不是说知识分子的争论或政府的管理是多余的。老百姓能接受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而他们不能接受的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的。像出国热,政府若不加以控制,许多人盲目跑到外国去,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损害一个国家的形象。再如像黄色画报、书刊,在西方社会已成为习惯,而在东方国家往往缺乏这方面的接受能力,如不加阻止或限制,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动荡。这些都需要政府加强管理。

但政府的管理绝非易事。不光是我们的国家在这方面感到困难,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是这样,甚至发达国家也有这类问题。鉴于美国好莱坞影片的扩张性,法国等都采取了抵制措施。

西欧各发达国家也不是无限制地引入美国式文化，他们的有识之士也在大力呼吁要发扬民族传统文化。

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来说，这方面的管理工作极其复杂。一方面他们国家的文化本来就与西方文化格格不入，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要把西方文化的某些部分引进来，与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比如，要把婚姻自主引入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牺牲，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繁重任务，但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十分困难，从而使人们对西方文化一概持排斥态度。这些国家的许多人对西方文化本来就怀有一种抵触情绪，他们在一定程度内所以能容忍西方文化的渗透，主要是因为这是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是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成果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些西方的机器设备是与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分不开的。但如果引入这些设备并不能给这些国家带来真正的发展，不能给人民带来太多的幸福或生活的改善，那么他们怎么可能继续容忍西方文化的“入侵”，呢！

三、向西方学习的两点基本方法

经过长时期的摸索和教训，东方国家在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慢慢都有了一套虽非十全十美，但也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些方法视各国的具体国情而各各有别，但有两点大体上是相同的：

1. 以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为转移。凡是有利于本国的现代化的，就学习采用，凡不利于自己国家现代化的，就抵制排斥。

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这里的有利于和不利于也不是很容易判断清楚的，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必须做到两点：

一种是,从历史上看,许多“有利于”现代化的事情,都是后来的判断,而在推行的时候,只有少数人看得清,大多数人是反对的。比如婚姻自主,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但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中国,说它好的人肯定非常少。所以这里的难点是,“有利于”和“不利于”,究竟由谁来判断?理论上,我们可以说最终的评判者是人民,但由于现代化的复杂性,人民有时对新事物的性质并不总是很清楚。再以婚姻自主为例:让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中国人来投票,恐怕大部分人都会反对。当然,从现实的历史过程看,人民这时往往没有权,他们最多只有在报刊上发表一点意见的权利。第三世界国家在搞现代化时民主生活都还不够发展,真正有权加以推行或阻止某项政策的只能是掌权的人,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家领导人首先必须有现代化的头脑,否则他可能是瞎指挥。

另一种情况是,有些看起来好的东西,实行起来还有个时间问题。换言之,有的东西总的来说是好的,但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就急着实行,可能会把好事办坏,不如不办。比如人权问题,西方人老是拿着人权的大棒整人,其实东方国家的领导人一般也都知道人权问题很重要。但问题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是 20 世纪中建立福利国家后的产物,也即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人都享有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时的产物,东方国家大部分都还比较穷,还不具备实行福利国家的能力,所以讲人权时还只能讲基本人权,即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只有当我们的物质生产进一步发展时,我们才可能讲高层次的人权。所以,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明确自己处于什么历史发展阶段,明确自己该先学习什么,后学习什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现代化才会比较顺利地进行。

2. 区分西方文化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这里的意思是,西

方现代文化是一种现代文化，但不是说所有的现代文化都要像它一样，它只是现代文化的一种形式。现代文化的本质是现代性，一种文化只要体现出现代性，就可说这种文化已经现代化了。所以，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并不是说西方的什么东西都值得学，而是学那些最能体现现代性的东西，也就是西方文化中的精华。

现代性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大体说来它指现代文化所固有的那些特性，比如祖国、公民、个性、民主、自由等都是现代文化固有的属性。这些属性可以用西方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可以不用或不完全用西方的方式来表达。比如，在封建社会里，国家是皇帝或国王的国家，忠君与爱国不分，但在现代，祖国是个抽象的概念，国家的领导者不可以把自己与国家等同起来。现在，每个民族都有表达热爱祖国的一些特有的方式，但祖国作为一种抽象的崇拜物，它不是与某一个具体的领导人相联系，而是与大地、母亲等形象相联系，这在每个国家里都是一样的。这里，爱国是一种现代性的行为，但表达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完全不必照搬西方的爱国方式。再如，民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采用了议会的形式，这是不是现代民主的惟一形式呢？我们采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式，我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发扬民主，也能达到现代民主制度的目的。

把西方文化与现代性进行区分，肯定西方文化只是现代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现代文化还可以有其他的表现形式，这是在建设本民族的现代文化中第三世界国家达到的非常重要的认识。

四、把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结合起来

东方国家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还都遵循一条基本的

原则：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或西方文化的精华相结合，建立本民族的现代文化。这也是东方国家经历了痛苦的教训后得出的一条结论：不强调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一个民族就会像无根的大树那样无所依傍，失去精神和方向，不仅现代化搞不起来，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难以维持。

东亚是二战以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经济上的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在文化建设上由于比较注意这种结合，使传统文化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 古代儒家的“行仁政”思想转化为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东亚大体上指日本、朝鲜，中国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及东盟各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基本上是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影响所及地区。古代儒学的政治理想是“行仁政”，强调政府对百姓要“爱民如子”，要做到国泰民安，万方同乐，让百姓过好日子。这样一种思想在当代东亚各国都演变成了发展主义，即各级官员都把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考虑的地位，领导全国人民全力以赴搞现代化，把这看成是“行仁政”的具体表现。

2. 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和家族伦理秩序为家族企业的建立提供了现成的组织体系。西方人强调个人主义，在其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家族企业很少见。而东亚各国和各个地区在现代经济起飞时，家族是基本的生产单位，成批的中小企业都是以家族为核心组织起来的，说明东亚的家族组织形式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儒家的学说中，“家”和“国”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把一家治好等于为治国作出贡献，即“齐家治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这两个概念同样紧密地连系在一起，爱家常与爱国相结合，即“发家富国”。致富，既是爱家的表现，又是爱国的表现。或者

说,致富的行为既为家人所赞扬,又为政府所鼓励。可见,儒家关于“家”与“国”的关系的思想同样也是有利于经济起飞的。

当然,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家族企业是有缺陷的,但在经济起飞初期,它却是东亚地区非常重要的生产组织方式,起过不可取代的作用。

3. 儒家重视教育与教育机会均等的思想,在现代化过程中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甚至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都不太重视教育,而在东亚,在现代化启动之初,上上下下都十分重视教育,教育超前发展。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异常重视教育,提出了“文明开化”的口号(这是明治维新三大国策之一,其余两条是“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明治政府确定的教育方针,是要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强调“文明之为文明者,实有赖于一般人民之文明”。改革时期,虽然政府经费十分紧张,但还是不惜把最多的资金放在学校建设上,主管教育的文部省的经费是政府各部门中最多的。到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先后实行了三、四、六年义务教育制,到该世纪末,99%以上的适龄儿童接受了初等教育。二战后,韩国及我国的台湾地区也是这样。到1984年,韩国的教育经费已占GNP的13.3%,远远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

东亚各民族重视教育与文化传统中重视子嗣的香火传承、望子成龙分不开。东亚地区的父母往往亲自督促孩子学习,日本的妇女甚至在生了孩子后就放弃工作专门负责孩子的教育培养,这在其他文化的社会里是很少见的。

东亚地区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当然不限于以上三方面,比如儒家伦理中敬老爱幼的传统等都有助于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稳定。

在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使这种传

统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之一，是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第三节 西方科学思想与东方 现代文化的建设

科学思想是东方国家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根本上改造东方传统文化使之向现代文化发展的有力武器。

西方科学观念中对东方国家现代文化的建设发生重大及持久影响的主要有两点：进步的思想或进化论；务实或通过实验来证实理论的精神。

一、进化论或进步的思想对东方文化的影响

达尔文在 1859 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用大量材料系统地论证了进化论，强调当今世界上的所有物种都是经过长期进化而来的产物。我们常常用一句很通俗但并不怎么科学的话来说明他的理论：人是由猴子变来的。这本书出版后在东方和西方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似乎不下于法国大革命。

进化论是关于自然界各种生物起源的学说，但我们在赞叹达尔文的伟大学说时也要看到，这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产物。换言之，没有西方的文化传统，就不可能出现进化论。因为进化论的思想基础是关于“进步”的思想。“进步”是西方人从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观念，相信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现在比过去好，将来比现在好。它总是使人们的眼光往前看，是一种愈往前愈好的观念；不相信今不如昔，而是坚信过去不如今天、今天不如将来。

19 世纪末，进步或进化的思想传入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改造这些国家文化传统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是因为除西方

外,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文化都不存在进步或进化的思想,而是历史循环论的思想。西方传来的进步或进化的观念打破了历史循环论,使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什么是历史循环论?这就是《三国演义》开头讲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一个朝代兴盛起来,不久后又衰落下去,接着又一个新的朝代兴盛起来,如此改朝换代,循环反复不已,朝代与朝代之间没有质的变化,有的只是盛衰的重复交替。这种历史观把人们的眼光引向过去,把过去的盛世作为自己努力的榜样,如我国古代人谈起太平盛世,总是讲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还有什么康乾盛世。形象一点说,进步的观念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一条直线,一直往前发展;而历史循环论则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一个圆圈,古代、现在和将来的人只是在这个圆圈里打转,分别经历盛世和乱世,经常回到出发点,然后重新经历盛衰的过程。

18 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面临深深的危机,但大部分在位者仍抱着旧有的历史循环论的老观念,他们称之为公平循环。有人这样说到这时许多土耳其人的心态:“大家都向后看,把自己的行为同伟大的苏莱曼统治时期(1520—1566 在位,是该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皇帝)帝国明显处于登峰造极时的理想状态来比较。他们只想发现过去做了些什么,然后把它作为榜样,而没有革新的思想,不愿实验新制度。”这些守旧的上耳其人憎恶革新,认为最坏的事就是新奇的东西;“他们相信,一旦道德在社会中重振,强硬的大臣们对犯罪者实施严厉的惩罚,那么正义就会占优势,帝国就会重新获得伟大的胜利”。^①

^①伊兹科维兹《帝国的剖析——奥托曼的制度与精神》,学林出版社 1996 年
第 98 页

可见,不打破这种历史循环论,人们就不会产生向前看的观念,国家就无法进步。只有国民都懂得了向前看,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才会产生新的追求。这就需要引入进步观念或进化论,这也就是进化论在传入非西方国家的初期发生过巨大影响的原因,它成为这些国家新观念的产生和现代科学思想发展的基础。

1872年我国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出版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书中讲的关于地层、生物进化的材料成为戊戌思想家的重要思想武器。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译的《天演论》轰动中国,以至梁启超评论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① 1839年,奥斯曼帝国在被自己的属地埃及打败后,痛下决心进行改革(此前,埃及在穆罕默德·阿里的领导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时异常强大)。这时,这个国家对西欢情况比较了解的知识分子,都“强调科学对于创造繁荣的重要性”。萨杜拉帕夏(1838—1891)在一首诗中还写道:“时代是进步的时代,世界是科学的世界,社会的生存又岂能和无知相容”。^② 要改革,要革命,就必须用进步或进化的思想来批判、否定旧观念和旧传统,这是东方国家的文化走向现代的必经之路。

进步观念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在于它有难以辩驳的说服力,因为西方国家的强大与自己国家的弱小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进化论使东方各国人民从“法古人”(以古人为榜样)转变到“法洋人”(以西方人为榜样)。前者的视野掩盖了自己的落后性,而后者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只有进步观或进化论才能说明,西方人所以强大是因为西方先进,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军事和科学远远跑在我们前头,要使自己强大起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9页。

^②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务馆1982年,第141、142页。

来,就必须放弃传统的方法而学习他们的先进方法,否则将永远处于劣势。这样,人们终于从“法古人”的历史循环论的怪圈中走出来,追求富国强兵。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还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所以在当时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前者着重从进化论的角度讲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在古老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走向崩溃时,它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二、科学实验和务实精神对东方文化的影响

打破空谈道德的风尚,转向实践和实验,这是西方传给东方国家的另一种长期来一直发挥着革命作用的精神。前工业社会或农业社会都有很多道德上的条条框框,特别是儒家的道德说教非常之多,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其义利观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实业活动和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妨碍着市场经济的孕育。

从科学史来看,近代科学的产生标志是科学实验精神的增长。一些西方人认为,近代科学革命的发起人不是哥白尼,而是伽利略,原因就在于从伽利略开始,科学发展才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科学实验是科学发展的基本手段,没有科学实验就没有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成就。

科学实验是极其精细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来不得一点点马虎和做假,不允许任何的道德空谈。这种精神体现在其他工作中,就是务实。

尊重科学实验的结果,事事讲求务实,这种精神要求我们时时以科学实验、科学观察、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而得出结论。这就是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是 15、16 世纪以来在西方慢慢发展起来的,而在东方国家则普遍缺乏,真理往往由“长官”或宗教权威

来决定。

科学实验和务实精神的传播促进了东方国家科学精神的产生和发展，其对现代东方文化产生的影响同样是异常巨大的，而且更为持久、深远。

三、妨碍科学精神在东方传播的因素

这里所以要专门讨论一下妨碍科学精神在东方传播的原因，是因为东方国家科学精神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可以说是相当曲折艰难。西方传入的各种科学观念，虽然相当大地改变了东方人的世界观，但实际结果总是差强人意。比如务实精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直到现在，要一丝不苟地贯彻这种精神常常会碰到一些想象不到的障碍（如统计数字常会失真等等）。理论上很透彻的认识不一定意味着实践上也能做到，而需要反复强调。下面我们以我国在这方面的一些事实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我国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喊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呼声，但争取民主和科学的斗争是一项十分长期的工作。1941 年，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实事求是”的号召：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且科学的结论。

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①

这段话充满了务实和科学精神，用明白浅显的语言把复杂的道理说得清清楚楚。但 37 年后，即 1978 年，我国又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类似的例子还有：70 年代末，邓小平引用马克思的一系列论述，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舆论上的反响非常强烈；但 90 年代初，我们却又一次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关于第一生产力的讨论和宣传。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三个代表”的思想，其中一项又是强调生产力的革命性作用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道理看起来很简单，并不难理解，为什么真正贯彻起来这么不容易？至少有三个原因：

1. 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存在许多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崇尚道德空谈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空谈误国”的旧传统在我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反复出现呢？这是因为在全面的工业化真正改变全体人民的生活以前，科学思想只是在少数或部分居民中间传播。或者说，科学思想的真正普及要依赖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当然，一定的教育超前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全民族科学精神的普及需要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2. 科学思想在传播时，一定会在潜移默化中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有助于本土人民的接受，但会使其失去精确性，即使科学思想“失真”。这种“失真”是有意无意间完成的。所谓有意，指的是用本国古代的一些看起来有点类似的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801 页。

法,说明西方人的东西我们自古就有,使人们不去深究西方科学思想的精深之处。19世纪后期和本世纪初,我国学术界热闹一时的“西学中源”说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有时,这类说法完全是牵强附会。比如谭嗣同就从我国古代典籍中找出多种“证据”,说明我国古代早已提出“地圆”及地球为行星的理论。他说道:“《列子》又曰:‘夫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是明知地为行星之一矣。至其为地圆地动之说,则亦确有明徵。《大戴礼》曾子曰:‘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此地圆之铁案也。且《周髀算经》亦曰:‘地如覆盘。’盖仅举东半球言之。若合之西半球,则为圆形无疑。”^①所谓无意,指的是我们在理解西方的一些概念时,往往会不自觉地用自己所熟悉的本土类似概念去理解,使本来是精确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不清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农业社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的概念总是比较模糊的,另一个是文化本身的性质使然。中国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形而上学本来就不发达,“天”“道”之类的概念包容广泛,很少有人会花精力加以详细界定。这种特点在21世纪的世界文化建设中,也许如一些人所说的会发生重要作用,但在近现代科学思想的传播中却是一个障碍。

3. 刚刚从农业社会出来的人不太适应于飞速发展的世界形势,思维一旦达到一个高度就会出现某种停滞不前的趋势。1842年魏源的《海国图志》便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②但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们对外国到底知道多少!1949年建国时,我们自以为已知道得很多,但世界变得很快,近30年过去

^①谭嗣同《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下册,第400页。这里无意就“西学中源”说进行评价,只不过是指出这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些精确概念的“失真”。

^②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

后搞改革开放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对外部世界其实并不怎么了解。

第四节 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全球化是今天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但我们在讲全球化时，往往更多地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实际上它也包含着文化上的很深刻的含义，这就是正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一、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

帝国主义就是扩张，近代以来只有西方人有力量从事扩张，所以所谓文化帝国主义指的就是西方文化的扩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我们过去在批判帝国主义时，着重批判的是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扩张。有时也涉及其文化上的侵略行为，但强调的是—些表面看得到的东西，如帝国主义国家随意在殖民地国家建教堂、办学校等。二战后，由于非殖民化的结果，东方各国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所以通常认为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政策已很难奏效了。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忽视了：东方国家获得独立后，殖民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审美观点、生活追求目标在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中继续发生作用，而且随经济全球化的进行和西方文化产品的大量涌入，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是最近十多年来人们重新关注西方文化扩张问题的原因。有些人称这种扩张为“文化帝国主义”，也有的人称之为“后殖民主义文化”，这两个称呼指的基本上是同一种现象。

二、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处在西方文化意识的包

固中。比如审美观,从舞蹈、艺术体操到时装及女人的三围、曲线等,美与不美几乎都是西方人的标准。当然,旗袍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但可能正是因为西方人说好看,不少中国妇女才会常在一些重大场合穿上它。设想如果西方人说它不好看的话,很难想象是否会这样,至少,为了让西方人说好,不会经常出现在各种国际性的活动场合。西方人极为欣赏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些比较野蛮、愚昧、落后、贫穷的一面,一些中国人为迎合这种“爱好”,就炮制了相关的东西供他们欣赏,以取得好评。

英国有一个新闻记者兼自由作家的人,叫哈里森。他出于职业的需要曾走访过亚非拉三大洲的 23 个发展中国家,1979 年出版了《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其中有一章专门探讨“整个世界的西方化”问题。哈里森指出:“伴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唯命是从的帮凶。”^①他详细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扩张的几种途径:

1. 在殖民地人民中培养起一个忠于宗主国的阶层。西方人在占领一个地区并把它变成殖民地后,就在当地办教堂、学校,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教徒、官员和办事人员,他们是一些完全西方化的人物,只不过肤色不同而已。

2. 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为上层社会的行为准则,成为令人羡慕的追求目标。那些接受了西方式教育训练的人,那些热衷于往上爬的人,纷纷效仿征服者,即使普通劳动人民,也会把这

^① 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第 36 页。

作为是否高贵的标准,并刻意进行模仿。

3. 东方人曾受尽西方人的欺侮和凌辱,一旦自己掌权或拥有了某种条件,就致力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并不比西方人低,钱不比西方人少,所拿得出的证据当然是必须得到西方人认可的,否则没有意义。第三世界国家一些不切实际的大型建筑就是这种文化心理支配下的产物。

哈里森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这种种现象。从北美回到西非的黑人是西非西方化浪潮的重要推动者,他们在酷热的旱季仍穿着黑色的毛料西服,戴上挺刮的硬领。印度新组建的军官团成员服装与打马球的英国中尉一模一样,也在胡子上涂上蜡,戴个孔雀尾巴似的胸巾。由于印度存在等级制度,他们的上层为了表现自己的高等种姓,时刻要在外表上体现自己的高贵,所以显得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象牙海岸总统乌弗埃·博瓦尼的家乡是一个小村子,这里却修建了两头望不见边的四车道的公路、高级的五星饭店和现代化的会议中心。20世纪初领导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基马尔,年轻时曾在欧洲旅行,看到过西方人对土耳其的圆顶毡帽百般奚落,十分伤心。掌权后,在一次宣布新政策的讲话中,他说道:“土耳其共和国的人民在外表上也必须表现出文明、进步。文明的国际性服装与我们民族是相称而又适宜的,我们将穿这种服装。脚上穿靴子或者皮鞋,腿上穿裤子,身上穿衬衫,系领带,外面套西服,要有西服背心。当然罗,为了使这一切完美无缺,头上要戴一顶有边的帽子。我要把这一点讲清楚,头上戴的这东西叫礼帽。”^①

哈里森讲的这些现象大部分都还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养成的。实际上,在20世纪中期的非殖民化浪潮后,即在东

^① 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第40-41页。

方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后,这方面的发展不是有所抑制,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西方国家虽然退出了以前的殖民地,但他们进行文化渗透的手段却更多、更高明了。有两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

1. 通过大规模的经济活动输入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二战后各新独立的国家都把经济建设摆到首位,西方的技术、设备、人员大规模进入第三世界国家,他们带来的生活方式、经营理念吸引着这些国家的年轻人,人们趋之若鹜地接受了他们带来的东西。外资企业工作人员成为高收入的阶层,他们向其他居民展示了西方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令人羡慕的追求目标。

2. 直接大量输入西方文化产品。这大半是由经济活动所激发出来的“西方热”造成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使得人们希望更多地了解西方,并以使用西方人的用品和享受西方的文化产品为荣。这样,西方人虽名义上退出了殖民地国家,但他们的文化渗透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着,他们的电影、电视、文学作品和学术书籍像洪水一样涌进第三世界国家,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灌输给这些国家的人民。

广告是非常重要的—种文化产品。西方广告对东方人民的心理影响难以估量。哈里森讲到,他曾收集到一张伊朗计划生育的宣传画。画上是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家庭:一个是多子女的,有一大群又哭又闹的孩子,都穿着传统的服装,住在东倒西歪的土房子里,里面一贫如洗;另一个家庭只有两个孩子,漂亮的花园洋房里摆着收音机、电视机,丈夫穿着笔挺的西装,系着领带,妻子穿着裙子、罩衫,系着围裙。这两种家庭确实是当时穷人与富人的区别,但同时反映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

文化帝国主义的控制甚至达到了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的地

步。比如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日常聊天还是学术活动,我们都是 在一些西方人设定的“话语结构”或“语境”中进行的。比如谈到酒,就会想到 XO;讲到衣服,就会想到巴黎、纽约的时装展;讲到轿车,是宝马、奔驰等;还有各种诺贝尔奖。这些都是最高标准,因为首先是西方人认为这是他们的最高标准,然后我们也认为这是最高标准。其实这些最高标准中,有些当然是名符其实的,但有些并非如此,特别是文化产品。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几乎都不懂汉语,他们怎么有能力来评价汉语文学作品或汉语作家的优劣,他们怎么知道汉语作家不如西方作家?

学术上的问题更多,因为今天我们所用的大多数学术术语几乎都来自西方,这些术语有许多是西方人在概括他们的历史文化的特点时提出来的,但现在世界各国都在使用。比如,我们的历史书中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些概念都来自西方,我们引入这些概念后虽也解决了许多历史上的问题,但同时产生了不少新问题。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就是一个至今尚在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很不一样。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流派的概念也都来自西方,当我们用这些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并不总是很恰当。

文化帝国主义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今天已经发展到连一些西方国家也变得“深受其害”了。美国凭借其在多媒体、互联网、卫星电视等方面的优势,在贸易自由化的口号下打入他国文化市场,它的近邻加拿大就苦不堪言。加拿大 95% 的电影、93% 的电视剧、75% 的英语电视节目和 80% 的书刊市场主要为美国文化产品所控制。20 世纪末,加拿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本国文化。法国电影界的人士也曾大声呼吁政府保护本国的电影事业,阻止好莱坞的大肆入侵。

文化帝国主义是我们改革开放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现象，其中一些东西并不能说都是坏的——如果都是坏的，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推崇和追求它们了。但肯定有的东西是坏的，有的是不适合在东方推广的。有的不好的东西一看就知道，如大肆渲染暴力和黄色的文化产品、嬉皮士(hippie)的生活方式。但有的东西是否好坏开始时并不清楚，如足球流氓、宗教般狂热的追星族，只有当他们形成气候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时才能看清其内在的荒唐之处。也有人认为这些不是西方文化的弊病，而是现代文化的弊病，这样讲也许有道理。东方国家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困难就是要学会辨别外来的东西，通过辨别加以吸收，通过把它们与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相结合，使自己的文化重新灿烂辉煌。

第七章

二战后几种重要的 文化发展趋势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行,20 世纪的思潮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纷繁复杂,传播极其广泛,而且各种思潮互相交错、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里我们仅介绍二战后几种重要的文化发展趋势。

第一节 人权理论与人权斗争的国际化

人权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是随资本主义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很长时间里主要在西方国家传播,是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也曾被工人阶级用来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发展成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和实践。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得到了所有政府的批准,今天,世界上 170 个国家都承认它的重要性,都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宪法。与此同时,关于人权问题的斗争

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人权在全世界传播的同时,关于人权的斗争也国际化,其重要原因是人权在成为世界公认准则的过程中,其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与西方人长期信奉的理论有了一定的区别,因为一种思想的传播总要与所传播地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现在的人权概念包括“消极人权”与“积极人权”两种,前者指人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后者指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西方的人权理论长期来只强调前者,后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张,在制订《世界人权宣言》时,主要是由于前苏联的坚持,才在宣言中写进了关于“积极人权”的条款。

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首先是基本的温饱问题,所以在它们取得独立后,又根据自己的国情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权”的概念,即把发展权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大部分不发达国家”都强调“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权利”,“发展权”在国际人权公约中取得了重要位置。1986年,联合国颁布《发展权利宣言》,最终将发展权作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①“积极人权”和“发展权”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人权的内涵。9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人权问题的讨论和对话,强调“生存权”和“基本人权”。

但所有这些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价值观发生了冲突,人权遂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基本问题。

1977年卡特上台后,把追求“人权”的理想主义外交推向高峰。美国国会在这—时期通过了不少法案,用人权标准来制约美国的外交。到克林顿政府时,美国的人权外交已有机地融进

^① L·亨金《权利的朝代》,知识出版社 1997年,第 256页。

整个外交政策中。克林顿政府有所谓的三大外交政策目标：经济、安全、民主。前两者体现了国家利益，后者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即要在全世界推广美国式民主，推广西方的“消极人权”理论。现在美国每年都要发表关于世界上人权问题的白皮书，把这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

20世纪末，一种更危险的倾向发展起来，西方人权论者和政治家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自16世纪以来被西方学者视为神圣的国家主权正面临严峻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这作为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依据，科索沃事件是该理论的典型表现。

必须承认，西方国家指责东方国家的各种人权问题有许多是存在的，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也不是不知道。但问题在于：(1)就东方国家来说，他们是先解决吃饭问题重要呢还是先解决西方国家所说的那些“人权”问题更重要？(2)就西方国家来说，他们是本着善意的、帮助式的、解决问题的态度，还是把这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干涉别国内政或甚至颠覆别国政府的工具？

众所周知，自由和民主既与一定的文化传统有关，又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水平有关。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进入福利国家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当高，东方国家人民的年收入只有他们的十分之一或甚至百分之几，不少公民还是文盲，但他们却用自己已达到的“自由”标准来批评东方国家的“不自由”。目前，东方国家最紧迫的任务是发展，是现代化，没有发展，没有全面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人权。

人权与文化传统有关，也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不同的人权表现形态，对我们或对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生存权、发展权，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更高层次的人权，而且这种更高层次的人权也不会

与西方的完全一样，因为现代性总是要与民族传统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强调“发展权”和“生存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地位，不仅因为它符合东方国家的现实状况，而且还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抗议。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以其有利的地位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后者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发展过程异常艰辛、曲折，难以得到真正的发展。

关于人权问题，必须坚持三点：(1)认真对待人权问题，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基本目标，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断使各方面的生活民主化。(2)发展权是一种基本人权，第三世界国家必须用发展权来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3)要注意西方一些政客别有用心地利用人权问题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美国国内本身就存在种种人权问题，特别是歧视黑人的问题仍很严重。而且，美国在把人权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时常常采用双重标准：对“听话”的国家“原谅”其人权问题，少提或避而不提，对不“听话”的国家则对其人权问题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特别是它把人权作为重要武器，攻击自己想象中的主要对手。在苏联解体前，美国一些人攻击得最厉害的是苏联，苏联垮台后，中国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这里，人权显然已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共识

对发展持两分法的态度，反对盲目追求速度，强调发展的长久性和持续性，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这个问题引起重视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保持生态平衡，合理使用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长期来一直把经济发展看成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看成是人类有能力改天换地的表现。把人与自然界相对立，以此来拔高人的地位，把自己看成超于自然的高等动物，直到 20 世纪中期这一直是人类的基本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与以下不正确的想法有关：自然环境向人类提供资源和环境劳务的能力是无限的，人类可以无限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但对环境无所谓责任、无所谓管理。在这些思想和行为的支配下，人类和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人类大规模地改变环境的组成和结构，使其符合自己的需要。由于向自然界排入大量有害的生产和生活垃圾，结果环境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系统受到很大破坏。这一破坏的恶果到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暴露出来，当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污染已相当严重，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劳动和生活。

1962 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尔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这是他历经数年的调查研究而写成的，可说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影响的环境科学著作。它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农业存在的问题：为追逐利润而滥用农药和杀虫剂，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它特别描述了有机氯农药给环境带来的严重危害，致使生气勃勃的春天变得寂静了。

10 年后，1972 年 6 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 114 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一次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人类开始正视环境污染问题，并准备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在这以前，发达国家已在开始认真治理环境污染。这次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即《斯德哥尔摩宣言》。这次会议可称为环境时代的起点和里程碑。不过，《斯德哥尔摩宣言》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它主要是就环境讲环境，没有把环境保护与社

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考虑,由此形成了如下实践:优先发展,事后治理。这时,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未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

1972年还出版了一本引起世界关注的研究报告,即《增长的极限》,其作者是成立于1968年4月的非政府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的丹尼斯·L·米都斯博士所领导的研究小组。该报告认为:如果人口数量和环境污染的种类及数量继续呈指数增长的话,世界将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因为地球上资源和环境自净能力都是有限制的;避免崩溃的最好办法就是限制经济增长,进入“全球均衡状态”,即“零度增长”。该论点被人们称为“经济增长极限论”。不增长是行不通的,世界毕竟要发展、要前进,但该报告极其尖锐地指出了地球潜在的危机及人类面临的困境,使得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了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不协调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的环境运动,也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和自问:人类的发展能否继续下去,我们应该寻找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来维持生态平衡?

80年代,人们对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如何使发展与环境相一致的问题上来。1980年,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出版了《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存资源保护》一书,该书可说是第一次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术语准确地提出来了。它提出:“持续发展依赖于对地球的关注,除非地球上的肥沃土壤和生产力得到保护,否则人类的未来是危险的。”该书还指出,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保护是为了使人类可以持续地利用地球上的资源,两者目的是一致的。但它又点明了困难所在:除非改善地球上几亿人的贫困,否则不会有真正的保护。

1983 年“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开始形成。这年 12 月，联合国授权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负责制订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环境决策。经过三年的工作，该委员会完成了任务，在 1987 年 2 月于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八次委员会上通过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第 42 届联大通过了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文件。

这个文件把环境与人类生存和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这一定义虽引起了许多争议，但得到广泛的认可。该报告表明，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今后的必然选择。

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世界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人口快速增长、南北经济更加不平衡、自然资源日益耗竭、特别是全球性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加深，如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加剧、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下降、森林面积锐减、有毒化学品越境转移等等。人类进入了必须作出历史性选择的重要关头，越来越多的政府、组织和个人关注这个问题。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它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从理论讨论推向深入，并采取了相应行动。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第一条原则写道：“人类处于普遍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该享有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大会共签署了五个文件，最重要的是《21 世纪议程》，它反映了人类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达到的共识，及各国最高领导层作出的承诺。

1997 年 6 月 23 日至 27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 19 次特别联大，主题是审议保护地球环境、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

《21 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来自世界上 170 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部长级官员在这里回顾了里约会议后五年来各国在执行《21 世纪议程》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并围绕一些直接影响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自 1992 年里约环发会议以来,这方面有增无减。据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本次大会上引用的数字,1992 年全球矿物燃料的消费量为 75 亿吨石油当量,而 1996 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 80 亿吨石油当量。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排放量的四分之一。欧盟曾许诺到 2010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15%,但美国、日本等国没有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作出具体承诺。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环保组织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在排放温室气体污染方面“缺乏应有的勇气和行动”,呼吁美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2. 援助资金问题。在 1992 年的里约环发大会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承诺要把国内生产总值的 0.7% 作为发展援助基金。但五年来的结果是,这一数字仅有 0.25%,而且还呈逐年下降趋势:五年前里约环发会议召开时全球公共发展援助资金是 550 亿美元,到 1997 年降到 500 亿美元。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发展中国家首脑抨击西方国家不愿承担这方面责任,指出正是这些工业国的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使得全球环境恶化,它们对此负有“生态债务”。

3. 关于保护森林问题。目前世界上每年减少 1400 万公顷森林,而且每年有上千个树种绝迹,里约会议以来世界上共有 10 万种动植物遭到灭绝。在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上,欧盟和加拿大主张立即开始就签订森林保护国际条约进行谈判,但美国和巴西等南美国家认为应确保现有森林保护协议的实施,等下世

纪初再根据情况谈判国际森林保护条约。

该次特别联大最后通过了一个总结性的文件《进一步落实 21 世纪议程的方案》，重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要求各国应以全球合作伙伴的精神开展合作。

人类对可持续发展正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新世纪初的情况表明，环境问题上的真诚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中国家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的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拒绝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义务，是一个最鲜明不过的例子。当前，19 次特别联大的总结文件中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可持续发展的总趋势比 1992 年更加糟糕，我们对此深深地感到忧虑。”

第三节 非理性主义渗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

非理性主义是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都是非常复杂的概念，但鉴于其在当今西方及世界文化潮流中的重要影响，这里我们简单地作一些介绍。

通常认为西方的文化传统是理性的，其基本特点有两个：(1)肯定科学技术的革命性作用，肯定它对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巨大意义，肯定人类社会现在比过去好，将来比现在要更好。(2)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和分析，通过演绎和归纳说清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不管是自然科学家还是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都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从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就是怀着这样一种极其乐观的情绪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在这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致的。

但从 19 世纪末以来，欧洲有一股日益强化的思潮，对科学技术改善人类困境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对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理智的分析来说明的论点也持怀疑态度。主要理由是：(1)科学技术不一定给人类带来幸福，而是带来人性的普遍堕落和倒退。科学技术发展了，人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但人自身却变得越来越可怜了，越来越变成了机器或物质的奴隶。(2)并非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和分析，通过演绎和归纳说清楚，比如下意识或潜意识或直觉的东西不一定能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说明，人的喜怒哀乐和一些下意识的行为有时就说不清楚。这种意见把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对立起来，把潜意识的行为与理智的行为对立起来，这就是非理性主义。

这样，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思想开始分道扬镳。前者仍然相信科学改造世界的力量，相信通过观察和科学实验能说明这个世界，即坚持理性主义者的观点，被称为科学主义或理性的科学主义；后者否认这些可能性，人们称之为非理性主义或非理性的人文主义，因为他们是出于对人本身的关怀而走向了非理性主义。

第一个系统地论述非理性主义的是德国的哲学家尼采(1844—1900)。20 世纪里，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弗洛伊德、萨特等等。尼采的思想在他的时代未成为主要潮流，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思想或非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想已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中，二战以来的尼采热反映了这种渗透性。为什么尼采及其为代表的非理性思想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西方人获得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这么高的地位，靠的是科学技术，为什么在文化思想领域，反科学的呼声愈来愈强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当然这里不是说 19 世纪末以来科学在西方受到了普遍蔑视，直到现在西方仍有大批大批的人在孜孜不

倦地从事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但从 19 世纪末以来,曾受到全社会一致赞扬的发现与发明受到了一部分人的强烈挑战,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人把这称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

1959 年,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帕希·斯诺(1905—1980)在剑桥大学作了《两种文化及再谈两种文化》的演讲,指出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他认为两种文化间存在一条相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存在敌意和反感。他为这两种学者画了像:人文学者往往用克制压抑的语气讲话,对他们的前辈诚惶诚恐,白愧不如,他们还看不惯科学家那种近乎狂妄的坦率,当科学家兴致勃勃地否定前人的结论或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做出了什么新发现时,他们感到不舒服,在他们看来,科学家是些粗俗不堪浅薄狂妄的家伙,根本没有教养,意识不到人类的处境是多么令人绝望和悲惨。科学家却认为人文学者软弱迂腐,无病呻吟,并且不关心同胞的生活。在科学家看来,只要世界上还有许多过贫困生活的人,那么不管将来会怎么样,首先都必须改变他们目前的处境,使他们过得好一些^①

这种现象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或者说现实生活越来越表现出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人本身的发展的矛盾性:

1. 科学越来越显现出是一种中性的东西,决不纯粹是进步的工具有。它引起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它造成了世界大战(没有现代交通、通讯设施和武器就不可能有世界大战)和种种残暴的行为。

2. 人在生产中的角色定位与他们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存在根本矛盾。一方面,在高度分工的现代化大生产中,各种工作日益专业化,整个生产组织形成庞大的科层机构(官僚机构),

① 查·帕·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3-4 页。

在这个机构中每个人都承担着特定的被事先规定的角色，雇员被公司看成是获取最大利润的工具。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化总是提倡人的自我发展、自我表现，把自我满足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结果，自我表现，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必然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严格要求相冲突。

3. 工作和消费也存在类似的矛盾。一方面大公司要求其雇员冷漠无情、紧张工作，把雇员变成“经济人”，拼命地干；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鼓励人们消费、刺激人的欲望，千方百计促使人们及时行乐。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娱乐、五光十色的商品广告，都在宣扬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不是根据需要而是秉承自己的欲望去消费。需要是有限的，而欲望是无限的。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充斥着有关服装、首饰、饮食、汽车、家具、化妆品、保健品广告，这些宣传不光在于推销商品，实际上还在宣扬享乐的生活目标。简言之，生产与消费要求一个人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结果在一些人中形成一种病态的生活方式，即工作时安分守己、拼命工作，丝毫不考虑自我问题，但业余时寻求刺激、豪饮酗酒，发泄受压抑的个人郁闷，仿佛只有在这时才实现了自我。工作为赚钱，生活为享乐，成了当代人的人生观。

4. 在私生活领域，过分强调自由，结果陷入了孤独。所谓过分强调自由，就是不受政治上、社会上、工作中、家庭中的任何权威，及任何文化传统的约束，这意味着个人无需对社会、对集体、对其他人负责。结果，人与人之间除了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发生关系外，其他的都日益淡薄。这样，个人自由是实现了，精神孤独也由此产生，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由此陷入困境。

5. 真正的自由很难得到，真正的平等也很难得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收入的差距非常大，更不用说那些权钱的幕后交易。财产的不平等又促使人们拼命往上爬，许多人为了改善自

己的地位,精神很紧张,老是担心着被社会所淘汰。

所有这些,都把人们驱向非理性的情感发泄。在有些迪斯科舞场里,几百个青年跳得如醉如痴,台上的演奏者声嘶力竭地叫喊等。在这种发泄中,他们似乎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因为他们暂时忘掉了一切。更令人担忧的是“自我实现”走了样,演变成“相对价值观”并迅速蔓延。1987年,美国的艾伦·布鲁姆出版了《封闭中的美国思想》一书,被列为当年非小说畅销书。他在书中说道:“价值相对论”正取代传统的价值观。任何事情的是非善恶不再有客观标准,损人利己被看成“有进取心”,自我炫耀可以看成“有自信心”。一个人服饰举止越与众不同越受人青睐,从奇形怪状的发型到同性恋者的习惯等等都是这样。大量文学艺术作品都表达了这类非理性的情感经历。

当然,不是说西方人都是非理性的,那儿仍有许多人在关心世界和平,反对种族歧视,维护民主权利,参与各种社会公益的活动,还有许多人在从事各种艰辛的学习和研究;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人们的非理性行为,目的也是为了引起社会的重视。但非理性主义已全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这是客观事实。

第四节 民族主义的强化与多样化

什么是民族主义?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多数学者认为,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含义包括三个方面: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民族意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本民族至高无上的忠诚和热爱;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在这种理论政策指导或影响下的追求、维护本民族生存和发展权益的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民族主义被认为是现代世界进程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

的动力之一。

一、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

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是随资本主义而产生发展起来的。约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中，民族主义在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中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既表现为大国扩张的重要思想武器，又表现为弱小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大国扩张的精神支柱。如在拿破仑战争中，拿破仑利用了法国人民的民族主义进行扩张，欧洲一些受拿破仑统治的国家也靠民族主义来动员人民起来反抗。这时，民族主义表现为两种性质：处在弱小地位时的民族主义一般来说是正义的，虽然有时不免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而处在扩张时期的民族主义是反动的。这时，民族主义的性质取决于该国国力的强弱和国际上的地位，当然，两种民族主义有共同性，都是为了谋取民族的最大利益。

到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民族主义逐渐蜕变为欧美列强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理论根据和精神动力。民族主义的反而明显凸现，既对第三世界构成巨大威胁，又严重冲击着列强之间的关系。

20 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殖民地已被先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要求按实力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对地区和世界的霸权，世界大战无可避免地爆发。然而，战争的直接起因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直接导致了两次大战的爆发。

为什么说民族主义是大战的直接起因？因为各帝国主义政府，特别是德意日政府，都是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专制主义融合为一体，在“实现帝国荣耀”、

“获取生存空间”的幌子下蛊惑民众,才能做到对内实行恐怖独裁统治,对外发动扩张战争的。

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相对衰落,美国成了世界霸主。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国家为了保护民族利益发展起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形式,即通过联合的道路来维持和保护各民族自身的利益。欧洲共同体的诞生及其朝着欧洲联邦方向的有力迈进,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曾困扰欧洲与世界达几百年的法德矛盾,而且也为人走向一体化提供了一个区域化发展的成功范例。这是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它与过去敌视其他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不同,是在欧洲民族自愿合作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带有国际性的新型民族主义思潮,有助于欧洲和平与世界稳定。

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

20世纪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大发扬的世纪。帝国主义扩张唤醒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民族意识,它们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自己的人民与殖民主义国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先后获得独立。民族主义对亚非拉各民族建立和巩固民族国家、争取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民族主义是每个新生国家保持民族独立、凝聚人心、团结全国人民从事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许多国家都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强调本民族的特点而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没有民族主义作支撑,这是很难做到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面前,民族主义有助于这些新生然而弱小的国家团结起来,加强与西方强国的对话能力。自1955年亚非会议起,主要由亚非等国家发起成立的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等联合行动的形式,呈不断发展的态势,在

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弱小民族靠各自的力量很难在国际社会上有发言权,因此,这种联合既是民族主义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形态,也是它的迫切需要。这导致了第三世界的逐渐崛起,成为国际舞台上—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开启了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进程。这里,民族主义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也必须看到,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在这里同样存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也存在要求民族特权、排外扩张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1)当其中有的国家变得比较强大时,也会去侵略周边的弱小国家,如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即使国力相当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据统计,战后的 50 年里,总共发生了 246 次武装斗争和局部冲突,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就发生在亚非拉国家之间。这些冲突和战争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民族主义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2)新生国家内部各民族因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而不和,造成众多的民族冲突和社会动荡,许多亚非拉国家至今仍被类似的问题所困扰。

三、后冷战时代的民族主义

80、90 年代以来,即冷战结束以来,民族主义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主要表现是:

1. 随着苏联的解体及受其影响,东欧、南欧和中亚新崛起一系列的独立国家。原来受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纷纷投向西方,庞大的苏联本身也分解为 15 个国家,南欧的南斯拉夫则分裂为 5 个国家。其中部分国家之间或其内部的关系也十分紧张,不时爆发冲突,最激烈的先是波黑的塞族与穆族的内战(1992—1995),然后是塞尔维亚科索沃的阿族与塞族的冲突,后者直接导致了北约对塞尔维亚的狂轰滥炸。此外,俄国境内车臣的反叛至今尚未彻底平息。

苏联的解体与今天出现的各新独立国家的民族冲突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民族主义恐怕是其中最主要的。苏联长期以来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大俄罗斯主义和人民族主义十分严重,60年代的中苏论战实际上是中国无法忍受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而爆发的。同样在50、60年代,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也都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根据自己的国情出发,探索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道路,抵制苏联干涉内政,维护民族主权和利益。当时的苏联提出了“有限主权”理论,即为了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可以对一国的内政进行干涉,其根据是世界社会主义利益高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的、现实的民族利益。这彻底伤害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感情。

2. 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的民族问题都出现尖锐化的趋势。冷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大量冲突都与民族利益冲突有关,其国内的冲突也是如此,特别引起关注的有两伊战争、海湾各国间的冲突引起的海湾战争,西亚的库尔德人问题,卢旺达的大屠杀,刚果、斯里兰卡等国的内战。最严重的当属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冲突和大屠杀,死亡约一百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一直苦于北爱尔兰问题的折磨,西班牙国内也存在类似问题,甚至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也要求独立。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以巴冲突其实也是民族冲突。

3.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正以人权等为幌子来追求自己的民族利益,这是民族主义发展的又一种新动向。他们以人类利益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借口下通过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来控制其他国家,支持自己的经济扩张,以实现最大的民族利益。一旦真正的人类利益要求他们作出一些牺牲

时,他们就犹豫或坚决不干,如拒绝要他们减少废气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

第五节 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

道德伦理是社会的行为规范,没有一定的道德伦理就不存在人类社会。二战以来,科学技术日益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毁灭人类社会的能力。

大家知道,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或者按现在通常的说法它是一把双刃剑。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它既可以为“好人”服务,也可以为“坏人”服务,如果坏人掌握了它,它就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工具,比如核武器;另一个意思是它在服务于人类时,会有副作用,如药品。

二战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把下面三方面的问题摆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1. 人类已拥有迅速或慢慢毁灭地球上的生命的能力。所谓“迅速毁灭”,指的是人类现在拥有的核武器可以把地球上的生命消灭若干次(这里且不谈一些国家正在研制的更可怕的武器);所谓“慢慢毁灭”,指的是工业化、城市化造成的污染和人们贪婪地无限制地掠夺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使地球上的生命灭绝。

2. 科学技术成果都有副作用,一些产品往往在我们尚不甚了解其副作用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投入使用,令人担忧。一般的副作用当然无伤大雅,但可怕的是这种副作用可能会导致人类出现某种缺陷,以致造成大批人的残疾或死亡,这方面已有不少教训。人类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明了乙烯雌酚,接着发现它

具有类激素的效用，一直被用作预防流产的处方药，还被当作改善孕期不适反应的灵丹妙药，像维生素一样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有些诊所还把它用作“事后”避孕药来用。农民甚至把它用作催肥家畜的激素。但后来才发现，它有干扰激素系统正常运作的作用，破坏了人体的正常发育进程，使之产生各种错乱，用它来保胎的人生下的孩子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人先天畸形或终生不育。

吃乙烯雌酚的人是少数，但基因食品的情况与此不同。90年代末，基因食品在美国已全面普及，但关于基因食品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争论并未有结果。英国人也许是比较保守，对此抱普遍反对态度。查尔斯王子发誓永远不会吃由基因改变得米的食物，并声明他不会让这种作物生长在英国的土地上。欧洲一般也持这种态度，由此影响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导致了欧美的贸易磨擦。当然，将来可能证明基因食品是完全合乎人类健康的要求的，但新的大规模应用的科学技术成果会不断带来同类的问题——并非所有这类问题都会被证明是杞人忧天，这正是人们感到可怕的。

3. 与人类繁殖和死亡密切相关的科技成果直接向人类现行的伦理道德提出了挑战。安乐死问题正烦扰着许多国家的政府，让许多人良心不安。有人试图把身患绝症的病人冷藏起来，以待将来医学获得突破后把他解冻进行治疗，也提出了一系列伦理问题。生的问题比死的问题更复杂。精子不来自“法定”父亲的试管婴儿有可能与提供精子的“父亲”的后代结合，我们该不该把血缘上的“父亲”告诉其本人？人世间的事情千奇百怪。意大利有一位年纪很大的妇女怀上了与同居者的“爱情结晶”，考虑到年纪太大，分娩会有困难，于是找女儿商量，请医生把自己子宫内的受精卵移到女儿的子宫颈。婴儿出生后，女儿

开始喜欢上自己生下的孩子,母亲当然不同意,于是双方都声称这是自己的孩子。^① 我们不知道罗马的有关部门后来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这里的责任者首先是医生,他应该考虑他的技术的伦理后果:这位孩子的母亲是谁?

与世纪末出现的克隆技术(1997年3月克隆羊“多利”诞生)相比,上面的例子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用你的体细胞克隆另一个你,这另一个你与你是什么关系,它与你的亲人——父母、配偶、子女及你的兄弟姐妹是什么关系?

这只是基因技术引起麻烦的一个方面。2000年中,耗资数10亿美元、历经10年努力的人类第一个基因组草图问世。基因革命的前景让人兴奋又让人担忧:如果保险公司知道你的基因有某种缺陷,它就可能不给你进行人寿保险,或限制你人身保险的某些险种,你将怎么办?这只是一个小程序。如果一个黑社会组织或种族组织知道了某个种族或某个人的基因缺陷,他们可能轻而易举地用某种药物或含有这种药物的食品、用品消灭这个种族或这个人。

2000年7月初,人类基因组草图才公布几天,媒体就纷纷表达了各种各样的忧虑:如果基因信息公开,雇主是否有权拒绝雇佣有癌症及其他绝症的人?如果能在子宫内检测出婴儿有生理缺陷或是智商较低,是否就可施行流产手术?科学家受金钱诱惑,会不会为富豪“定做子女”?如果基因技术真能让人活上几百岁、上千岁,人类社会将会怎么样,显然人们得尽量节制生育,但老人一定很多——除非人活上几百年后仍很年轻,叫谁来抚养?

纳米技术也提出了众多的问题,比如某一天,一个战争狂人

^① 见1989年1月6日《新民晚报》第8版《借腹出生的婴儿该属谁?》。

可能会让一只杀伤力极大的“蚊子”飞进某个庆祝和平大会的会场。2000年4月,美国一个大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比尔·乔伊在《有线》(Wired)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三方面的担忧:(1)未来30年内,具备思考能力的电脑将比现在强大100万倍,这是机器人自我复制及进化的关键,如果达到这一地步,人类将会受电脑或机器人的控制。(2)基因研究的成果会导致有人制造能毁灭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瘟疫”。(3)可细小到一粒原子大小的超微机器也可能拥有自我复制的能力,其毁灭性同样极大,是无法制止的“机械瘟疫”。这些担忧也许带有危言耸听的成分,但确实令人警觉。

可见,人类如果要继续生存发展,那么科学技术愈发达,它就得更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这不是某个国家、民族、种族的特殊的道德伦理,而是全人类共同承认的道德伦理,否则它将缺乏约束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种族是无法单独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依赖于人类全体一致的良知——全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的追求,才有望解决或缓和科学技术成果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当前,国际社会普遍禁止克隆人的试验,对试管婴儿等技术也有严格限制。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我们还是必须看到,一种技术一旦成熟,总会有科学狂人想把它付诸实施,或为了金钱或为了“第一次”的名声或纯粹出于无聊和反社会行为,像现在众多电脑病毒的产生一样。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的竞争涉及一个国家的存亡,谁也不会真的愿意停下来。使用越来越方便、杀伤力越来越大的武器会源源不断地造出来。而且只要造出来,就会扩散,谁也无法阻拦。这里,再次提出了人类的良知问题。

人类必须检讨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观念系统,重新认识幸福、进步、真、善、美等古老话题和科学技术在人类生存发展中的意义。当然,人类的冲突产生于阶

级、种族、贫富或宗教、文化、认识水平等等多方面的矛盾,企图用人类共同承认的道德伦理来控制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当前来说其作用可能有限,但让新一代的人具有这种新的意识仍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现代社会。

第六节 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牵动人心

恐怖主义古来就有,暗杀政府首脑和大臣或政府组织暗杀“不听话”的臣民,这类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现代恐怖主义与历史上的恐怖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自己的特点。

恐怖主义可分为两种:国内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前者一般属于本国内部的矛盾造成,其活动范围一般限于国内,对象也是本国人。后者由国际间的矛盾引起,当然也有国内矛盾演变成国际矛盾的。恐怖活动的发生地视情况而转移,所用的手段有袭击或绑架外交人员或外国公民,劫持飞机、轮船,占领外交使领馆并扣押外国人质,爆炸外国的公共建筑物。

二战以来,恐怖主义制造的事件极其频繁。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已达到每年几百起事件。刺杀国家领导人的事不断发生:仅在80年代,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黎巴嫩总理巴希尔·杰马耶勒、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和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先后被杀害,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被刺受伤。劫持飞机和扣押人质的事件特别多,1968—1980年全球共发生劫持飞机六百余起,造成1262人死亡和1066人受伤。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暗杀国家领导人这种旧式的恐怖活动持续不断。1995年被称为“国际恐怖年”,被暗杀未遂的

国家或政党领导人有南非总统曼德拉、巴勒斯坦首脑阿拉法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马其顿总统格里戈罗夫；被暗杀死亡的有格鲁吉亚副总理沃罗诺夫、以色列总理拉宾、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杰·辛格、哥伦比亚社会党领袖阿尔瓦罗。

现代恐怖主义的暗杀对象决不限于国家、政党的领导人或一些国家领导人认为“不听话”的人，一般说来，现代恐怖主义还有如下新的特点：

1. 被暗杀者往往不是暗杀者痛恨的对象，而是广大毫无保护的无辜平民。这是因为恐怖分子想暗杀的对象一般都受到很好的保护，难以下手，所以以平民为暗杀目标，作为泄忿或动摇民众对政府信心的手段。1972年9月，奥运会在西德慕尼黑举行，5日早晨9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黑九月”的成员袭击奥运村，他们先杀死2名以色列运动员，然后把另外9个以色列运动员带到郊区杀害，被杀害的还有1名西德警官。这种形式的恐怖运动不仅发生在国际之间，也广泛发生在一国的内部。阿尔及利亚的恐怖主义者常以平民为暗杀目标，安哥拉的恐怖主义者还制造火车倾覆事件，致使大量平民死亡。

2. 恐怖活动越来越有组织，恐怖主义者越来越重视系统的训练，从而恐怖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造成的伤亡和损失也越来越大。1993年2月，美国纽约世界贸易大厦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死伤1000多人。1994年2月，一个犹太恐怖分子闯进希布伦一座清真寺，打死打伤500个正在祈祷的巴勒斯坦人。同年7月，阿拉伯恐怖分子袭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犹太人居住区，造成300多人死伤。1995年全球发生的大小恐怖主义事件6000多起，除了上述暗杀领导人的活动外，影响巨大的还有：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首府联邦政府大楼“汽车炸弹”爆炸，死伤近600人；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组织施放“沙

林”毒气,造成 12 人死亡,5500 人中毒;莫斯科两次电车爆炸;巴黎连续 8 次地铁车站爆炸;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公共汽车内“人体炸弹”爆炸;斯里兰卡首都独立广场政府大楼爆炸。1998 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先后被炸,224 人死亡,5000 多人受伤。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分子在美国制造了历史上最严重、规模最大的恐怖事件,造成前所未有的平民伤亡和经济损失,其组织的严密程度也是空前的。这天上午恐怖分子在前后相差不大的时间内在美国各机场共劫持了 4 架飞机,其中 1 架被劫持后大概是碰上了机组人员的反抗,坠毁在匹兹堡附近,1 架撞上了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另 2 架撞倒了纽约的标志性建筑世界贸易大厦。四架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殒命,五角大楼和世界贸易大厦估计共有数千人死亡。世界贸易大厦的两座各 110 层高的大楼全部倒塌。

3. 恐怖活动的目的越来越模糊,从而恐怖活动的手段越来越残忍。这是 90 年代出现的恐怖活动的一种新倾向,被称为“新型恐怖主义”。以前的恐怖主义一般都有某种政治、经济目的,如推翻殖民统治或某个人的统治,或要求释放被捕的同伙,或希望得到一笔赎金。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在制造了恐怖事件后通常要宣布对某项事件负责,希望当局把他们的要求列入议事日程,在杀害无辜时也有一些限制,以免激起太大的反感,不利于达到既有目的。新型的恐怖主义者往往认为世界已经不可救药,所以没有什么长期目标,只追求一时“解恨”,不顾任何后果,所采用的手段极其残酷。还有一些恐怖行动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政治目的,纯粹是一种反社会的暴行,如随便寄送邮件炸弹,以炸死别人为乐事。

针对现代恐怖主义的猖獗,世界各国都在思考反恐怖主义

的问题，受恐怖主义严重干扰的国家早已在探索反恐怖主义的方法。美国在 1972 年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被害事件发生后，立即成立了反恐怖主义的内阁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但是近 30 年来的历史证明，美国的及世界各国的反恐怖主义并非很成功。这与恐怖主义行动防不胜防有关，但也与一些国家的态度和方法不当有关。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我国台湾的一位学者提出的见解值得注意。他认为，美国必须在三个方面改正旧有做法：

1. 美国应从思想上放弃世界各大文明的矛盾不可调和及西方文明绝对优越的思想，特别是放弃伊斯兰文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思想，化解各文明间的冲突。

2. 必须使反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共识，各国团结协作，才有望削弱恐怖主义的基础。他说道：“美国应结合其他国家的力量，以‘多边主义’的精神，经由联合国与大多数国家设计反恐怖主义的具体做法。只有使反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共识’，才能使美国免于成为恐怖主义的弹靶；只有绝大多数国家愿意通力合作，才能阻止恐怖主义的蔓延。但这一努力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放弃其‘美国优先’和‘独断主义’，到目前为止，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不能平等对待其他民族，就不可能指望会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

3. 美国应修改过于僵硬的反恐怖主义政策，在强调反恐怖主义的同时，政策要灵活，对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在采用武力时，也要留有余地，使其有改变政策的机会，“美国应切记最强硬的政策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政策”。^①

反恐怖主义有其异常复杂和艰难之处，但相信世界上绝大

^①关中《恐怖主义与美国命运》，《参考消息》2001 年 9 月 18 日第 9 版。

多数人民是爱好和平的，通过联合国实现各国通力合作，这是反恐怖主义首先必须做到的，不论是反对国内的恐怖主义还是反对国际的恐怖主义都需要这样。

第八章

世界文化背景下的 世界文学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认为：文学的历史也是文化的历史，文学是文化达成了自我表现心灵的可感觉的形式，并且是活生生的和发展着的，当我们把文学看成是人类精神的终极表现时，也就意识到了驱使人们建立文学艺术的那些巨大的社会冲突和精神冲突。艺术总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之中，一部艺术作品无论如何拒绝或忽视其社会，它总是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之中，有其大量的文化意义，因而并不存在自在的艺术品那样的东西。^①这说明应把文学放诸丰富复杂、处于动态过程的整体文化背景中，探究其在这一背景场中由内外各种因素交错作用和连锁反应所构成的复杂境况下的表现，并探究其已有的和

^①参见周宪等《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13 - 45 页。

可能有的流向。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谈论文化时，也不能缺失作为文化之一翼的文学，它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一种积淀和形象化的表现形式。

从以上章节的谈论中，大家已经看出东西方文化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西方文化作用下的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化浸润下的东方文学。下面我们分头予以介绍。

第一节 从远古到 19 世纪的西方文学

西方文学一般指欧美各国的文学，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宗教意识、文化类型等大致相近，因而在总体上呈现出相似性。从远古到 19 世纪的西方文学可以分八个阶段考察：

一、古希腊罗马文学

在欧美各国，古代希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并产生最早的文学。古希腊文学的最初成果是神话和史诗。神话是古希腊人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它的特点是人神同形同性，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马克思称它是“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古希腊最早的文字作品相传是盲诗人荷马所作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们表现了古希腊人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和热爱生活、奋发图强的精神。随后，诗歌、散文、戏剧等各种文学形式都发展起来，尤其以戏剧成就更为突出。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代表了悲剧方面的成就，阿里斯托芬代表了喜剧方面的成就。它们都以纯熟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当希腊趋于衰弱时，古罗马代之而起。其成就虽不及古希腊，但在模仿上颇有成绩，且对古希腊文学的保存起到了极好的作用。罗马帝国晚期，宗教兴起，文学转入第二阶段。

二、中世纪文学

公元476年,西方进入中世纪,即封建时代,基督教成为封建制度的支柱,教会占据绝对地位。这时的文坛,只有宗教文学盛行。各国封建化以前的文学只在早期的英雄史诗中有所保留,如英国的《贝奥武甫》、冰岛的《埃达》和《萨迦》。随着欧洲封建制进入繁荣,世俗文学也兴旺起来,首先出现了一批英雄史诗,如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意志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接着,骑士文学也兴盛一时。随后,由于城市的产生、市民的形成,出现了反映市民意识的市民文学,法国的《列那狐》和《巴特兰律师》是其中的代表作。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个过渡性的意大利大作家但丁(1265—1321)他的《神曲》表现了中世纪向文艺复兴文化过渡时期的矛盾。恩格斯曾这样评价但丁:“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但丁有着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著述,他的诗歌集《新生》为追念青年时恋慕但早死的姑娘彼阿特丽采而作,用地方语言托斯卡纳语写成,推进了欧洲“温柔的新体”的创作。他在《飨宴》中批判了封建等级观念,认为真正的高贵在于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人文主义思想。在《论俗语》中,针对当时官方语言和文学写作中拉丁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他提出了俗语的优越性,强调了形成意大利语言,即形成民族语言的必要性。在《论世界帝国》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论证人类社会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能够充分发挥潜在才能,而这必需在自由平和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这本书其实带有反专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9页。

反教会的特点。他的代表作《神曲》用梦幻文学的形式写成，包括《地狱》、《炼狱》、《天堂》三部，作品通过但丁在维吉尔引导下游历地狱、炼狱，在彼阿特丽采引导下进入天堂的见闻，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封建者的专横和教会的贪婪，推崇理性、美德和知识，闪耀出人文主义的光辉。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

14至16世纪是欧洲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时代，欧洲发生了一场以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为旗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新文化运动，史称“文艺复兴运动”。它反对中世纪以神为本、一切以神为中心的思想，主张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它反对禁欲主义和出世思想，主张个性解放，享受现世生活，后人称之为“人文主义”。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彼特拉克和薄迦丘是人文主义的先驱。15世纪末，文艺复兴运动波及到欧洲各个国家，法国的拉伯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三大巨人。

拉伯雷(1494—1553)以《巨人传》而蜚声文坛，在小说中，作者以夸张的笔法、诙谐的口吻给大家讲述了巨人庞大固埃的故事，对违反自然、抵制科学的教会势力和危害人民的司法制度作了猛烈抨击，很有时代进步意义。

塞万提斯(1547—1616)的代表作是《堂·吉珂德》，作者故意模拟骑士传奇的写法，描述乡绅堂·吉珂德和他的侍从桑丘的游侠史，通过他执迷不悟、几近毙命的可笑活动，嘲笑了骑士理想和骑士制度，揭露了骑士传奇的荒唐和危害。堂·吉珂德也变成了那些不识时务的行动者的代称。

莎士比亚(1564—1616)，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一生中写有37个剧本、两部长诗和一部包括154首十四行诗的诗集。他最著名的戏剧作品有历史剧《亨利四世》，喜剧《第十二夜》和悲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其中后四部被称作是“四大悲剧”。他的历史剧取材于英国历史,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拥护英明君主,希望国家统一而强盛。他的喜剧主要以青年人的爱情与友谊为题材,以一种浪漫的抒情风格,歌颂人文主义的美好理想。他的悲剧主要写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以及理想的毁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封建关系崩溃、资本积累时期的种种社会罪恶。总之他的创作体现了时代精神,代表了西方古典戏剧的最高成就,因此,人们把他称作是“时代的灵魂”。悲剧《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剧本取材于古代丹麦历史,借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反映英国的现实。主人公哈姆莱特虽然是个王子,实际是个人文主义者,他有崇高的理想,对人类对世界都有新的认识,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目光敏锐,思考深刻,又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对现实罪恶的认识越深,内心痛苦也越强,以至对原先的理想和众多的事物产生新的怀疑,陷入到精神忧郁中。哈姆莱特的悲剧是时代悲剧,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

四、古典主义文学

17世纪是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时期。英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弥尔顿写下了《失乐园》、《复乐园》等作品,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作家。法国处在资产阶级与贵族势均力敌的状态,专制君主制发展到极盛时期,古典主义文学应运而生。这一文学维护国家统一,遵从理性原则,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莫里哀是其中成就最高、最富有民主倾向的喜剧作家,他的代表作《达尔杜弗》(又译《伪君子》)塑造了一个虚伪、狡猾、残酷的伪君子形象,成为封建统治下宗教横行的一个活表征。

五、启蒙文学

18世纪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决

战的年代，发生在这一年代的启蒙运动就是为资产阶级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它高举理性的大旗，反对专制统治和宗教迷信，提倡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主张通过科学和教育来实现社会改革。法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他们本身都是启蒙思想家。英国文学的主要成就是现实主义小说，经过笛福、理查生到菲尔丁的努力，逐步具备了近代长篇小说的规模。德国文学也奋力赶上，歌德和席勒的创作达到了先进水平。

歌德的《浮士德》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历史总结意义的作品。歌德(1749—1832)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是德国“狂飚突进运动”的代表。他的《浮士德》描写了浮士德不断追求、勇于探索的一生，是一部时代精神发展的历史，也是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初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文化发展的生动缩影。浮士德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他不断追求知识和真理，追求崇高的理想，他有自强不息、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积极向上的精神，但他同时也贪图享受、安于现状。这构成了他性格的内在矛盾，在矛盾的辩证冲突中，浮士德逐渐走向高尚和纯洁，最后达到了个性的完善。这样的展示一方面具有时代精神的概括意义，另一方面也对人性作了深层次的探究，具有人类学意义。

六、浪漫主义文学

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欧洲掀起反封建的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这一高潮中，浪漫主义文学兴起，形成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作家的主观精神，把文学看成是作家主观精神的体现，它强调想象和感情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追求奇人逸事，歌颂大自然，用这些来与现实相对照。它还主张创作自由，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

浪漫主义首先在德国兴起，后来波及到其他国家，在文学上，以英法两国的成就最为突出。早期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是以华兹华斯为首的“湖畔派”诗人，新一代的有拜伦、雪莱等。拜伦(1788—1824)是个破落贵族出身，从小就形成忧郁、孤独、反抗的性格。他在《东方叙事诗》等诗作中塑造了一类被称为“拜伦式的英雄”的人物，他们都是些孤傲的反抗者，蔑视文明社会的宗教和道德，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但又脱离群众，带有悲观绝望的情绪。他的这种充满激情、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精神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演进。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是雨果(1802—1885)，他是一位文化巨人，在小说戏剧等多方面均有成就。1827年，雨果发表《克伦威尔》序言》，提出“浪漫主义的真正定义不过是文学界的自由主义”，反对古典悲剧的形式法则，主张师法莎士比亚，争取更大的自由和真实。1830年他写成《欧那尼》，使浪漫主义在文坛上取得最终胜利。不久，他又写出《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等作品，竭力宣扬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共和思想，流露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为西方人展示了一个理想化的前景。

七、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19世纪中期，欧洲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人们面对贫富分化、金钱势力统治一切的冷酷现实，不再沉溺于幻想和空洞追求，而是用冷静务实的眼光来对待现实。由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应运而生。作家们把客观性和真实性作为自己创作的口标，力求按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生活，他们奉行典型化原则，通过典型形象写出现实生活中的本质的东西。这种文学还有揭露性和批判性的特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入木三分，因而有“批判现实主义”之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初出现于法国，司汤达、巴尔扎克是奠基人，后来有梅里美、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等人

巴尔扎克(1799—1850),伟大的小说家,1829年发表长篇历史小说《舒昂党人》,标志其现实主义创作迈出了第一步。在其后 20 多年的时间里,他以超人的才思完成了大量杰作,统名为《人间喜剧》。这一小说总集长达七百多万字,包括 96 部长中短篇小说,塑造了近两千个人物形象,被誉为“法国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的创作以揭露金钱罪恶为中心,在这一主题下,真实地反映了拿破仑时期、王政复辟时期、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揭示了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攻击和逐步替代的过程。作家用形象化的手法揭露金钱关系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和拜金主义风习下发生的幕幕惨剧,表明了资产者必将毁于金钱和财富的思想。作品也体现了在当时社会中寻找新的社会力量的努力,塑造了一批属于未来的人和一批主张共和的人。

英国也出现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如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等。

俄国和北欧的现实主义文学起步较晚,但成就卓著。普希金是第一个使俄罗斯文学走向世界的诗人,他的抒情诗在世界文坛上标然独立,他的小说创作如《上尉的女儿》等标志着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的转变。果戈理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钦差大臣》是世界讽刺戏剧中的名作,他的小说《死灵魂》以其高超的叙事艺术塑造了独特的俄罗斯地主形象系列,同时也真实地展示了 19 世纪初的俄罗斯现实。此后,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将文学创作推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托尔斯泰(1828—1910)是伟大的小说家,他在《童年》、《少年》、《青年》和《塞瓦斯托波尔特写集》等作品中所表现的朴素的现实主义、深入细微展示人物心理全过程的“心灵的辩证法”对道德完美的思考和追求,使他卓然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1869年,托翁完成史诗作品《战争与和平》,全景式地展示了俄罗斯19世纪初期的社会图式,从宫殿到乡村,从贵族到贫民,从老人到青年,还有女性生活,他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变革时期人们的心灵裂变,特别是先进贵族青年的精神探索。70年代,他写成《安娜·卡列尼娜》,从列文的农村改革和安娜的爱情悲剧两条线索上,探讨了俄罗斯的发展问题,引人思考。80年代,他早期的思想探索逐渐明朗,彻底转向宗法制农民立场,表现俄罗斯民众和人类的迫切问题,如《克莱采尔奏鸣曲》等。而90年代写出的《复活》则是托翁一生精神探索的总结。这种探索与他自己的地主生活发生尖锐冲突,他全面否定自己的贵族阶级,否定农奴专制,否定一切私有制,他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民主倾向和社会批判性,同时更充分地表达了他的道德自我完善思想,基督博爱思想和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他就这样在自己的现实社会和精神生活中完成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因此列宁称他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①

契诃夫(1860—1904),以写中短篇小说为主,原先是个医生,因对俄罗斯现实有了深切的体会而愤起从文,他的创作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渴望新生活,但也常常流露出对社会现象迷惑不解的感伤情调。他的小说共有四百多篇,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无伤大雅的事,实际上分别嘲笑了专制制度的不合理和小市民的奴性心理,表达了民众对幸福的渴望。

北欧主要有安徒生和他的童话,易卜生以《玩偶之家》等“社会问题剧”而享誉世界。

19世纪中期,美国文学快速赶上,先是出现著名浪漫主义

^①列宁《列宁·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诗人惠特曼,到 80 年代后,现实主义文学兴起并达成高潮,出现了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作家。惠特曼(1819—1892)是美国最杰出的民主诗人,是第一个让美国文学走进世界文学视野的民族作家。他的代表作是诗集《草叶集》,作品形式独特、感情热烈、思想深刻、倾向进步,以赞美自己、赞美民众、赞美祖国为基本主题,以江河奔腾的气势,自由的旋律、平易的语言,开美国一代诗风,对美国和世界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马克·吐温(1835—1910)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运用幽默讽刺手法揭露和批判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黑暗现象,在艺术方面独树一帜。他的名作有《镀金时代》、《竞选州长》、《汤姆·索耶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等,代表作是《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和虚伪的道德作了深刻揭露和尖锐的讽刺。小说描写一个外乡人在一个深夜,将装有 160 磅金元的口袋放在赫德莱堡的一个银行出纳员家门口,让他转交不知名的恩人。该恩人若能说出一句与装在钱袋密封信中的话相同的话,就可得到这笔巨额金币。消息传开,镇上 19 户显要公民都想冒充恩人而得到这笔钱,这时,他们得到提示,说信中的话是“你决不是一个坏人,快去改过自新吧”,于是他们都向公证人提交了这个答案。公证人当众拆开外乡人留下的信封,却发现此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所谓金元也只是镀金的铅饼而已,由此揭穿了赫德莱堡人所谓“诚实”“清高”的假名声。作品围绕一袋金元展开情节,运用悬念,引人入胜,语言精湛,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八、19 世纪末的变化

19 世纪末,西方一些大国相继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思想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文学也因此变得复杂,除现实主义文学外还出现了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流派。所谓自然

主义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客观地描写现实，主观上不作艺术的选择和提升。这种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左拉（1840—1902），他的创作受泰纳的实证主义哲学、贝尔纳的遗传学说影响，主张文学是客观地记录生活，不作任何评价，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他写成了 20 卷本的宏大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展示了第二帝国这个“充满疯狂和耻辱的奇异时代的画图”，涉及人物一千多人，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有反映矿工生活的《萌芽》、揭示金融财团间倾轧的《金钱》、反映社会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小酒店》和《娜娜》。《小酒店》是其最成功的作品，他通过对一个劳动妇女绮尔维丝艰难困苦的一生的描写，展示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绮尔维丝一生的愿望是有一口饭吃，有一张热床睡觉，她含辛茹苦，没命地劳作，但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在无奈中走上街头出卖肉体，仍不足以维生，最后像一条狗一样倒毙在楼梯的拐角处。作品读来催人泪下，引人思考。此外，作品以自然主义笔法写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景象也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触目惊心。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文学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无产阶级文学。英国的“宪章文学”是早期无产阶级文学，70 年代的巴黎公社文学则以其理想的光辉、战斗的风格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鲍狄埃是最杰出的作家，其代表作品是《国际歌》歌词。

第二节 20 世纪的西方文学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复杂的世纪，也是西方文学异常复杂的一个时期。在 20 世纪里，西方社会的变化异常剧烈，从社会历史变动这个角度说，至少发生了这么几起重大事件：第一

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30年代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冷战、柏林墙被推翻和苏联解体，“一元化世界”与“多极化世界”的对抗。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空前复杂而活跃的局面。从广义的角度说，现代西方文化仍以“科学”和“人”为基本主题，可是现代西方人在向大自然和外界索取自由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受到这是付出了牺牲自我内在自由的高昂代价才取得的，于是人们的危机感、忧郁感加深了，自我意识、悲剧意识强化了，对过去理性上认可的许多东西（如人道主义、民主精神）产生了怀疑。作为文化之母的哲学不可避免地要反映人们智慧而痛苦的深思。在该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不断发展，大量进步的作家、理论家坚持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指导下创作。但与此同时，作为对现实社会和自然的一种别样的反映，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也急遽发展，主要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认为非理性的生活意志统治和支配世上一切，是人间万恶和痛苦的根源，幸福只是一种幻想），尼采的“超人哲学”（认为生命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和动力，强调“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强调人的主观认识作用和冲动的力量，认为世界是生命冲动的过程，人只能凭直觉、本能和感性认识世界本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的心理有三部分组成：伊德、自我、超我，伊德代表生活本能冲动，本能冲动又按享乐原则行事，自我是现实化的本能，超我是道德化的本能，本能起决定作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把人的存在当作全部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奉行“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自由选择论”），这都为当代西方人的生存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对当代西方人的精神状态做了一个极好的注释。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也就出现了别样的形态。按常规认识，这时的文学有三种形态：无产阶级文

学、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三种文学互相区别、互相斗争、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形成了多元共存、综合、多变的格局。

一、无产阶级文学

无产阶级文学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取得的成就最高,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为代表,体现了阶级性、党性和工具性,出现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如高尔基及其《母亲》,肖洛霍夫及其《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高尔基(1868—1936)是伟大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政论家、文论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列宁称他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权威”,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名著《母亲》,成功地描写了新型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事业和精神,成为俄罗斯和世界文学的一个里程碑。《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描写了从1863年起50年间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作品还以纺织工人莫洛佐夫一家三代的历史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长篇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在规模宏伟的历史潮流和社会背景上描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历史命运,表现了个人主义者从革命的旁观者到投机家到反革命的过程,同时也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出色的行为,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胜利。高尔基的创作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都有引导者的意义。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文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其处身于资本主义的汪洋中,因而主要表现为批判性和革命性,主要有小林多喜二的《党生活者》,斯坦培克的《愤怒的葡萄》等。

二、现实主义文学

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得到发展,但已出现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作家的注意中心转向人的内心世界,所谓的“内向化”趋势十

分明显,同时他们在创作手法上也受到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自觉地借用了象征、隐喻、变形等方法。当然,不同的作家间也有一定差别,有些偏向于传统观念和方法,如高尔斯华绥、毛姆、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茨威格,德莱塞等,也有一些重在创新,如康拉德、劳伦斯、海明威,他们都在自己专长的方向上取得了可喜成绩。

罗曼·罗兰(1860—1944)是法国作家,高尔基称他是“法国的托尔斯泰”,他在一生中写下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充分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各起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和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思考 and 选择。罗兰本人是一个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转而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杰出作家。他的代表作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写一个具有音乐天才而又性格坚强的主人公与庸俗环境的尖锐冲突,表现了作者对艺术的崇高社会使命的充分肯定和对当时巴黎文艺界虚伪、腐化现象的深刻批判,同时对主人公反抗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实质也作了比较恰当的艺术处理,这是一部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于一体的传世佳作。

德莱塞(1871—1945)是20世纪美国文学的泰斗,他以处女作《嘉莉妹妹》成名,在其后的10年里写出了《珍妮姑娘》、《欲望三部曲》、《美国的悲剧》等杰作,对美国资本势力横行无阻的社会现实作了沉痛的揭示。他的代表作是《美国的悲剧》,描写青年克莱德为了能与阔小姐结婚,设下圈套将与自己谈恋爱的已有身孕的女工洛蓓塔推入湖中淹死,但终被警方破获,从而以“故意杀人罪”而受审。作品沉痛地指出:大批美国青年为了财富和权势、地位,正在朝着没有人性的方向堕落,这是青年人的悲剧,更是美国的悲剧。作品运用精神分析法解析人物的幻觉、下意识、梦境和心理状态,很有思想深度。

海明威(1899—1961)是美国作家,“迷惘的一代”的代表,20

年代他发表《太阳照样升起》等,通过一群美国青年的生活,透视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揭示了战争给人们生理和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50年代,他完成《老人与海》,获得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的作品,大多以战场生活、拳击、围猎、钓鱼等为题材,表现战争、暴力、痛苦和死亡,既揭示暴力给人造成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又不断展示人的勇气和不屈的性格,从而探讨了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和出路。他笔下的桑提亚戈成为世界文学中不朽的硬汉形象。

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主要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40年代后走向衰落。奥地利的卡夫卡、爱尔兰的乔伊斯和法国的普鲁斯特是奠基人。现代主义文学以反传统为基本特征,在思想上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观念表示怀疑,着力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对立、异化关系,表现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他们的思考探索;在表现手法上,以表现法代替再现法,乐于用象征、隐喻以至荒诞、自由联想等非理性、反逻辑的手法来挖掘人的潜意识,表现瞬间的情绪和印象。

现代主义文学包括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等流派。卡夫卡的创作如《美国》、《城堡》、《审判》、《变形记》等被人称作是“卡夫卡式”文学,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法的怪诞、政的怪诞和人的异化,表现了西方人的孤独和恐惧感,是充满多义性和预言性的寓言,因而卡夫卡被人看作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是法国的瓦雷里、爱尔兰的叶芝和英国的艾略特、美国的庞德,代表作品有《海滨墓园》、《荒原》等。意识流文学着重表现人的意识流动过程,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乔伊斯和伍尔夫,代表作品有《追忆逝水年华》、《尤利西斯》、《到灯塔去》等。表现主义文学

重在本质,追求抽象、充满激情,爱用夸张,代表人物有斯特林堡、卡夫卡,代表作有《青鸟》等。超现实主义主张用“自动写作法”从事写作,代表人物有布鲁东、阿拉贡等,代表作有《娜嘉》等。未来主义强调艺术着眼于未来,代表人物有马里涅蒂、谢维里亚宁、马雅可夫斯基等,代表作有《穿裤子的云》等。

后现代主义文学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文学形态,它一反现代主义文学的焦虑和痛苦,而以一种麻木的姿态出现,只讲究平面交流,不追求深度判断。包括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等。存在主义文学演绎的是它的思想命题,代表人物有萨特、加缪等人。荒诞派戏剧以反常的戏剧手段表现荒谬的人生,主要有尤奈斯库及其《秃头歌女》、贝克特及其《等待戈多》等。黑色幽默是美国独有的文学现象,以一种无奈的无所谓的姿态对待不幸,让人欲哭还笑,主要代表是海勒及其《第二十二条军规》。“垮掉的一代”也是美国的一个文学派别,一批美国青年在经历了二战以后,对社会人生失去希望,以沉沦的玩世不恭的姿态游戏人生,因而得名,其文学也以反映这种现象为主旨,代表性的有克茹阿克及其《在路上》、金斯堡及其《嚎叫及其他》。新小说主要在法国,以“写生”的态度来记录客观事件及情景,大力提倡语言创新,主要有罗伯-格吕耶及其《橡皮》、西蒙及其《佛兰德公路》等。

除此外,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也是个特殊的文学现象,这种文学将拉美现实和神话传说相结合,将印第安民俗与现代主义思想相结合,产生了神奇的审美效果:夸张、荒诞与魔幻色彩的交融。主要代表有卡彭铁尔、阿斯图利亚斯等,尤其以马尔克斯最为著名。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作家,获198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是《百年孤独》,该作品主要写了布恩地亚家族一百年的兴衰史,从中映照出了拉丁美洲

地区的历史演变，宣扬了人间真爱，也谴责了专制暴政，内涵丰富，色彩斑斓。

第三节 苏联文学

苏联文学是个特殊的文学概念，本教材指称的是 1917 年苏联成立到 1990 年苏联解体时出现在苏联的文学，因为这种文学与一般意义的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都有明显的差别，将之纳入到常规的东西方文学中去讲解都有所不妥，而这种文学在 20 世纪客观上又构成为最有成效的文学景观之一，因此必须把它独立出来作专门介绍。苏联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俄罗斯，苏联文学是在先前的俄罗斯文学的基础上蜕变而来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经历了从动荡到毁灭又从毁灭到新生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而是俄罗斯旧政权危机四伏，摇摇欲坠，特别是经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政治的腐朽暴露无遗，另一方面，俄罗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经过 1905 年的革命、1917 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终于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新颖文学形态。这种文学总的来说明显有别于以前的任何一种文学形态，它完全代表工农民众的利益，集中体现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旨和无产阶级的意志，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宪章文学、巴黎公社革命时期的文学，但比诸这些文学，无论在成熟度上还是规模上都有显著的发展，它在苏联已依托政治而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文学。从理论上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等文章中，对这一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作了明确的规定和引导。他说：“文学事业应当

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这些意见造就了苏联文学或者说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特点:阶级性、党性和工具性。对于苏联文学,我们可以分两个时期来考察,其一是十月革命到 50 年代中,其二是 50 年代中到 90 年代初。

一、十月革命到 50 年代中的苏联文学

十月革命到 50 年代中的苏联文学一般又细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十月革命到 1934 年,第二段是从 1934 年到斯大林去世后一年即 1954 年。在第一阶段,苏联文学处于初创时期,旧世界刚刚覆灭,新时代到来不久,文学界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在这时期,文学团体众多,派别林立,思想活跃,论争激烈。当时影响较大的文学团体有“拉普”(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山隘”、“列夫”、“谢皮拉翁兄弟”等。这些文学团体的论争对于社会主义苏联的新文学的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932 年,联共中央颁布《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宣布解散所有的文学团体。1934 年,著名作家高尔基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和基本方法,并用定义的方式写进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647 页。

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①这一章程对苏联文学的未来发展作了具体的指明,直接造就了相关文学成果的产生。

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体现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上。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诗、讽刺诗,叶赛宁的抒情诗,别德内依的诗歌,还有象征主义诗人勃洛克和勃留索夫的诗歌在诗坛上都有较大影响,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毁灭》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小说。革拉特珂夫的《水泥》、费定的《城与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是很有影响的史诗性作品。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是十月革命的歌手,苏联杰出的无产阶级诗人,他15岁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对无产阶级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马雅可夫斯基早期的代表长诗《穿裤子的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也表现了一定的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抗精神和孤傲、悲观情绪。十月革命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诗人称十月革命是“为我的革命”,他写的《我们的进行曲》表达了胜利后人民的喜悦心情。1919到1921年,他担任“罗斯塔讽刺之窗”的配诗宣传画工作,展出一千多幅诗画,在群众中产生极大影响。长诗《好》是纪念十月革命之作,作品将叙事和抒情结为一体,展示十月革命胜利后十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歌颂了党和人民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长诗《列宁》是其代表作,描写了列宁的人格和他的不朽事业。全诗分三章,在序诗中他说明了创作原因,第一章揭示

^①转引自王忠祥、彭瑞智、朱密生主编《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了列宁出现的世界意义，第二章结合俄国革命的发展史，重点讲述了列宁的生平和事迹，第三章重心在抒情，表现了人民对列宁的尊重和崇敬，诗行中流露出真诚、悲壮、神圣的情感。这诗以阶梯诗的形式出现，比喻新颖，想象瑰丽，为苏联诗歌提供了成功经验。

阿·托尔斯泰(1883—1945)是苏联著名作家,科学院院士,曾三次获斯大林文学奖。他的代表作是史诗《苦难的历程》,由三部曲组成:《两姊妹》、《一九一八年》、《阴暗的早晨》,近百万字,广泛描写了十月革命前、革命时期、国内战争时期的俄罗斯生活,描绘了俄罗斯人民在党领导下经受考验取得胜利的伟大过程。作品主人公是四个知识分子,第二部的题辞“在清水中泡三次,在血水中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变得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说明知识分子经过革命和战争的磨练,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洗涤去了灵魂上的污垢后,最终走向了人民和革命。

肖洛霍夫(1905—1984)是一位对苏联和世界文学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作家,他的创作强调写真实、写普通人的命运,充满了悲壮的色调。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从1926年开始写到1939年完成,共分四部八卷,描写了1912年到1922年间发生在顿河边区的人民的生活,揭示了在“各种事件的强烈漩涡中的个别人的悲剧命运”,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必然: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作品主人公葛利高里勤劳纯朴、热情勇敢、善良正直,但又有哥萨克人的效忠沙皇、看重荣誉等,是个引人动容的悲剧人物。

苏联文学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不久就受到遏止,这便进入了该时期的后一阶段。1935年后苏联形势发生变化,党内斗争日趋激烈,到1937年终于酿成肃反扩大化,一批作家受到不合理的打击和伤害,一些优秀作品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

特》、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城》和《地槽》等都被禁止发表和出版，文学陷入萧条冷落之中。1941年到1945年的卫国战争是苏联文学的特殊时期，诗歌的作用尤其突出，库马奇、西蒙诺夫、古洪诺夫、苏尔科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和伊萨柯夫斯基的诗作传诵一时。政论和特写也颇有影响，特别是爱伦堡和波列伏依的作品引人注目。战后初期，一般说来文学界缺乏生气，一些简单的歌功颂德之作风行一时，但这些以歌颂为主的作品中也不乏有一些优秀或深刻的东西，如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这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顶峰作之一，作者创造性地综合战争时期苏联文学的一切优秀成就，为苏联的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精神建立了一座文学纪念碑。作品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背景，塑造了一批年轻人英勇抗击德国侵略者的英雄业迹，充满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光彩。再如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这部小说反映了十月革命前后半个世纪中俄国历史的变迁，触及了当代一系列重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如人与自然、社会进步和科学家的道德责任、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真假爱国主义等。作品以森林为题材，也以森林为祖国、人民和永恒生命的象征，提示人们既要爱护俄罗斯森林，更要爱护俄罗斯的人才。

二、50年代中到90年代初的苏联文学

从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苏联文学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1956年苏共20大后，开始揭露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一历史性变化引起文学的巨大变化。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是这种变化的标志，此后出现的一批文学作品被称为“解冻文学”。《解冻》写1953年冬到1954年春一个工厂发生的变化。厂长茹拉甫辽夫只注重生产，不关心工人的生活，将上级拨给的盖工人住宅的经费拿去建一个车间，致使工人长期住在又潮又暗的

工棚里,后因工棚倒塌而被撤职,他的妻子莲娜也因没有爱情生活而离开了他。小说最后借人物之口说:“到解冻时节了”。小说提出的不少社会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关心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要注意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要尊重创作自由,文艺要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时,理论界的空气也空前活跃,从批判“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开始,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原则,后来引发出对诸如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文学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新评价。

总的说来,50和60年代的苏联文学比较注重提出并回答大变动时代出现的重大问题。70和80年代的文学则倾向于对一系列人们关注的问题进行冷静的思考和探索。在苏联当代文学界,以农村题材作品、战争题材作品和以道德探索为主的作品成就最引人注目,此外,诗歌创作也有新的发展。

在农村题材中,先是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开一代新风,后有别洛夫的《凡人琐事》等作品和舒中克等人的创作在这一领域进行的新探索。

战争题材作品更是丰富多彩,先是“战壕真实派”作品,如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等独辟蹊径。后来是“司令部真实派”作品,如恰科夫斯基的《围困》、西蒙诺夫的《最后的夏天》等,恢宏壮阔,气势如虹。还有把这两种“真实”结合在一起的创作,如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岸》,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

《热的雪》是苏联最早出现的“全景性小说”之一。小说从苏军最高统帅部、集团军领导和前线战壕中的士兵三个不同的角度,描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的一次阻击战,场面惨烈,慑人心魄。《岸》是邦达列夫的代表作,主要写苏军炮兵排长尼基金与德国少女爱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1945年,卫国战争即将

结束时,因为尼基金在炮火中救下了爱玛,爱玛以身相许,两人彼此相爱,但战争迫使他们分离。战后,冷战局而又使他们天各一方,这样一晃就是 26 年。到 70 年代时,尼基金作为作家去德国参加文学活动,碰到了爱玛,两人情意绵绵,沉浸在甜蜜而痛苦的回忆之中。字里行间渗透出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战争的谴责。作品用回溯法把现在和过去联系在一起,将多种文体熔于一炉,具有较高的写作技巧和可读性。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瓦西里耶夫的代表作,小说以 1942 年冬的卫国战争为背景,写德军在苏联北部军事要地 171 附近空降了一批伞兵,企图破坏铁路,被苏军的女高射机枪班发现,于是准尉华斯科夫带着五名女兵前去追击,结果寡不敌众,五个女兵相继牺牲,最后华斯科夫在左手负伤的情况下消灭和活捉了残余敌人,保卫了运输线。小说通过准尉和女兵们在战争环境下的生活表现和心理活动,热情讴歌了苏军战士崇高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作品洋溢着浓烈的抒情色彩,姑娘们的活泼美丽和俄罗斯北国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孕生出强烈的美感。

道德探索题材以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和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最有深度。艾特玛托夫是吉尔吉斯作家,他的作品以关注人性善恶为主,他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以工人叶吉盖安葬老友时一天内的所思所想,回顾了苏联 50 年代到 80 年代近 30 年间的生活,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融合在一起,传达了中心思想:泱泱大千世界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从而传出了关注人性和人生的人道主义声音。其后他又发表《断头台》,通过两个劝善的“殉道者”的行动,宣扬了人道主义思想,但作者在这里对道德感化已流露出一定的怀疑倾向,小说借母狼之眼观察社会,发现很多问题,也表明了作者对人性堕落的

思考,具有一定的批判性。

诗歌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大声疾呼派”和“悄声细语派”。“大声疾呼派”的最大特点就是用诗歌去回答人们最关心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作品中充满辩论、呼吁和号召,有政治激情。这一派以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为代表。这一流派到 70 年代时分崩离析。“悄声细语派”主要写抒情诗,这一派诗人主要以自然景色、农村、古迹以及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内心的感受和情绪的变化,传达出当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创作一般不触及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其诗作大多在沙龙和小花园和对个别人低吟,代表人物有鲁勃佐夫、索科洛夫、日古林等。这一流派在 70 年代时受到人们关注,80 年代达到鼎盛。

到了 80 年代后期,由于苏联在改革深入过程中最后导致了失败,人们的关注点主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思想纷杂,情绪不宁,所以文学一度无所适从,成绩低落。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正处于总结状态。

第四节 东方文学

东方文学泛指亚洲和非洲各国的文学。它是世界文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为方便起见,我们分四个阶段对东方文学作文化学的简述。

一、远古文学

亚非的几条大河是人类文明的起源点,也是远古文学的诞生地。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和西亚的两河流域就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到公元前 2000 年前后,伊朗高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也相继进入了文明社会。其后,希伯

来人在公元前 1300 年时也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东方的远古文学是这些远古文明的组成部分。

埃及文学和巴比伦文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埃及文学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的《亡灵书》是古代文学总汇。巴比伦文学也有多种体裁,而成就最高的是史诗《吉尔伽美什》。

古印度文学丰富多彩。最早的是吠陀,这是上古文献的总集,其中以《梨俱吠陀》和《阿闼婆吠陀》的文学价值最高。其次是史诗文学,即规模庞大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最后是古梵语文学,其中水平较高的作家有马鸣、首陀罗迦和跋娑,诗人和剧作家迦梨陀娑的创作堪称这时的最高成就。

希伯来的古代文学大部分体现在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特别是其中的《旧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抒情诗和预言等,质朴流畅,通俗易懂。

二、中古文学

当人类进入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后,东方文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堪称当时世界文学的高峰。但是东方文学也存在着不足,那就是发展缓慢,到 15 世纪后,欧洲各国渐次步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文学迅猛发展,但东方文学还在封建主义的框框中打转,暴露了它的落后性。

在中古时期,东方文明已逐步形成了三大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印度文化圈,以阿拉伯为中心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

属于华夏文化圈的有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日本最早的文学成就是和歌总集《万叶集》。女作家紫色部的《源氏物语》是物语文学的代表。从 17 世纪开始,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中心的市民文学蓬勃发展,诗歌的代表是松尾芭蕉,小说方面的代表是井

原西鹤,戏剧方面的代表是近松门左卫门。朝鲜文学中,以民间创作为基础的小说《春香传》被誉为古典名著。朴趾源的散文取得了较大成绩。在越南文学方面,代表最高水平的是阮攸及其代表作长诗《金云翘传》。

属于印度文化圈的首先是印度,此外还有南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格比尔达斯的格言诗、加耶西的长诗《莲花公主传》、苏尔达斯的《苏尔诗海》和杜勒西达斯的长诗《罗摩功行之湖》都是中古印度文学中有代表性的作品。

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首先是阿拉伯,其次是伊朗,此外还有西亚、南亚、中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阿拉伯文学在 5 世纪末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古兰经》既是伊斯兰经典,又是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艾布·努瓦斯和穆太奈比的诗歌享有盛名。大型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伊朗文学在 9—15 世纪的六百余年形成了以诗歌为中心的繁荣时代,以菲尔多西、欧玛尔·海亚姆、内扎米和哈非兹为代表的一系列著名诗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产儿,可谓名家名作林立。

三、近代文学

对于东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近代文学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文学,只有日本例外,它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文学也就变成了以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为主的文学。对于大多数东方国家来说,近代文学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既反映了民众的苦难,也表现了他们要求独立、解放的愿望。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东方文学不如西方文学发展得充分,但在各国文坛也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

印度近代文学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在多种语言中,孟加拉语新文学首先兴起,并推动了整个印度新文学的前进。殷吉姆

是其先驱者。泰戈尔不仅是孟加拉新文学而且是印度新文学的杰出代表。泰戈尔(1861~ 1941)是东方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文学成就是巨大而多方面的。他首先是个诗人,为印度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他的优秀诗集有《吉檀迦利》等。“吉檀迦利”在孟加拉文中是“奉献”的意思。诗人在诗中表达了热爱生活、热爱现实、热爱祖国的心情,同时又劝导人们走出神的殿堂而到劳动者中去,到现实中去。泰翁还是个优秀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代表了当时世界小说的先进水平,代表性的有长篇小说《沉船》、中篇小说《四个人》等。他还是个戏剧家,一生中写了许多风格独特的剧本,代表性的是《邮局》。他的散文思想深刻,形式精美,是文坛瑰宝。因此,他被誉为近代印度文学的泰斗和奠基人。萨拉特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一定成绩。此外,印地语新文学的开创者帕勒登杜和乌尔都语新文学的代表伊克巴尔也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

日本近代文学在 1868 年到 20 世纪初的几十年间追随西方走过了西方几个世纪所走过的路子。二叶亭四迷的小说奠定了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继之而来的有森鸥外、夏目漱石和岛崎藤村。森鸥外开创了近代浪漫主义的先河,夏目漱石以现实主义为其基本倾向,而岛崎藤村则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除此之外,菲律宾作家黎萨尔、伊朗诗人巴哈尔、埃及诗人巴鲁迪等的创作也都有一定的成绩,推动了本民族新文学的发展。

四、现当代文学

现当代东方文学是 20 世纪以来的文学。在这个时期,东方国家纷纷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走上不同的道路。如果说近代文学具有一定的过渡性质的话,那么现当代文学则构成东方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增长,在质量上有很大提高,在地域上也有很大扩展,从北亚到南非、

从东亚到西非，许多国家的文学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并取得了惊人成就。

日本文学在战前和战后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前，主要有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两家，壁垒分明，前者的代表作家是小林多喜二，后者既有作为自然主义文学之对立面的唯美派、白桦派和新思潮派，其代表人物分别为谷崎润一郎、志贺直哉和芥川龙之介，又有日本第一个现代派——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是川端康成。

新感觉派是日本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文学流派，由横光利一和川端康成等人发起、形成，该流派极力强调主观感觉，热心追求新颖形式，革新日本文学。川端康成（1899—1972）一生写了一百多个长中短篇小说，他在二战前的创作往往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孤寂悲哀，形成“既悲且美”的基调，如《伊豆的歌女》。二战时期，他主要写些风花雪月的故事，表现了对人生、对战争的厌倦，如《雪国》。战后，他一方面继续创作一些思想基本健康，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如《古都》；另一方面，他又写出一批以表现官能刺激、色情享受和变态性爱为主题的作品，着力描写人内心深处阴暗、丑恶、无聊的活动，颂扬违背道德人伦的思想和行为，情调颓废，如《山音》等。总的看来，川端康成的作品将日本古典美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相结合，营造出了一种含蓄、纤细、优雅、感伤、孤寂的意境。他的小说一般以青年女性为中心，以恋情为主题，往往流露着孤独、失意、悲哀的情绪，给人以温柔的伤感，淡淡的哀愁，别具大和民族文学特色。

战后，日本文坛上出现许多作家和流派，主要有战后派及其代表作家野间宏、无赖派及其代表作家太宰治、社会派推理小说及其代表作家松本清张。此外，井上靖和大江健三郎也是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 1994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万延元年

的足球队》以其新奇而深入的对人性的考察而引起人们关注。

朝鲜战前以无产阶级文学为主，李箕永和韩雪野代表了当时文学创作的水准。战后北方和南方的文学迥然不同，北方文学仍以无产阶级文学为核心，南方文坛则流派纷呈，如战后文学派、纯粹派、参与文学派等。

印度尼西亚文学坎坷多难，战前受殖民主义约束，战后为动荡的政局所影响，普拉姆迪亚算是该国最出色的作家。

印度在战前和战后也不一样。战前文学与民族解放运动密切相关，战后文坛则状况复杂，不同流派和不同观点的文学竞相发展。代表作家有印地语的普列姆·昌德，乌都尔语的克里山·钱达尔，英语的安纳德。

伊朗战前文学被置于高压统治下，战后社会条件有所改善，文学前进的步伐加快，其中以赫达雅特的成果最为突出。

阿拉伯国家战前产生过两个重要流派：旅美派和埃及现代派。前者以纪伯伦为代表，后者以塔哈·侯赛因为代表。战后文学的发展更加迅速，其中以小说的进步最为显著，迈哈福兹的创作堪称代表。

在阿拉伯国家以外的广大非洲地区，现代文学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着重表现民族的独立和自救。获 1986 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尼日利亚剧作家索因卡主要表现人类的未来命运，具有人类普遍的道德力量，如《孔其的收获》。获 1991 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小说家戈迪默着力表现黑人的生存问题，对妇女命运也进行了呼吁，如《陌生人的世界》，这些作品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总的说来，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有较大的不同，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性格使东方文学具有独特的基本特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道路曲折，民族色彩浓厚，民间文学繁荣，宗教影响深远。

主要参考书目

- 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 1989 年。
- 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的经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美国人·建国历程》、《美国人·民主历程》，三联书店 1993 年。
- 陈惇等主编《外国文学史纲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 陈惇等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 陈嘉厚主编《现代伊斯兰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
- 陈饮庄等《世界文明史简编》，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 陈应祥等主编《外国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 范桥主编《世界四大宗教三百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
- 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 傅乐安主编《当代天主教》，东方出版社 1996 年。
- 顾云深主编《世界文化史》（现当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黄珏编著《科学技术发展简史》，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 蒋承勇主编《世界文学史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 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东方出版社 1995 年。
-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 井上靖《日本人与日本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 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 李巨廉《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学林出版社 1999 年。
- 李普曼《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新华出版社 1985 年。
- 李锡禧等主编《新编外国文学教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 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 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 纳忠等《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 佩尔主编《西方文明史》，商务印书馆 1993 年。
- 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1 年。
- 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编《俄国文化史纲》,商务印书馆 1994 年。
- 童鹰《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 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年。
-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 王俊荣等《伊斯兰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0 年。
- 王树英《宗教与印度社会》,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年。
- 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 渥德尔《印度佛教史》,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 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 吴国盛《科学的世纪》,法律出版社 2000 年。
- 吴元迈主编《二十世纪外国国别文学丛书》(共 10 本),青岛出版社 1999 年。
- 吴泽义等编著《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 肖宪《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 1993 年。
- 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 裔昭印主编《世界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 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 1999 年。
- 詹姆斯等《世界古代发明》,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
- 张广智主编《世界文化史》(古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张友伦等《美国社会的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 郑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 周德藩主编《世纪大突破》,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 朱龙华《罗马文化和古典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朱世达关于当代美国文化的系列文章,见《世界知识》,2000年第 5、7、8、9期。

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年。

庄锡昌《世界文化史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

后 记

本书是为“文化教育”专业编写的教材,有几件事交待一下:鉴于本专业另有美术和音乐欣赏类的课程和教材,所以本书在编写时一般不再考虑这方面的内容。

要在十几万字的篇幅内编写一本世界文化史有一定的难度,第二至第四章我们大体上采用了以三大宗教文化圈的分法来介绍世界上的主要文化及其成就,由于日本、美国、俄国纳入某一文化圈后难以突出其重要性和文化特点,所以设专章加以介绍。既然以三大宗教来区分文化圈,所以对三大宗教的说明自然也就略为多一些。把宗教看成一种文化现象,让学生了解三大宗教的一些基本知识,也是本书的目的之一。

本书的作者是:第一章,郑崧;第二、三章,张忠祥;第四章的一、二、三、六节,第五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七章的一、二、三、五、六节,王加丰;第四章第四、五节,第五章第二、三节和第七章第四节,周旭东;第八章,王生国。

本书是在前人许多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当然,部分章

节属于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书末所列的参考书目不包括常用的大学世界史教材，也不包括注释中已出现的较专门的书籍或资料来源。

王加丰

2001年8月

文化艺术教育丛书编委会

主 编：张先亮

副主编：陈芬华 叶志良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加丰 王克俭

叶志良 陈华文

陈芬华 张先亮

张继定 金 汉

周文忠 黄云生

总 序

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化艺术教育丛书》终于可以付梓了。这是人文学院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20世纪下叶,我国对全民实行文化教育、素质教育的要求已由呼声转为具体的实施阶段,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已经成为知识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因而,社会上许多学历不高的人员争需通过多种渠道,以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增强自己的理论修养和实际的应用能力,尤其是覆盖而较广的文化系统和教育系统。

为此,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省内最早设置了高中起点的文化艺术教育专科函授专业,以适应文化系统干部和小学教师接受再教育的需要。经过几年探索、培养,已有四届学生毕业,他们学以致用,深受社会好评。为了更好地总结办学经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人文学院专门成立

了研究小组,对该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并决定编写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艺术教育丛书”,既为文化艺术教育专业提供教材,也为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提供一套文化修养读物。

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设立在国内并不很多,各校设置的课程体系也不尽相同,所用教材更不统一。因此,建设一套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教育的教材,是非常必要的,是很有意义的。由于目前国内尚无编写文化艺术教育专科系列教材的先例,编写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虽然这套教材的编写是以人文学院近 70 名教授、副教授、博士组成的有丰富教学经验,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师资队伍作后盾,参加编写的教师大多都有出版过个人专著,主编或参编过教材的经历,虽然我们也确定了本丛书要以基础性、知识性、科学性、系统性、趣味性为编写原则,参编人员都努力紧扣这一原则,但受到以上因素影响,加上各人风格不同,时间也比较紧,教材中定会有某些不足,希望大家提出批评与建议,以便在重版时修改、完善。

主 编

2001年4月20日